

書室

00189



陳公博先生三十九年文存

宣傳部編印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再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6067B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再版

陳公博先生二十九年文存

宣傳部編印

上海

圖書館藏書

1634523



陳 公 博 先 生 近 影

# 目錄

## 自序

## 論著

怎樣才可以使中日永久和平	一
廉潔政治——和平建國的基本條件	六
三民主義與科學	一〇
政工人員須知	五四

## 講演與談話

我們當前的責任	一〇一
對日廣播	一〇七
怎樣做近代國家的國民	一〇九
政工人員的基本信條	一一三
紀律	一二六



政工人員應有的態度·····	一二一
我對於國民的要求·····	一二五
兼長上海市就任前之談話·····	一二九
希望中日人士合作建設大上海·····	一三一

### 赴日言論

米內內閣總理大臣招宴席上答詞·····	一三三
答禮使節團謝宴席上致詞·····	一三五
貴衆兩院招宴席上答詞·····	一三七
興亞團體聯合會及言論界聯合招宴席上答詞·····	一三九
經濟團體聯合招宴席上答詞·····	一四二
廣播演詞·····	一四五
京都官民招宴席上答詞·····	一四八
大阪官民招宴席上答詞·····	一五〇
華僑聯合招宴席上答詞·····	一五四
神戶官民招宴席上答詞·····	一五八

附神戶上陸官民歡迎會上答詞	一六〇
九洲經濟俱樂部招宴席上答詞	一六一
在九洲帝國大學演講詞	一六四

陳公博先生二十九年文存

## 自序

關心於我的文章的朋友們，都希望我把已往的文章搜集，把今後的文章保存，使得出版一本文存。

我很感謝朋友們的盛意，因為沒有朋友們的慫恿，我簡直沒有把這件事想過。的確，我的文章遺失太多了，遺失的原因，有些是我根本沒有想起保存，隨作隨棄，有些是屢次逃亡，使我不能不銷燬。

已往的文章，我實在沒有想到保存。我還記得在十七歲時開始在報紙作論評，固然這些幼稚見解值不得存留，就要存留，也無法搜集，報館是早關閉，存稿自然散失。

稍為值得保存的，要算民七在北京所作的『督軍問題』，以及當時和朋友們創辦的『政衡』雜誌。但現在那本小冊子和雜誌都一本無存，北京大學的圖書館是否還在目錄中，我不知道，至於我手上就沒有一本，祇是在腦內微微留一片痕迹。

民九，民十，在廣東創立『羣報』，我寫的文章也不少。當時我雖然沒有想保存，也會一張一張的裝訂成冊。及至北伐時候，我在武漢，而廣州清黨，那時我有左派的嫌疑，我的朋友深怕累及我的家屬，跑到我家內，硬作主張，把裝訂成冊的羣報，以及民十四五年在報

紙發表的言論，一概焚燬。他的盛意，我是很感謝，然而心內倒不由得想起來有些惋惜。

北伐時候，兩度在武漢，一度在南昌，也曾寫了些文章，民十九在北平擴大會議時期，也會在各報發表些意見，可是交了報館發表便算了，在戎馬倥傯時期，誰也想不到保存，更想不到今日會想到重印。

現在想起對於已往的文章能夠搜集的，祇有民十七在上海所辦『革命評論』，和民廿二至民廿五所辦『民族』雜誌，以及偶然在『中華日報』及其他雜誌發表的文章了。『民族』的文稿還容易找到，然而『革命評論』的文稿，我也因為逃亡，沒有留存，祇知到上海的南滿鐵路圖書館存有一份，現在正託人借出謄抄。自己的文章，而要到日本的圖書館借抄，這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已往文章還有不能立刻出版的一本，那就是民廿八在香港所寫的『苦笑錄』，費時四個月，由民十四國民政府的成立始，至民廿五西安事變止，把中國大事，一件一件的描寫，大約字數有二十多萬，這本戲劇的人物——自己也在內——還在排演，我想等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時才付刊。

已往文章所能搜集的，僅是如此了，以後借抄完畢，分類印刷。對於今後的，我想還是一年一年的存起付印，這不是編年，而僅求段落，民廿九的文章，就喚做『民國廿九年文存』罷。



我寫完這篇序文，我應得感謝我的朋友，假使沒有朋友的催促，連這些文章都不會想起  
搜印，連帶這篇序文也不會提筆來寫。

民國卅年公博序於南京

陳公博先生二十九年文存

論

著

# 怎樣才可以使中日永久和平

——二十九年元旦中華日報特刊論文——

自從去年汪先生發表豔電主張，到現在整整一年，中日和平運動慢慢展開，而我則日夕不息的在那裏想如何才可結束中日的戰事，如何才可使中日永久和平。因為這不單純是原則問題，而要提出具體辦法的時候了。

實在說，在蘆溝橋事變以前，我雖然沒有主張過戰，我也沒有主張過和，因為我總覺得中日之間，橫着有不可解的怨恨，而兩方都抱有不可解的敵意，這種怨恨和敵意一天不能消除，暫時的和局，是不能挽救未來的危機，因此我曾費了很長的時日，去探討怨恨的來源和敵意的癥結。

我很覺得奇怪，日本人和歐美人對於中國同是一個外國人，但一個中國人碰到一個日本人，他比碰到一個歐美人容易了解，容易作朋友，尤其在歐美地方，一個中國人碰到一個日本人，他格外容易了解，格外容易作朋友。可是我更覺得奇怪，這個中國人和日本人一分手之後，便在背後，互相敵對，互相蔑視。

我不知自己對不對，我以為這種敵對和蔑視，實在基於內心的嫉妬。在中國這一方面，

以爲中日好像兄弟一樣，在日本沒有維新之前，中日的命運也正相同。可是日本強了，中東之役，中國是失敗了，日俄之戰，日本又戰勝了。不但如此，日本且模仿歐洲帝國主義的方式和辦法向中國侵略和壓迫了。好像兩兄弟，以前都同受慘苦的命運，現在一個強了，一個弱了，這個強的不得不援助弱的兄弟，而且加緊和外人向這個弱的兄弟壓迫，這個弱的兄弟怨恨強的兄弟，自然比怨恨一般外人更深刻。不過日本之強，中國知道沒有方法可以遏抑的，於是把怨恨都寄託於蔑視，以爲日本雖然強，她的文化是由中國去的，中國既是日本文化的泉源，無論日本怎樣強盛，我還是一個老大哥，你儘管強，我儘管瞧你不起。

至於日本方面在維新之後，國力未充，其勢不能和歐洲的帝國主義爭雄，也只有向中國下手，以爲中國老大了，腐化了，很有種『天與不取實受其殃』的神氣。不過在內心一想，日本文化雖然不是全部來自中國，至少有若干文化是孕育於中國，於是他極力模仿歐美，極力想忘記他的兄弟國家，好像強的兄弟，以不認他的弱的兄弟爲榮，以爲一個強人有了弱的兄弟，是喪失他的身份和體面。不但要忘記他的兄弟，反而更壓迫他的兄弟，以爲這樣才能表示出他有資格和歐美齊觀，而非和中國等量。

他們彼此都具有內心的嫉妬，不特不設法互相了解，而且故意的不求去了解，就是中國人方面的所謂『日本通』，和日本方面的所謂『中國通』，也都本着互相蔑視的心理，互相的偵察，而不試求互相的了解。『日本通』所得到的結論，就是『日本人不可靠』。而『中



國通』所得到的結論，就是『中國人容易欺負』。憑着這種內心的嫉妬，已足打仗而有餘，所以我常說，縱使沒有蘆溝橋事變，縱使沒有九一八事變，中日兩國始終要打一次大仗，非大家淪入血海不可。這種慘運似非憑少數有識之士在短促時間所能挽回，我無以名之，只有名之爲歷史上無可避免的悲運。

現在中日兩國已戰爭了兩年多了，雙方同蒙重大的犧牲，日本方面已經有根本的覺悟，知道以前的觀察完全錯誤，從前以爲中國可以不戰而屈是錯了，一戰而可以使中國瓦解也錯了。中國方面也有了根本的覺悟，從前以爲相鬥下去日本經濟必定崩潰是錯了，中日戰爭可以惹起日本的革命也錯了。兩方面已經覺悟到，中國沒有最後勝利的把握，而日本也不能滅亡中國。兩方面更同時感覺筋疲力盡，內心的嫉妬也在戰爭中彼此認識而消除，這時是中日兩國棄嫌修好的時機，也是中日兩國翻然締結永久和平的運會。

但是中日怎樣才能永久和平呢？我想了一年，并不是原則問題，而是具體辦法的問題。因爲和平的原則早在近衛首相的聲明和汪先生的豔電主張之中確立，而所謂具體辦法實質言之就是媾和的條件，怎樣才使中國依然保持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

目前雖然和平運動正在擴展，所謂具體條件或者離決定的時機還遠，但我不能不提出幾點主張，希望雙方加以注意。

第一，中國所要求的是獨立自由。換言之是國家的主權和行政完整。我讀過許多日本的

雜誌和朝野的言論，他們很了解中國的獨立自由，不只於中國有利，於日本有利，而且於東亞更有利。但言論終是言論，我希望雙方將來能夠根據這個原則來討論和平條件，凡任何事實足以妨害中國的獨立自由的，應該下絕大的決心去把他消滅。

第二，中國所要求的是統一。凡含有分裂意味的行動和設置，都是違反中國的歷史，違反中國的國情，違反中國的利益。我們也知道在戰爭之中，免不了為軍事的便利，形成地方政權的臨時設置，但這是一時的，或者是不得已的，倘在和平之後依然支持這些地方的分裂，中國必不會安定，而會形成中國的長期變亂，結果中日得不到永久的和平，結果還是一個草草和議的暫局。因此我希望雙方於討論和平條約時，把一切『特殊化』的事實，一概刪削。

第三，中國所要求的是立刻實現的事實。我曾見過日本有識之士的言論，都一致確認中國應該獨立自由是最高原則，不成問題，然因軍事發生的既成事實，在不得已之下，不妨暫令繼續，以後使之逐漸改正，以期符合最高的原則。但是最近歷史曾告訴我們，這種希望完全是理想，是很難實現的。我還記得威爾遜在巴黎和會，為一般歐洲的現實政治家所撓阻，他對於既成事實都讓步了，但有一點不肯讓步，那就是國際聯盟。他以為國際聯盟一旦成立，凡爾賽條約總有一天得到合理修正的機會。可是凡爾賽條約是簽定了，國際聯盟是成立了，二十年中凡爾賽條約未曾修改過一個字，終於引起這次歐洲再度的大戰。我們鑒於已往，恍於將來，深不願徒然定有空洞的原則，而繼續許多既成事實。

第四，中國所要求的是日本信賴中國。日本有識之士曾三翻五次的說，中日和平是需要互相信賴的，這話確是對的。但是我們固然不希望日本以戰勝國自居，然而日本到底是軍事勝利者。現在沿海是受日本控制了，中國許多省份被日本佔領了，日本目前要中國信賴日本，倒不如日本先信賴中國。換一句話，日本應該大大方方的給予中國以最好的和平條件，不特昭示中國日本無滅亡中國之意，并且也無控制中國之心。這樣事實其在，互信必生。中日的百年大計，也可以立時大定。

中國具體的要求，本不是今天一紙短文所能詳寫的，末了我還希望日本應該了解這次中日和平，日本是和中華民國媾和，而不是單純和汪先生媾和，中國最需要是和平，汪先生才本着國民的需要和期望，不避艱難，不避犧牲，來領導這個運動。日本所提的條件，中國國民能接受的，汪先生才能接受，中國國民不能接受的，汪先生也決不能接受，我希望兩國人士本着悲天憫人之懷，商討東亞的百年大計，而不希望兩國人士本着外交形式，作討價還價的和議。

中國四萬萬的人民正期待着合乎正義的和平條件，中日兩國人士應該認識自己的責任，日本人應該替中國着想，中國人也應該替日本着想，同時兩國更應該替東亞着想，若兩方牽於現實，沒有最高的理想作根據，我們不特不能解決這次中日事變，或者更種下了未來的無窮事變。

怎樣才可以使中日永久和平

## 廉潔政治——和平建國的基本條件

——七月三日在南京發表——

自國府還都，許多在政府的朋友對她表示了許多意見，什麼事應該做，什麼事還應該急做。是的，現是真是百廢應舉，大而至於調整中日關係，以次而促進全面的和平，急而至於疏通糧食，以次而安定民生，恢復生產，實在沒有一件事不應做，而且急要做的。

可是，我再想想，在許多事要做而要急做之上，還有一件事要做，即是一樹立廉潔政治。而且我認定廉潔政治是和平建國的基本條件。倘若政治不能廉潔，絕不能得到和平，政治不能廉潔，也不能達到建國。

爲什麼我說政治不能廉潔，絕不能得到和平？我還記得本年三月三十日，我對國民廣播，曾說中國有史以來，曾經亡國兩次，大的變亂數十次，小的變亂無慮數百次，我們夷攷亡國和變亂的時期，都肇於政治腐化，社會墮落。這個原因也很簡單，若果政治清明，社會整飭，不只國內的人心不會思亂，國外也不會起欺侮的思想。亡國和變亂之源都沒有，那裏有戰爭？那裏有變亂？四書裏說：『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這真是千古不磨的道理。我那幾句話不是老生常談，是具有深意的。

我們爲什麼有這次中日事變？雖然其中原因很多，要而言之，是令人看不起。我在廣播也會說過，『中國爲什麼變成積弱之國，因爲自清末以來，政治和社會都腐化墮落了，這種薄俗末流，至今日還不能矯正，因此被人蔑視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不斷的惹起戰爭和事變了』，因此我們要真正和平，須得使人對我們看得起。

我就不說國家罷，譬如我們私人交朋友，要朋友尊重我，須先使我對我瞧得起。譬如我們有一個朋友，他的人格卑污，行爲下賤，我們願意和他交朋友麼？就願意交，可以交得下去麼？兩個人交不下朋友，彼此便敵對了。中日兩國固然兩方都誠意求和平，倘使我們政治不能廉潔，一定還是令人瞧不起，令人對我不能尊重，這樣和平也就幾希了，就使一萬分的誠意也不能持久了。我今天敢大聲疾呼的說，我們若要真正和平，先從廉潔政治始。

我爲什麼說，政治不能廉潔，絕不能達到建國？這個理由更是簡單了，我不談建國，且談談建一座房子罷。建一座房子無論他是一座近代建築物，或是一座小茅棚，都有計算的。在計算時候，需要多少錢，多少木，多少磚和瓦，都有數目的。如果包工的人，盡量中飽，少用些材料，或買價賤脆薄的材料，那座房子一定建不成，勉強建成，一遇風雨，必會倒塌。

建國是有兩方面的，一面是精神，一面是物質，若果政治不能廉潔，精神必先餒惡和頹惰，最好的也不過『得過且過』，若壞的便壞到不可思議了。精神萎靡，物質建設便無法建



設起來，所以建國雖然有精神和物質兩面，實在是一而二，二而一。

中國自前清末年已經談建設了，到了現在談建設最少談了五十年，但我們試看，中國會有什麼了不起的建設。爲什麼呢？就因政治不能廉潔。政治不能廉潔，不獨政府的建設沒有實效，而且還連帶影響了人民的建設，別的不必談，單以鐵路而論，從前南潯鐵路和粵漢鐵路當初都是民辦的，招商局也是民辦的，他們的腐敗情形，較之國營事業還更厲害。事變以前中國棉織業全是民辦的，我是知道最清楚的，他們並非失敗在技術，而是失敗在管理。管理失敗，那就是我所說的政治社會腐化墮落的結果。

說到此地，我還有一件最重要的歷史告訴讀者們。事變以前，諸位對於中國的統一，不是讚嘆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所以中國才告統一麼？可是據我所知，國民革命軍之能夠北伐，完全成功於廣東的統一，廣東的統一，完全成功於十四年汪先生領導下國民政府的廉潔政治的樹立。我回憶民國十四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於廣州，力量是微薄的，環境是惡劣的，對外有英國的嫉視，對內有東江和南路陳炯明系軍隊的反抗，但不到一年廣東是統一了，廣西的李德鄰、黃季寬、白健生，和湖南的唐孟瀟來歸了，而且國民革命軍可以北伐了。當時廣西和湖南的來歸，是不是我們用武力壓迫他們來歸的？不是的。廣東也會實行過三民主義和政綱沒有呢？還沒有。然而國民政府一立，四方翕然來歸，就是當日能夠實行廉潔政治，使得當時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那時舉國人民無不痛心於北洋軍閥政治的昏暗，因此我

們祇拿不足三萬的槍枝，居然可以出師長江統一中國。祇可惜至十六年寧漢分裂，南京方面在上海引進許多投機者，在北方引進許多官僚，政治又復昏暗，一直延至今日。所以今日我們除非不談過去中國的統一則已，談到統一，我們還須歸功於十四年廣州國民政府汪先生領導下的廉潔政治。

自事變以後，重慶許多人們借着統制的美名，發了許多『國難財』，人們談到這些不肖的官吏和不良的商人，無不痛心切齒。可是我們既不忍看重慶方面人們在那裏大發其『國難財』，我們就難道忍心袖手看着國民政府治下的人們在那裏大發其『和平財』麼？我不禁大聲疾呼喚起我們有心和有志的人士注意。

我決不要一班同志做木偶的，世上最廉潔的莫過如木偶，他不會貪污，連一碗飯也不會吃，一杯水也不會喝的。我要求於同志們，一方面樹立廉潔政治，而一方面還要努力朝前進。

我很望在政府方面，下一個最大的決心，對於貪污的官吏，嚴加懲處，對於蠅苟的人民，痛加針砭。而在同志一方面，則糾合有志之士，對己則潔身自愛，用資表率，對人則不顧情面，奮勇檢舉。否則和平建國沒有希望，而國家也從此不可救了。愛時愛國的同志們，希望大家起來拿出勇氣和決心大幹一下。

## 三民主義與科學

——九月在南京出版——

我有一個基本信念，三民主義不只合乎科學的，是由科學產生的，而且我們要研究三民主義，一定要應用科學方法，要實行三民主義，更要應用科學方法。

在我沒有談三民主義之前，我首先談談思想，因為沒有思想是不能談科學，也不能研究和了解三民主義。可是任何人都有的思想，最愚笨的人也有他的思想，祇是他的思想合理不合理罷了。但思想怎樣才算合理呢？那「理」又在什麼地方呢？我以為這個問題很是簡單，只須望文生義便懂。「理」字怎樣解？那是推理過後和條理過後的一個判斷。但如何能使這個判斷正確，那必得有思想的方法了。

人們的思想，有時太過龐雜，有時也太過簡單。太過龐雜的自然需要清理一下，而太簡單的，我們也應該不斷研究其真。別的不必說，我們也曾時時聽到一句話「有因必有果」罷，大家都以為很有道理了，就在西洋哲學，也有很著名的「因果論」，但嚴格研究起來，世界上實在沒有因果，只有關係。何以言之？如果真有因果的話，必須有是因即有是果，才算真正的因果；換言之，即是有相等的因，發生相等的果，而相等的果必發生於相等的因才

算是真正的因果。可是我們仔細看看宇宙的事物，因果決沒有像數學上二加二變爲四，五加五變爲十那樣相等。或者原因大而結果小，或者原因小而結果大，或者原因單純而結果複雜，或者原因複雜而結果單純，或者幾種原因才發生一種結果，或者幾種結果生於一個原因，又或者原因產生了結果，而其結果又變成第二原因時，才生最後的結果。這樣我們分析下來，因果論便沒有根據了。大家所共認的因果論還會發生這個問題，人們豈可以不時時刻刻清理複雜的思想，和研求人所忽略的簡單思想麼！

我們既然要思想，那就不能不有思想的方法，那也就是第一步的科學方法。從前我會寫過一本書叫做『革命與思想』，對於思想的構成，我會化繁爲簡的舉出幾個步驟。

我說：思想的方法，在我們古代已有粗糙的方法，所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是一個構成思想的步驟。因爲思想的發生，最少有兩個方向，一個是對於現象和關係的推想，一個是對於現象和關係的玄想。現象即是自然科學的對象，關係即是社會科學的對象。例如我們見了日輪，便想到地球的運動，恆星和行星的位度，這是一種推想，若見到日輪，而想到上帝的威權，神仙的宮闕，這是一種玄想。如果我們沒有方法去條理，不只玄想終成玄想，就是推想也會變成茫無根據的玄想。然而這還是對於實體的現象而生玄想的，若更肯冥心探索，實際追求，再沒有現象可以證明，玄想或會消滅。可是對於社會關係而生玄想時，倘使沒有方法辨正，其迷離最足害人，在科學越不發達的地方，玄學者的威

權越強大，玄想力量越牢不可破，因為大家都沒有方法去證實，則甲一是非，乙一是非，終至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什麼是思想方法呢？我綜合各派學說，簡括為三個步驟。

第一 觀察和懷疑 尋常談思想方法的，都把懷疑放在先，觀察放在後。誠然不懷疑沒有深刻的觀察，但是沒有精密的觀察，終不會發生懷疑。現在芸芸衆生處在紛紛的現象和關係，每日接於感覺者不少，而發生懷疑的實不多。反之一般人們每天或有幾微的懷疑，但他們沒有嚴密觀察，他們的懷疑也只有像浮光掠影的消滅。到底懷疑先呢，還是觀察先呢？這種界限不容易劃分。據我經驗，觀察還是先於懷疑。比方聾耳的人們，因為他們的聽覺不能感應，決不會懷疑到音樂之和諧，盲目的人們，因為他們視覺不能感應，決不會懷疑到色素的調節。論到實體的現象，已非有健全的感覺，不會懷疑，何況社會的關係，更非有悠久的經驗累疊，無從再懷疑而去研究。嚴格論之，沒有懷疑，決沒有精刻觀察，反之若沒有觀察，也決沒有精刻懷疑，雖然觀察和懷疑，稍有先後之分，我倒以為沒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把他們合成一個步驟。

於此我要特別指明的，我所謂懷疑，是指思想方法的步驟，而不是指哲學上的『懷疑論』。我是不贊成懷疑論的，我曾說過，懷疑論含蓄批評性過強，而含蓄判斷力太少。懷疑固是思想變遷的基礎，而對於思想的進步，則絕少為有力最終的貢獻？所以徒然懷疑而不能斷定，必至幾乎不能決定個人本身的生存。比方環繞於我周圍的真實，最真的莫如我所見，



然而我所見的僅是現象，這現象是否吻合於實體，常令懷疑的人們不能無疑。譬如我隔遠觀察，以爲這現象是真的，若拿望遠鏡去觀察，那現象已經不同，就是我拿擺在面前的物體觀察，以爲這現象再不會錯的，若拿顯微鏡去觀察，那現象更有差異。然而這還是人的觀察，若其他動物的所見，同一實體，其所表現的現象，必因動物而殊。人的眼睛能視，因爲眼球的構造和光線的反折而相適應的關係而來，其他動物眼球的構造既與人不同，而感受光線的反折，當然和人類不一致，或者我所見是紅的，而馬所見或是青的，牛所見或是藍的。幸而馬和牛不能說話，若馬和牛能說話時，究竟我們所見的紅是正確呢，或是馬和牛所見的青和藍是正確呢，我們沒有方法辨論。然而人類和馬牛所見的顏色雖然不同，而總有一實體的存在，那是絕對的正確，那伯你怎樣懷疑，這是不能否認的。并且到懷疑的至極，自我存在，也可懷疑。何以故？比如我寫那本『革命與思想』祇是寫個人思想成熟的過程。假如我不生在經濟落後的中國，而生在工業發達的歐洲，恐怕我的思想過程不會這樣迂迴而遲慢，又假如我不處在這個魚龍曼衍思想雜進的社會，而生在與原始生活相近的中部非洲，恐怕我又安於簡單的習慣，而不會有推演個人的思想和社會的變化。可見我之爲我，完全爲環境各種條件所構成。環境若根本變遷。則我到底是否還是現在之我，都成了懷疑的張本。但是無論如何，我能思想。即是現在的我已經成立，圍繞於我的一切現象和關係，均不能不斷定和我同時生存。這是我不能贊成懷疑論的原故。然而我不贊成懷疑論是哲學上的問題，人生有懷疑

是思想構成的問題。哲學上的思想初期發生，都因觀察而生懷疑，因震駭於日月的運轉和雷雨的勃發，始而窮究宇宙的本體，於是有初期的『宇宙論』。繼而思想慢慢發展，才一變而研究形而上學，這是歷史上思想發展的起源。要知我們所謂懷疑，最要緊還是驅除成見，人生自幼至長，所接受傳統的經典，社會的信條，差不多每一經典和信條，都有他若干成見，接受既久，渾然習之若忘，法國的哲學家笛卡兒教人思想，分開四個步驟：第一，不是顯然真實的不要接受。第二，把每個問題盡可能分作幾個問題，一部分問題如果容易研究，那麼全部問題自然更是清楚。第三，研究要有秩序，先從最簡單最易知的研究起，以次而進於複雜的知識。第四，應該有精確的計算，要照顧到有沒有遺漏了重要的事實。笛卡兒是大陸派，教人思想時，不要存有成見，就是英國派的哲學家培根，也教人首先要破除偶像。近日的青年們心裏以為排除成見並不覺得困難，其實近十年以來，我所經驗的，一般朋友往往拿了新的成見代替了舊的成見。這種新的成見，如果經過一度研究而成爲成見猶有可說，我常見青年們拿着一兩個名詞以概括一切，不管這名詞的內容如何，涵義怎樣，這真是培根所談的偶像了。

至於觀察，也是對於現象和關係加以研究的才是觀察，離開現象和關係，便無所謂觀察。觀察有兩個系統，一個是縱的，一個是橫的。縱的有初期觀察，過程觀察，終局觀察；橫的有全部觀察和局部觀察。觀察雖有縱橫，然欲得事物之真相，非合縱橫兩個系統，往往不

能得其究竟。分開來說，無初期觀察，則過程之變化何自，不可得知，無過程之觀察，則終局之判斷往往與他事混淆。再次若僅爲全部觀察，固有推進局部之可能，然局部之變化，時或在全部概念以外，而局部觀察時亦可以推及全體，但常常流於片面妄斷，失於整個推理功能。換言之，縱的觀察，多少包含綜合作用，而橫的觀察，多少包含分析功夫。二者缺一，在思想上容易流於機械的邏輯，不是見理不清，便是推理謬誤。不止如此，觀察往往因人的職業和環境而有特殊的分歧；比如現在觀察一尊金屬鑄就的佛像，如果我是一個冶金的，我必觀察他所含的金質幾分，銅質又幾分；如果我是一個考古的，我必觀察他鑄於六朝，抑鑄於五代；如果我是學佛的，我必觀察牠到底還是如來，還是達摩；如果我是學法律的，我必觀察他的物權還是屬甲，還是屬乙。這些觀察雖然不同，然無害於觀察的本質，只要不忘縱橫兩面便夠了。

第二 分析和綜合 照邏輯的程序，每每先分析而後綜合，但在整個的思想時，或者有意的，或是無意的，同時必用兩個方法。實在說，人們常在小孩子思想還沒有發展的時候，腦內天天已做那分析和綜合的工夫。譬如拿一張圖畫給小孩子看，他看見一張四等邊平面，四條等腿和兩個抽屜的桌子，他必不遲疑的喊着『這是方桌子』。其實，我們在圖畫內決不能繪這麼四等邊平面和四條等腿的桌子，只能繪一張向左傾斜，向右傾斜的桌子，或者只能繪一張正面有線無面的桌子。若我們必定繪一張四等邊平面和四條等腿的桌子，在圖畫上

一定不成東西，不獨小孩子不會認識他是方桌子，連我們成人也不會認識這張方桌。爲什麼小孩子祇見斜面的或有線無面的方桌圖畫，便肯定他是方桌子呢？因爲他們的小腦子，自眼能見物之後，每天都在整理分析和綜合，所以桌子的立體，雖有六面，他祇看三面，不管牠在圖畫怎樣傾斜，他已決定那是一張四等邊四條等腿的方桌子了。

其實邏輯上的三段論法，若不用分析和綜合去細判，可以不用三段式去論斷，只用代數式計算，即可得其確切的結論。比如我們立一『凡人皆死』爲第一段大前提，『孔子是人』爲第二段小前提，可以得到『孔子亦死』的第三段結論。然而我們何嘗不可寫一代數式來計算，用同數相消的方法加減，其所得結論也是一樣的。

邏輯的三段論法雖然簡易，可是現象和關係，決不是這樣簡易的。所以我們要談一種科學，這種科學是演繹的呢，還是歸納的呢？我們絕不能站在一種方法去斷定，並且也決沒有單純演繹，或者是單純歸納的科學。所謂歸納，就是經過種種事實研究而欲求出一種原理。所謂演繹，就是拿一種原理而去推究各種事實。換言之，前一種是綜合的，後一種是分析的。綜合包含歷史的意義。有時專拿歷史決不能解決現實，然而專拿現實也會磨滅其所由變化的歷史。總而言之，兩種方法都有他的利益和限制。在歸納方法，我們若不證明每件事實，必不能相信牠的結論。在演繹方法，我們不能找出事實和原則相符，也不能決定一種定律。在一種場合我們可以由原則而推到事實，在另一種場合，我們可以由事實而得到原則。兩種

方法既不能須臾或離，所以我說，我們思想有意的或無意的必同時應用兩種方法了。

從前主張分析論的或綜合論的，無不堅持他們的成見，以爲一種方法，總可以解決一切，結果不是陷於輕忽斷定，就是誣蔑事實。而現在的分析論者和綜合論者，已經進步得多，現在的分析論者，以爲特別事實之所以有價值，全在能由特別而推到普遍，如無普遍原則之存在，必無真理可言。同時在綜合論者也以爲凡事實未發現者，我們固無由了解，而社會問題之根本重要，全重在變化，而不重在已存。換一句話來說，分析綜合在完全思想時，實不可分，我所以合兩種方法而爲一個步驟，就是這個道理。

第三 判斷和實行 什麼叫做判斷？判斷就是推理的最後結論。無論由一個原則推到各個事實，或由各個事實推到一個原則，都無害其爲判斷，然而由一種現象或關係來推理，往往得到幾個判斷，尤其在社會繁複的關係，時常得到幾個判斷，可是這幾個判斷，一定是或然的判斷，必不是必然的判斷。因爲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同一現象，同一關係，必然的道理只有一個，決不能多於一個。但雖然如此，或然的判斷，也不失其判斷，因爲必然的判斷常系於或然的判斷而來，其間或者需要實驗的假定，或者需要變化的條件，倘若沒有或然的判斷，必至連必然的判斷也得不到。說到這裏，我們發覺判斷和實行有深切不可離的關係。因爲凡一真確的判斷都可實行，若不能實行的必不能成爲真確的判斷。縱使比較的近似，也需要相當的時間，和相對的空間條件來完成。

所謂實行，一種是假定的實驗，一種是最後的實行。這兩種分別僅是形式的分別，在過程上實爲一貫。我們決不要誤解假定是一種玄想，其實假定就是或然的判斷，如果沒有現象和關係作對象，不經過懷疑和觀察的第一個步驟，不經過分折和綜合的第二個步驟，決不會得到假定，如果假定沒有事物作對象，沒有思想的步驟，那就是鑿空，不是假定了。假定或因實行而失敗，然不害及科學的精神，若只有判斷而沒有實行，那可以武斷社會決不會有進步。

其實所謂科學上的判斷和實行，就是我國的知行問題，知而不行，決非真知，行而不知，只是冥行，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是勉勵的訓話，行之非艱知之維艱是革命的教條，然而這是知行艱易的討論，不是研究知行的本體，這我們必須明白的。大凡富於科學的或革命的精神，最注重行，如果不行，那怕怎樣真知，必成無用。若果勇毅的行，那怕這種知是或然的假定，結果必以行而確定知的真範圍。現在一切科學都從行而得其實際，若僅知而不行，無論那一種科學決不會完成。孫先生教人固重在行，但他的真意是希望人們以行來決定知，決不是行而不需要知，這又是我們必須清楚了解的。

我們古代最倡『知行合一』之說的還是明朝的王陽明，他主張的來源就是『格物致知』，這個『格』字，包含很廣，可以說是廣義的思想方法。他說：『知是行的主義，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

有知在一。他又說：『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確精察處卽是知』。所以他主張『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他主張知行最和 孫先生相同的地方，如他說：『今人卻謂必先知而後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得真知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

要之，我們爲什麼要思想？就是就未知的去求實際，就已知的去求真確，所謂求實際，求真確，其目的皆在於行。如果不去行的，那不止反乎科學的精神。而且也不必去思想。

我還要反覆申述的，思想當然以現象和關係作牠的對象，沒有對象，那是玄學，不是科學。所謂自然現象和社會關係，我國古代學者叫牠做『物』和『事』，大學上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卽是指自然的現象和社會的關係。

現代科學我可以讓大家去研究，我且回頭談談我國的古代罷。大家總以爲我國古代沒有科學方法的，完全是玄學的，其實我國古代的研究精神，完全注重在對象，只是以八股詞章取士之後，這種精神才慢慢消失罷了，例如大學一書，程子稱他是『孔氏遺書，而初學者入德之門』。牠怎樣教人呢？開宗明義，便提出『物』，他說：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後知致，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無論治國平天下，以至於修身齊家，最後的結論和最先的前提都着重在『格物』。這個『物』是什麼呢？當然不光是『多識於禽獸草木之名』，所謂『物』即指自然的現象，和社會的關係。朱晦庵解釋『格物』的『格』字，說：

『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怎樣可以窮至事物之理？即古代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若用近代科學術語解釋，即是我所舉『懷疑和觀察，分析和綜合，判斷和實行』三個步驟。王陽明解釋格物，連正心誠意都以物爲出發點，他答羅整庵，說：

『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頭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

而且王陽明之論『心』，很像英國哲學家洛克，洛克以爲人的心其初像一塊白紙，其後積聚無數黑點（即是經驗）才能思想，那就是『心』。而王陽明以爲心的本體，完全是物的感應所積聚，他說：

『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程明道，大家都承認他是極端的唯理派了，他答張橫渠論「定性」怎樣呢？他說：「聖人之喜，以萬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萬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與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

我申述「思想方法」一大段，其意就是我們應該用科學方法去研究自然科學不用說，還且要用科學方法去研究社會科學，我會說三民主義不只合乎科學的，是由科學產生的，所以我先把思想方法詳細解釋了一遍，然後再分別談三民主義。至於三民主義已有孫先生的講演，大家可以詳細研究，我在此地不必再逐章的解答，我只簡略的，述述我們應該如何應用科學實行三民主義，和完成三民主義。好在大家已懂得科學方法，如果我們能切實去行，三民主義的成功是可以按日而待的。

## 一一

現在我先說民族主義。我們不是常時都聽見「近代國家」一個名詞嗎？又聽見「中國還不是近代國家」一句話嗎？近代國家有什麼好處？簡單說，一個國家成爲近代國家就要強，一個國家倘若不成爲近代國家就要弱，或者乃至滅亡。但近代國家與非近代國家之分，還不是單在於有無新式兵器的區別，而在於有無民族主義的分別。中國從前也有過「大一統」之說，但這不過有民族主義的傾向，還不能說有民族主義的運動，因爲這些傾向，不過限於少

數的士大夫知識階級，沒有普遍及於民衆，而且民族主義的意義，也不十分明瞭，因此每一次亡國，一般民衆以爲中國不過換一個皇帝，換一個朝代，而不知道是亡國。大凡民族主義必須普及於民衆，和深入於民衆，才算是民族主義，而且變成了一種宗教性，才算是民族主義。現在我暫時擱下這個問題不談，先在歷史找出我們失敗的事實然後更尋求它的原因，使得我們更明白一點。中國明顯的在歷史上亡了兩次國，一次是宋亡於元，一次是明亡於清，頭一次中國亡了差不多一百年，第二次中國亡了差不多三百年。我們研究歷史的人，平常不是以爲文化高的國家不容易亡國嗎？蒙古和滿洲土地比中國狹，人口比中國少，文化比中國低，而中國卒之亡於蒙古和滿洲。爲什麼？我們翻開歷史來看，非常明白，因爲亡宋亡明者還是中國人，而不是元清人。在元朝最初替元主定大計的是中國劉秉忠，蒙古南侵所靠以爲嚮導的是呂文煥和劉整，至元十年帶兵打閩粵的都元帥是中國的張弘範，至元十六年戰崖山，逼宋帝昴投海的也是張弘範。他替元朝滅了宋朝，立一個石碑在崖門『張弘範滅宋於此』，元史還大書特書『平宋之功，弘範最多』，這不是宋人滅宋的明證嗎？明末雖然先有李自成張獻忠之亂，然後才有滿洲入關，然而讀正史和小說的，想不會忘記洪承疇和吳三桂，清初所謂有功的四王都是中國人。清順治十六年吳三桂追桂王由榔由雲南至緬甸的木邦，緬甸才把桂王送交吳三桂，這不是明人滅明的明證。

近代中國史，對外的戰爭也有好幾次：

第一次是鴉片戰爭，開始於道光二十年而終於二十二年，結果失敗，定了南京條約，最重要之款：

一、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港口。

二、割讓香港。

三、賠償烟價六百萬元，商欠三百萬元。

四、賠償軍費一千二百萬元。

第二次是英法聯軍之役，開始於咸豐七年而終於八年，結果失敗，有天津條約，最重要之款：

一、續開牛莊、登州、台灣、潮州爲商埠。

二、賠償英國商虧二百萬兩，軍費二百萬兩。

三、賠償法國商虧二百萬兩，軍費一百萬兩。

到了咸豐九年，因爲換約不妥，再起衝突，英法聯軍入京師，再答應以下的重要條款：

一、賠償英國軍費一千二百萬兩。

二、開放天津、九江、漢口爲商埠。

三、租借九龍半島。

四、賠償法國軍費六百萬兩。

第三次是中法戰爭，開始於光緒十年，終於十一年，結果中國雖不賠款，但對安南放棄宗主權。

第四次是中日戰爭，所謂有名的甲午之役，開始於光緒二十年而終於二十一年，所訂馬關媾和條約，最重要之款：

一、承認朝鮮自主。

二、割讓遼東半島及台灣澎湖諸島。

三、賠款二萬萬兩。

四、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長沙爲商埠。

其後遼東半島雖因俄德法之干涉，由中國以三千萬兩贖回，但其後俄租借旅順，德租借膠州，法租借廣州灣，英租借威海衛，沿海的要地都入於外國人的手中。

第五次是八國聯軍之役，開始於光緒二十六年，而終於二十七年的辛丑條約，最重要之款：

一、賠償軍費四萬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償還，年息四釐，本息合計九萬八千二百二十三萬八千一百五十兩。

二、許各國駐兵於由北京通海之路。

其餘所謂懲辦禍首，我們已不必研究了。爲什麼中國屢次對外都失利？固然因爲兵甲不

堅，而最大原因還是中國沒有民族主義，還不能成爲一個真正的國家。於此我們或者要問，在宋明時代不用說了，在明清時代，雖然皇帝是滿洲人，而國家總算統一，怎說還沒有成爲一個真正的國家。我們要明白，一國有了民族主義，國家才能算一個國家，沒有民族主義，怎樣也不能成爲一個真正的國家，如果我們拿社會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眼光，來批評中國，我們還是滯留於封建農業組織的時期。誠然，中國的封建制度在秦時候便廢棄了，但封建社會的思想和組織，還沒有根本剷除，我且舉出幾個例罷。

第一是金融 我們不必去考古，姑拿最近前幾年的事來說，中國金融實在沒有統一過。雖然中國也鑄有大洋，而各地還拿銀兩作本位，上海有上海的兩，天津有天津的兩，漢口有漢口的兩，各重要商埠的銀兩成色又不同，至內地各省更是零亂不堪，各自爲政。民國二十四年底，才有法幣的統一，然而中央每一元法幣，等於廣東的紙幣一元三四，等於廣西的法幣兩元，等於雲南的法幣十元。至於輔幣還沒有統一過，我們可以見到今天一元法幣可以換銅元二百四十，明天或可以換到銅元二百四十五（自事變後，法幣低落，更是混亂），我們也許習慣了不以爲奇，但這事是很重要的，因爲金融是人民生活的尺度，這種尺度都不統一，那是人民生活沒有標準。我們看了近代國家有這種事嗎？這完全是封建的組織，人民生活標準的金融都不統一，我們那能說中國真正已統一！

第二是度量衡 度量衡也是人民生活的尺度，人民每天的生活，不外是生產，消費，

交換。而三種生活的過程，無不靠度量衡來貫通。因為度量衡的不統一，社會的生活，便難得有標準。中國的度量衡不統一，不止一省和一省不同，一省之內也有許多地方不同。我們不要小看度量衡，這也是文化的尺度。我們所謂文化，至少須包含兩種東西，一種是行爲，一種是技術。前一種人們都明白所謂行爲就是道德，而後一種技術往往被人忽略。中國的長城是中國的文化，中國的運河也是中國的文化，然而這些絕代技術，沒有度量衡是不會成功。倘若度量衡不統一，最少在生活上生出道德的詐欺，在思想上生出技術的模糊，前數年政府雖設有度量衡局，但始終格於各處的習慣不能完全統一。

第三是租稅 我國的租稅都因地方而殊，有些是關係歷史的，例如江蘇的蘇松太區的田賦特別重，有些是關係政策的，例如邊省的田賦比較輕。然而這還是由歷史和政策傳襲而來，但有些人爲的，有田的未必納糧，有地的未必納稅，反而田地愈多的愈不必納糧稅，這種完全是封建的表現，只知道有地方而不知道有國家，只知道有個人而不知道有國家，至於不依法律，任意附加，任意勒派，那更是封建組織的表現，這種現象，至今日還是未能消滅淨盡。

第四是法律 現在我國固然有一部很完整的法典。就是前清罷，也何嘗沒有一部大清律例？可是這種法律是沒有普及於民衆的，或者僅僅成爲少數人舞文弄法之具的。我見各地的鄉村不只滯留於封建社會時期，甚或滯留於宗法社會時期，各鄉村對於人民犯了罪，可以

不依法律的手續而用家法懲治，不只可以用體刑，而且還可以處死刑。在近代國家這些現象都是沒有的，而中國對於這種現象，隨此皆可發現，一般人恬不爲怪。

以上我所舉的例，大概可以夠了，我爲什麼不憚煩舉出這些例，就用以證明今日中國猶是停滯於封建的思想和組織，我們非把它抬上民族主義之路不可。封建爲什麼不好呢？我不必詳說，我們只自問一下，以一個封建來征服一個部落容易不容易？如果說易的，那麼以一個國家來征服一個封建也是一樣的容易。我們不要以爲中國人口多就有辦法，人多而沒有民族的意識，結果還是做人家殖民地。印度不是有三萬萬多的人民嗎？可是印度不只有佛教回教的內爭，而且印度還有二百多王侯，各擁土地，各撫人民，各賦租稅，各不統屬，因此三萬萬多的人民，變成了無數封建少數的人民，印度便變了殖民地了。

蘇彝士運河以東，在陸上的印度，安南，緬甸，在海上的荷屬東印度羣島，馬來半島，都是歐洲的殖民地。中國到了今天積弱的情形，都是因爲以前沒有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來源是什麼？雖然血統，語言，宗教，風俗，習慣，做了它的骨幹，但來源是由民族性和愛國心。民族主義并不是很舊的東西，在十六世紀時，雖然因宗教的改革，各宗教有統一民族的要求，但近代的民族主義，到了十八世紀才正式發生，到了十九世紀而發展，到了二十世紀而大成。民族主義從前雖然拿着血統，語言，宗教，風俗作骨幹，但現在這些骨幹已不大重要而以經濟單位作它的命根。現代國家中也有以不同血統語言宗教風俗而做

成一強固民族主義的，大如美國的人民，血統至爲龐雜，小如瑞士的人民，也有三種語言，然而他們的民族主義還很強，所以今日的民族主義實在以經濟單位爲骨幹。不過中國的民族主義更有希望，因爲四萬萬人民有同一的血統和文字，至於宗教的成見早泯，而風俗亦大致早趨於大同。何以經濟單位就是民族主義的命根？那很明白，因爲國家的成分就是人，人是要生活的，并且要共同生活才能生存的。從前部落時代，人的經濟單位只限於一個部落，若到了近代國家，那經濟單位便擴充爲國家。國家興盛，人才能生活，國家滅亡，人便難於生存。不過民族主義還要靠科學來增進的，并非單靠一句空話就可以形成的。民族主義發生於十六世紀，何以到了今日才至尖端？因爲十八世紀有了工業革命，所以把封建摧毀，來建樹一個近代國家，末後科學一天天進步，把大的地方縮成小的地方，有了鐵路輪船，有了電話電報，更有了無線電播音，人民的意志愈易勾通，地方主義也就跟着摧毀了，經濟單位也更鞏固了，民族主義也更完成了。

中國自孫先生提倡民族主義以來，至今已四十餘年，自然我們還不能算成功，但是人民心目已有了牢不可破的民族觀念，可以說是中國已走上民族主義之路。近十年以來中國接受科學的精神，也與日俱進，因交通器具的發展，民族主義的運動更是一日千里。公路建築起來了，鐵路線也慢慢增長了，電報和長途電話也建設了，無線電播音到處都有了，人民的意志逐漸統一，民族主義也就有了意外的進步，所以我們要完成民族主義，更要格外應用科



學。旁的不必說，就是我剛才所舉中國未有統一的金融，度量衡，租稅，法律等，無一而非與重要科學有關，或則是自然科學，或則是社會科學，都須我們加緊去研究和實行的。歸結一句話，我們若不努力應用科學，民族主義的運動，還是無法進步。

## 三二

凡讀三民主義的，一定已經了解民權主義的真諦，一定已明白政權的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和治權的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考試了。這是民權的原則，我不用去講。我所講的是如何才能實現民權，及如何應用科學去完成民權。民權主義是和建國大綱有關係的，建國大綱規定一縣的自治成立，還有許多條件，例如建國大綱第八條：『在訓政時期，政府常派曾經考試訓練及格之人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衛辦理妥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實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定一縣之法律，始完成一完全自治之縣。』

我們一定很覺得奇怪的，民權主義要實行就實行罷了，爲什麼要附許多條件。我們要知道實行民權，一定要有民權的素養，我舉出兩件事給大家看：

自民國成立以來，我們也有過國會，就是各省也有過省議會，可是國會後來終歸失敗，

因爲各議員大多不能代表民意，也有贊成帝制的，也有參加賄選的。爲什麼？因爲沒有民權的素養，這是一件。我初讀了民權初步，也覺得驚訝，孫先生爲什麼寫這本書，這都是很淺白之事，不必去勞神著述的。然而不然，我在北伐時候，到湖南，湖北，江西，召集許多民衆大會；那時人民革命的情緒很緊張，可是會場岑亂沒有秩序，連用拍掌來表示贊成都不會。後來政治部派去的指導人，大聲喊着『拍掌呀！』他們才懂得拍掌、不但普遍的民衆會如此，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集會，也會時時爭吵打架，這種舉動也不純因政見問題，只是不守秩序，不守章程，你說他們不懂得開會嗎？懂是懂得，不過沒有那種素養。這又是一件。因此我才恍然於『民權初步』之有價值，同時又感到訓政有它的深意。

今日我們要談民權主義，必要談自治。自治沒有成功，那就無法談民權。一個人民不懂得自己要做的事，怎樣能懂做國家的事。我們要知道憲政時的憲法，無論是屬於那一國的，又無論它道理怎樣深奧，千言萬語，不過一部分規定人民要政府做的是什麼，一部分規定人民自己要做的又是什麼。除此兩部以外，憲法便一無所有。人民要政府做的，那就是議會組織和權限，和保護人民自由等問題，至於人民自己要做的，那就是自治了。

自治這件事在前清末年就籌備過，自入民國以後，也有好幾次籌備過，但籌備只管籌備，而終不成，並且還有些省份請求緩辦自治的，我以爲自治兩個字，恐怕大家也聽慣了，而且聽得討厭了。我個人爲了這件事會費了很長時間去研究。在歐洲各國人民是爭着自治的，

并且以鬥爭和流血去爭自治的，而中國人民倒怕自治，其故安在？我不能不去澈底考查它的歷史。歐洲沒有議會以前，也有地方自治的雛形，在十八世紀之前，歐洲各國還沒有統一，當時還沒有德國和意大利。中歐都是小諸侯和寺院割據，就是英國在十六世紀雖然形成一個國家，但諸侯和寺院力量還是很大的。

這些諸侯和寺院，實際上就是該地人民的主人，他們可以對於統轄下的人民無限的課稅，無限的要求物品的供給。這些諸侯和寺院又多數是窮奢極慾，浪費無度的，他們恐怕誅求人民太甚，生出反動，於是假設名目去逼勒人民，說我們要辦學校，築道路，辦警衛，不得不向人民增稅，就想藉此在中間剝削。然而人民是難於欺騙，說到辦公共的事，他們不好不出錢，但他們覺得這班諸侯和寺院拿去的錢，不一定全數拿出來供公眾之用，於是慢慢他們便組織起來，向諸侯和寺院要求，說爲着教育交通警衛，我們不能不盡力供給，然而這些事都是爲我們大眾的。所以我們固然願意出錢，但是我們情願自己去辦。這班諸侯和寺院雖然不願意，但因爲人民理直氣壯，也只好答應他們的要求，這便是歐洲自治之始。不但歐洲的地方自治起源如此，連國會起源都是如此。英國最初的國會成立，就是英王向人民要求太多，於是人民起來要求，說政府要錢用是應該的，但是我們要參加審查預算，如果對的我們願意出錢，不對的我們不願意增稅，英國的大憲章是世界立憲之母，而其初起源是由於人民審查政府用途的要求，而這個起源又由於地方自治的雛形影響。

但在中國就不然了，中國歷史本無地方自治的事，人民只知對政府納稅，自己地方是素來不管的，政府也只知道收稅以供國用，對於地方也是不管的。我考察它的來源，最初是由於漢初『不擾民』的原則變衍而來。中國古代春秋和戰國的諸侯也是和歐洲一樣，對人民無限課稅和要物品供給的，至秦時更大興土木，征戰不息，於是有陳涉之變，楚漢之起。到了文景之世，知道『養民』是安天下的不二法門，當時雖然表面崇尚儒術，而骨子裏實在已採了黃老無爲的學說。賈誼是漢初有名的人物，他論斷秦朝的失敗，作過一篇『過秦論』，他說：

『二世之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深刻。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卹，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困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

這個『動』字就是描寫秦朝失敗的原因，所以漢朝承秦之後，若要他不失敗，最好叫百姓不動。怎樣才能使百姓不動呢？最好是不擾民。所以中國史家贊揚漢初文景之世，有兩句話『節衣食而用弗窮，務無爲而民不擾』這十足表示中國政治的最高原則。

但不擾民是一件好事，無論誰當政治之衝，也不願擾民。然而不擾民是一件事，不教民又是一件事。自漢以後，歷朝政治，最好的做到不擾民，至於教民誰也不肯去費心思了。孫先生在民權主義第二講內，曾指出中國歷史上政府不教民的原因，他說：

「中國古代封建制度破壞之後，專制淫威，不能達到普通人民，由秦以後，歷代皇帝專制的目的，第一是要保守他們自己的皇位，永遠家天下？使他們子子孫孫可以萬世安享。所以對於人民的行動，於皇位有危險的，便用很大的力量去懲治。故中國一個人造反，便誅到九族，用這樣嚴重的刑罰去禁止人民造反，其中用意，就是專制皇帝要永遠保守皇位。如果人民不侵犯皇位，無論他們是做什麼事，皇帝便不理會。所以中國自秦以後，歷代的皇帝都祇顧皇位，並不理民事，說到人民的幸福，更是理不到。」

因為政府不理民，人民便沒有自治的習慣和素養，人口多少是不清楚的，土地測量是不願辦的，地方警衛適足以便土豪劣紳。而四境縱橫道路更像羊腸小徑，誰也不願而且無法去建築，至於四權運用更無從談起了。

縣令本是親民之官，然而國家既採了不擾民不理民的原則，他們也樂意去偷懶。縣政府除了收稅之外，差不多無事可辦。不止人民的幸福他們不去管，連人民的禍害他們也不去管，所以歷朝雖然都有一大部法典，若鄉村內有偷竊的案件，差不多不告不理，任山鄉村自己處治。前清甚至遇着姦殺事件，倘若苦主不告，縣政府也索性裝聾作啞不去自擾擾民了。

人民數千年以來，既沒有自治習慣，現在早一條法令晚一條法令，要他們辦自治，他們自然感覺麻煩。而且辦自治是要錢的，中國農村亦貧到這樣，他們怎能去自力籌款去辦學校築路警備？所以中國自清末以至現在，無一年不喊自治，而無一年能辦成功。一半是人民沒

有歷史的習慣，一半是農村沒有自治的經費。

我們現在已明白了沒有地方自治，民權主義是難得實現，而為實行地方自治，非靠科學的促進不可，別的恐怕範圍太廣，我現在舉出兩件急不容緩之事，其一是農村教育的增進，其二是農村經濟的發展。這兩件事如果沒有方法，我敢判斷地方自治終無由完成。

第一 教育的增進 我們要知道民權的極則，人民是要運用政權的四權的，而運用四權是必須組織的，就是低級鄉村的自治吧，人民也需要組織的，說到組織，最低而最基本的，就是集會。中國農村的教育局太低下了，不要說教育，就是識字和用字的程度也低得駭人聽聞。我還記得民國二十三年江甯是江蘇的實驗縣，梅思平先生是當時的縣長。他告訴我鄉村每次集會，人民無論男女也很踴躍參加，但參加雖是參加，而開會總是難於成會。因為人民識字固然不多，而用字更是出奇的少。例如開會必須舉出一個主席，縣長問開會的羣衆，今天開會，大家應該舉出一個主席，你們願舉誰，臺下便有人開口，我舉王阿狗，縣長問大家贊成嗎？臺下許多人答贊成。這樣王阿狗便上臺當主席了，但是王阿狗不上臺還可，一上臺便有一二十個王阿狗，你所贊成的王阿狗和我所贊成的王阿狗不是同一個人，這樣連主席都舉不出來，會也無法繼續。至於女的比男的同姓同名更多，凡李姓女子嫁王姓的，都是王李氏，一村裏面，往往百分之九十是王李氏，如果是舉出王李氏當主席，那差不多會場裏的羣衆，大半都是主席。農村識字和用字這樣少，對於自治是有極大的問題了。

受教育固然是人民一種義務，同時也是人民一種權利，在現代國家，人民若沒受過教育，差不多可以說缺少一種公民的資格。中國古代所謂『不教而戰是謂棄之』。其實就是不教而生存，也是棄之，上次歐洲大戰，俄國首先失敗，其實固然有許多原因，而最大原因之一，就是士兵多數不識字，往往命令叫他往東，他反而向西，士兵要是不能完成職務，戰爭一定是失敗的。上次歐洲大戰，俄兵潰敗之後，不獨因不識字而不能回國，還有些不能回家，他們脫伍之後，向人問路，他們的家鄉在何處，人們問他的家鄉叫什麼名字，他說叫做斯密士，但俄國村叫斯密士的無慮千百，屬於那一省那一縣的斯密士，他們也不懂得。

民權運用的長處，最重要的就是監督政府，人民既不識字，對於政府的法律命令是不懂得解釋的，或者是解釋錯誤的，不懂解釋法律命令，固然不能監督政府，錯誤解釋法律命令，也同樣不能監督政府，所以要實行自治，首先還要推行普及教育，推行教育是不是可以靠科學？

第二 經濟的發展 這個問題更是嚴重了。我剛才不是說辦理地方自治是要錢的嗎？人民既沒有錢，自治從那裏辦理。我考查農村的貧困的原因有幾種：

(一) 農民的技術不夠 我國數千年以來，號稱以農立國，其實我們以農立國的條件還不夠，水利沒有講求的，租稅是不確定的，經界始終沒有完成的，種籽從不改良的，土壤也不調查的，單以害蟲而論，據專家估計，農民因蟲害而損失的農產品，每年就到十二萬萬

而且農村的副產品，例如養牛養豬養雞，每年因瘟疫死亡的其數就不可統計。這是中國農村貧困之一。

(二) 鄉村的交通太難 中國的糧食是不夠的，中國每年糧食進口要佔總輸入百分之十以上，這幾年戰爭不用說，自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中國算是安定的，但糧食入口依然佔輸入的重要地位。二十一年糧食進口總值爲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二萬零二百四十九元。佔全入口百分之十二強；二十二年算是豐收，然而數目越是可驚，總值爲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七萬零八百元，佔全國入口百分之十九強；二十三年總值爲一萬零四百六十二萬八千九百六十一元，佔全入口百分之十強。中國內地也有些地廣人稀的，但是很難開墾，因爲交通太不便，縱有糧食輸出，而交通的成本太重，比之由安南暹羅輸入糧食，還要昂貴，因之沿海不能不從外國輸入糧食，而內地各省絕不能增加農產。我估計中國糧食約缺百分之五，若以人口來論，即是有三千萬八民沒有飯吃。內地糧食價格，無法輸出，即無法提高，而沿海各地也只有從外輸入糧食，因此無論何地的農村，皆露貧困之象。

(三) 農民土地過少 我們全人口，農民佔到百分之七十五，這個估計是很相近的。但惟其農民太多，他們分配的土地遂隨着太少。據一般的估算，農民能力可以耕作十五畝（見國聯專家報告）這和金陵大學所估算每農戶分配八十畝爲適度的差不多（每農戶以六人計）。然而這僅是理論，僅是一種希望，中國農民的田地，據專家估計，每人僅得三畝多，



這絕不夠農民生活的。

中國農民每年有沒有剩餘呢？我從各專家的統計中，可以證明不只沒有剩餘，多數還是負債。據劉大鈞的估計，中國農民食料，每日約爲一斤，照這樣算法，單以食料而論，在北方需要一畝零六分的生產，在南方需要一畝之九分的生產。除食料以外，還有燃料，芻秣，衣服等必需品，不能不需要更多的土地來生產維持，據劉先生的估計，只維持赤裸裸的生活，北方至少需要四畝，南方至少需要二畝，平均來說即是三畝，但據徐禮康的浙江省臨安縣農家調查，每個農民每年需要衣四元，食四十元，住兩元，其他六元，臨安這樣生活，也不能不算簡單，可是已和劉先生的估計大有出入。照臨安生活和現在的糧價，如果是兩熟的田每人需要五畝二的田。如果是一熟的田，每人需要八畝六六的田，然而賦稅還不在內，疾病婚喪的費還不在內。

農民這樣貧困，不獨影響地方，還更影響到國家，因爲：

其一，一國的建設，不能不靠人民拿出一部分的儲蓄。人民救死不贍，焉能有餘力投資建設？國家之穩定，最要緊的是人民經濟發展，若經濟停滯——衰落還不說，整個社會要後退的，譬如人穿的衣服要壞的，住的房屋要破的，不能說經濟停滯，而衣服房屋也停滯住不壞不破。所以停滯卽爲衰落，這是一種自然。國家經濟日日往衰落路走，政治絕不會安定。其二，人民缺乏儲蓄，絕不能感受天災人禍，據李逸安的考查，我國荒地每年增加。民

國三年荒地增至三萬萬畝，民國六年增至九萬萬畝，民國十一年增至八萬九千萬畝，最厲害是民國十九年，荒地竟直增至十一萬萬七千萬畝。一面耕地已少，一面荒地增加，很顯然的經過天災人禍以後，因平常沒有儲蓄，無力再耕，只好拋棄。我們試看每年人民逃荒之多，可以決斷人民平常實在沒有儲蓄，以百之七十五人口統統沒有儲蓄，中國政治之始終不能穩定，其中緣故，已極顯明。

人民沒有自治的習慣，又沒有生產的盈餘，而現在要他們辦理自治，朝頒一法，夕行一令，今日要辦一家學校，只好在農田附加了，明日要築一條公路，又只好在農田附加了，後日要辦地方警衛，又只好在農田附加了。農民所僅有的幾畝瘦田，已是救死不贍，何況日夕附加，因之自治未成，人民骨立，這是爲什麼人民不歡喜自治，倒要請求緩辦自治的原故。因之，我們要明白民權主義也不是徒然喊幾句口號可以完成的，增進農民的教育，要靠科學，發展農民的經濟，也是靠科學。倘若大家不從科學去着眼，民權主義必難成功，這又是我們必須要了解的。

#### 四

至說到民生主義，更需應用科學了。孫先生在民生主義第二講曾說：

『我們要解決中國民生問題，想求一勞永逸，單靠卽制資本的辦法，是不足的……所以

中國不但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要解決民生問題，一定要發達資本振興實業。振興實業的方法很多，第一是交通事業，像鐵道運河，都要興大規模的建築。第二是鑛產，中國鑛產極其豐富，貨藏於地，實在可惜，一定是要開闢的。第三是工業，中國的工業非趕快振興不可。」

他跟着又說：『我先講過，中國今日單靠節制資本，仍恐不足以解決民生問題，必加以製造國家資本，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何謂製造國家資本呢？就是發展國家實業，這項發展實業的計劃已詳於建國方略第二卷的物質建設，又名實業計劃，這本書把製造國家資本的大概，講得很清楚了。』我們談民生主義，對於孫先生的實業計劃不可不看，并且不可不詳細的看。在這本書實業計劃的結論，他更標明他的目的。他說：『世界有三大問題，即國際戰爭，商業戰爭，與階級戰爭是也。在此國際發展實業計劃中，吾敢爲此三大問題而貢一實行之解決』。如果他的計劃能夠實行，這三種戰爭都可以消滅。更深言之，如果他的計劃能夠實行，民生主義也可從此實現。然這本實業計劃，無一而不靠應用科學，並且更要靠高深的自然科學。

我可以告訴大家，中國要實行民生主義，時間還要很遠的。孫先生對於建國目的，最終是民生主義。在消極方面，他應以平均地權以消滅封建勢力，應用節制資本以防止資本主義。在積極方面，他應用製造國家資本以達到他所提倡的民生主義。

怎說平均地權是消滅封建勢力呢？中國和歐洲的歷史都是一樣，最初的封建是建築於土地之上，因為那時生產除了土地之外，幾乎沒有別種方法，凡經濟力所附着，而政治力也隨之發生。所以古代諸侯的勢力是在封地，而今日土豪劣紳的勢力還在土地。若能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封建勢力也就消滅了。耕者能有其田，不止大多數農民可以得到經濟上的自由，並且得到政治上的自由，這是孫先生一個目的和方法。

怎說節制資本可以防止資本主義呢？孫先生以為中國經過國民革命，不應再有社會革命，因為社會革命的對象是資本主義，中國今日還不能說已有了資本主義，我們為什麼不預先用節制資本的方法來防止資本主義發生。他舉出經濟進化的方法，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是運輸與交通歸公有。第三是直接徵稅。第四是分配之社會化。這都是限制私人資本的方法，免至私人的資本發達，生出大富階級的不平均。

然而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還不夠，因為要達到民生主義的鵠的，必要得產業發達，而產業發達也必得靠資本，不過孫先生不願意私人資本發達，恐造成中國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數人民還是受苦，再來一次社會革命。所以趁中國私人資本還未有力的時候，提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並且提倡製造國家資本，極想於國民革命之中，以平和方法實現社會革命的目的。

現在許多人以為不談革命則已，一談革命便須流血的。因為他們以為國民革命只是一種

過程，若由國民革命而至社會革命還要流一次血。這種幼稚見解，太不了解社會的科學演進了。外國 Revolution 一個字原本是轉變的意義，中國沒有適當的譯名，祇好譯作革命。而這名詞初入中國，便首先碰着政治革命，以故大家總以為革命是要流血的。外國大凡有科學的新發明，都叫做 Revolution (革命)，難道科學的革命也必須流血嗎？國民黨是革命黨，既展開了國民革命，握有政權，而且還能於國民革命之中，可以漸次實現社會革命的目的，爲什麼一定還要流血，爲什麼還要『人革命』？

民生主義是孫先生最終的鴿的，所以對於民生主義的演講也特別詳盡，只是有一點，他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被許多人誤解了，尤其中國的共產黨想借國民黨的招牌來擴張自己的勢力更故意曲解了。實在孫先生的意思，以爲共產主義的目的跳不出民生主義的範圍，以故把共產主義包括於民生主義之內。他在民生主義講演內，首先批判馬克斯對於歷史觀察之失當，其次嚴厲批評馬克斯對於革命方法之不妥，我請大家細心去讀民生主義演講，自然孫先生會給我們結論。

凡一國家在它困難時期，一般青年最容易接受激烈而簡單的理論。中國自民九以來，二十年中很受共產主義的宣傳，一般青年往往不問歷史的過程，不問環境的現實，專拿一兩個外國翻來的名詞，來作宣傳和自慰之具。例如共產黨的唯一宣傳利器是辯證法，但根本上便沒有人去研究辯證法。現在共產黨人在中國翻來覆去宣傳，只拿着陳望道所譯的共產宣言，

馬克斯最著名的『資本論』，至今還沒人讀過，並且沒有譯過。我爲着喚起一般青年起見，於演譯民生主義之後，特別提出共產黨根本理論批判。我在所著『革命與思想』一書中，曾詳細寫了一章，指出辯證唯物論的矛盾。我說：

對於思想方面爲什麼不贊成辯證法？爲什麼不贊成由辯證法孕育出來的唯物史觀？我想在本章稍爲詳細的去申明我的理論。

現在許多人們都知辯證法是馬克斯的，而馬克斯又承襲黑格爾的哲學來擴展的，至於最初主張辯證的希臘哲學者舒諾（SENO）便有許多人不知道了。我們除非不談辯證法則已，若談辯證法還得要從舒諾談起。

舒諾是紀元前五世紀的人，他可以算是談辯證法的鼻祖，他第一個說明動作矛盾性，他以爲我們如果不利用辯證的方法，不明白正面和負面的結合，人們的思想必會走不通。在他的辯證中，他舉出一個例，譬如一枝箭射出去，他以爲它在空間是不停的，但是仔細研究，在飛射的過程，在某一點上牠是佔了某個空間。如果這理論是不错的，那麼那枝箭在飛射時期，在某一個時間牠是靜止於某一點，那就是不動。照這樣看來，這個事實很是簡單，所以毋須再有什麼正負兩面解釋了，不過我們要知道，那枝箭雖然佔了那個空間，同時牠也離開那個空間，假使不明這正負兩面的肯定，我們便無從去談動作。假使我們只承認正面或負面的那一面，不獨動作談不到，連箭的本身也弄不清楚。人的判斷也是一樣的，因爲無論那一件

事物，那一種現象，都有多面而且多種環境的關係，如果你不從正負兩面去想，那就不能判斷，縱使有了判斷，也一定不確。

舒諾這種理論自然是形而上學的思想，到了黑格爾，便拿辯證法作了他的哲學基礎，他拿辯證法做了思想的進程，以爲思想的發展，唯一是在正負兩面的矛盾，例如甲乙正負兩面，結合使生出丙的道理，丙不久又成正面生出了丁的負面，結合丙丁正負兩面，又生出戊的道理，這樣發展下去，可以達到最高和絕對的精神。黑格爾以爲思想的進程是自動的，這些發展過程和自動是人類傳統的衝動之結果。

所謂辯證法就是希臘在舒諾時代的辯證方法，當時以爲唯有辯論始能得真理，因爲辯論時候，聚集各方面的豐富理論，不同見解，可以使辯論者推陳出新，獲得最後結論。黑格爾深信這種方法是一切動作的根據。用正負的矛盾方法，可以使舊的思想排除，新的思想產生，一切發展皆由此起。

在馬克斯派以爲黑格爾的辯證法只是理想的，自馬克斯承繼之後才變爲真實的。馬克斯發見了辯證的唯物論，他以爲正負的矛盾，不但可以應用到思想，並且可以應用到自然科學和社會制度。這種方法可以使人們分別真實的矛盾性，可以使人們了解真實的重要性。由真實的反射，可以使觀念的進程和外界的事物吻合，而人的自覺也應拿辯證進程方法去吻合反射的事物。要而言之，黑格爾的辯證法是理想的，馬克斯的辯證法是真實的，這是馬克斯派

自以為和黑格爾不同的地方，也比黑格爾進步的地方。

以上所談是辯證法經過的歷史，不過我們不要忘記的，辯證法到了今日更是不同，前三年我看見許多譯書，差不多又把辯證法脫離了馬克斯的原型。從前很像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不夠的，是理想的，馬克斯的辯證法才是真實的，現在像馬克斯的辯證法還是不夠的，不過只是真實的，只有列寧的辯證法才是實踐的，將來發展到什麼地步，變遷到什麼地步，我們是不可預知，因為這已不是理論問題，而是俄國的政治問題了。

馬克斯由辯證法而產生辯證唯物論，這是一件事實，那麼我們可以看看他的理論怎樣？據馬克斯的研究，這種辯證唯物論的用途，牠的最大目的是用以說明無產階級的革命。拿辯證法作基礎，他判定無產階級的革命是要經過許多過程，資本主義發達極度的結果，最先是大資本壓迫和吸收小資本，其次因為小資本沒有了，所以中等階級完全消滅；又其次沒有中等階級了，所以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形成兩種敵對的壁壘，最後有產階級自掘墳墓，無產階級革命成功。

馬克斯的預言和判斷對不對呢？我們可以分開事實和理論兩面去觀察。

其一是事實的。大凡事實之有否真實性，最大的證據是在事實的逐漸實現而沒有間斷，如果有間斷的，就不能算是真實。自馬克斯提出這種主張在共產宣言那時，距現在也有八九十年了，各國的小資本，我們實在不能勉強申辯都被大資本吸收，不止沒有吸收淨盡，而且



反有增加的趨勢。爲什麼呢？因爲世界的技術日有進步，從前馬克斯時代的非技術的工人，現在大部分都變了技術工人，他們的工資日有增加，不止可以維持日常生活，並且可以有剩餘，這種剩餘補了工人的財產，以故由無產階級的隊伍脫離了加入了中等階級的隊伍。

中等階級的增加是馬克斯預言和判斷的致命傷，照馬克斯的理論，無產階級的革命成功，其條件先要形成有產和無產兩大壁壘，中間實在不能有第三者阻隔。譬如戰爭一樣，必定兩軍對峙，陣線分明，才可打仗，倘使兩軍的中間有了一隊中立的軍隊，那就這次戰爭，無從打起，誰 誰負，更不必談。

自然馬克斯的時代和今日不同，他事前至少沒有想到兩點，第一點是政治上的制治和均衡 (Check and balance)，因爲無論任何政府，他的目的最要緊是安定。唯其愈極端資本主義政府牠愈不想出制治和均衡的方法，所以在社會主義的國家固要設法解決勞働問題，尤其資本主義的國家，更不能不設法解決勞働問題，現在資本主義國家所以能夠維持安定，就在於靠這政治上制治和均衡的方法。不止如此，在經濟學方面，目前已不像亞當斯密，李克圖 (Ricardo) 等古典派的解釋，自佛柏林 (Vahlen) 派主張經濟實在以制度作根據以後，各國都受了深切影響，尤其近十年以來，各國政府已不走放任政策之路，由是勞資兩方都受國家的限制，這也足以使兩方壁壘衰弱，沒有馬克斯理想上這樣堅強。第二是技術進步，每每使勞動的時間減少，工資增多，馬克斯認爲具有階級革命性的工人，很容易稀弱他的

階級性，例如上述中等階級的增加就是一件實例。此外還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原因，例如十九世紀民族主義的極度發展，尤其歐戰前後，各國的民生主義已跑到尖端的白熱狂，這且使國家鬥爭壓住了階級鬥爭的另一個實例。

其次是理論的。我看不出辯證的唯物論是拿辯證法作基礎。如果我們就純理去判斷，無論舒諾的辯證法，黑格爾的辯證法，都不是極端宿命和獨斷的，馬克斯既然以為他的辯證法是真實的而不是理想的，那就更不能宿命和獨斷的。他認大資本吸收小資本，中等階級消滅以至有產無產兩大階級形成兩個壁壘，這種判斷實在充滿宿命和獨斷的氣息。辯證法的原理，就是正負兩面的矛盾結合而成真實，我們現在假定有產階級為正面，無產階級為負面，那麼中等階級究竟算是那一方面呢？固然在馬克斯派的解釋，尤其事後勉強的解釋，以為今日中等階級算是已經消滅，因為中等階級目前雖然存在，究竟沒有正實力量，只不過是有產階級的工具，所以把他們打入有產階級的壁壘。可是事實上并不這樣簡單，對於推翻現存社會制度，中等階級是難得贊成的，多少站在有產階級的壁壘的，對於增加工資和減少時間，他們是極端贊成，站在無產階級的壁壘的。而且中等階級的主要部隊還不是自由職業者如商人，他們的大本營還是農民，馬克斯未嘗不見到這點，所以在共產宣言內主張無產階級者先和農民聯合革命，不過他沒有想到農民的要求第一是土地，第二是減稅，第三是農產品高價，這大羣的中等階級都自成壁壘，并且他們的壁壘很是堅固的。現在雖然社會主義者想拿集體

戰場去根本搖撼他的壁壘，可是這些農民的中等階級色彩能夠減少幾許成分，還是要等待時間告訴我們的。復次每一件事物的本身都含有自動性，否則正負兩面的矛盾，生不出了實質，然而這兩面矛盾舒諾和黑格爾的理論是繼續不斷的，馬克斯承襲了黑格爾的辯證法也沒有放棄這一點的。可是馬克斯由資本主義推到中等階級消滅，乃至無產革命的獨裁成了正面，那麼永沒有負面了嗎？如果永遠沒有負面，那便不是辯證法的法則，如果還有負面的話，那麼馬克斯的判斷還不算真實，這個論理學上的『兩難論』是沒有方法可以解釋的。就辯證法的本身來說，馬克斯這種判斷并不是辯證法而是宿命論，獨斷論，所以我根本以為他的唯物史觀辯證法發生不了深切的關係。

馬克斯的唯物論和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同一有他時代的價值，同一不切合於後來的事實變遷。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出後，震撼一時，他也沒有想到後來人口增加沒有像他所想的幾何級數，他也沒有想到後來技術進步，食物的增加并不止算術的級數而且遠超過幾何的級數。所以社會科學不單是一面的而且是多面的，如果想以宿命論或獨斷的方式去判斷以後的結果，十個推論之中倒有十個不確當。

馬克斯的學說，無論在理論，在事實，都不足以自完其說，就是蘇俄的革命，牠所行的制度，以及牠控制下第三國際的行動，全都出乎馬克斯的判斷和預言，他們也只是掛了馬克斯的招牌，而實際反乎馬克斯的判斷和預言。因此我常批評，目前蘇俄只有共產黨——其他

國家更用不着說——而沒有什麼共產主義，蘇俄只有共產黨的政權，也沒有什麼共產主義。以理論和事實都走不通的東西，而要搬到中國來，以蘇俄都辦不到的東西，而要搬到中國來，這並不是『非愚則妄』。簡直是欺騙我們民衆罷了。

因此中國所應實行的，而廣大羣衆所需要的，是孫先生所提倡的民生主義。民生主義不只是中國社會科學必然的產品，而且更要高度科學才能完成。我們談民生主義的人們應該怎樣拿科學精神去研究牠，實行牠，我們大可以深長思之了。

## 五

於此，我們應該作一個結論了。我雖然把三民主義分開來解釋，三民主義并不是分離的，并不是先行了民族主義，才行民權主義，最後才行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實是一貫的，三種主義應該同時實行的。孫先生的意思以爲別國的革命，或者僅有一個民族主義，或者僅有一個民權主義，從來沒有注意到民生主義，他很願意三民主義併行，使中國一次革命，便臻於他的理想，使得後來不會更有革命。

現在還有許多人以爲三民主義不容易實行，其實天下決沒有難行之事，只在沒有堅決之心。譬如拿民族主義來說，孫先生曾經指出：『我們想要恢復民族的精神，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我們知道現在處於極危險的地位，第二個條件是我們既然知道了處於很危險

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國固有的團體。像家族團體和宗族團體，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國族團體結成了國族團體，有了四萬萬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奮鬥，無論我們民族是處於什麼地位，都可以恢復起來，所以能知與合羣，便是恢復民族主義的方法。能知與合羣這兩個條件太重要了，也太簡單了，現在我們四萬萬人無人不知處於極危險的地位，可是說到合羣倒是知而不能行，這并非不能，實在還是沒有決心的原故。

不過我對於三民主義還有未盡之意，趁在結論時說說。

第一，我們要知道我們的責任確是很大而前途極是光明的，我們要完成民族主義，不止是復興中國，還得要復興東亞。在蘇彝士運河以東，除了日本暹羅以外都是歐洲的殖民地，孫先生曾講過大亞細亞主義，他說：『在亞洲東部最大的民族是中國與日本，中國同日本就是這種運動的原動力。』從前中國和日本都沒有這種認識，也都蔑視了自己的責任，不獨不共同奮鬥，而且雙方盲目戰爭。這次事變倒喚醒了中日兩國的人民，歐洲第二次大戰更提起了中日兩國的認識。因此中國須要急速完成民族主義，一方是自救，而另一方還要救人。所以我們責任是重大的，我們決不要因時局艱難而自餒，更要因時局艱難而提起我們精神，和負起加於我們的責任。

第二，民權主義，我們決不要誤會是歐美放任自由主義的民權，三民主義的民權，是經過革命的洗禮的。孫先生在民權主義第二講，曾說：『外國革命是由爭自由而起，奮鬥了兩

三百年，生出了大風潮，才得到自由，才發生民權。從前法國革命的口號，是用自由博愛平等，我們革命口號，是用民族民權民生。究竟我們三民主義的口號，和自由博愛平等三個口號，有什麼關係呢。照我講起來，我們的民族，可以說和他們的自由一樣。因為實行民族主義，就是為國家爭自由，但歐洲當時是為個人爭自由。到了今天，自由的用法便不同，在今天自由這個名詞究竟是怎麼樣用呢？如果用到個人，就成了一片散沙，萬不可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要這樣做去，便要大家犧牲自由。可見民權主義絕對不贊成歐美普通民主制度的個人自由，換言之，國家的自由高於人民自由，因此國家的利益也高於人民的利益。至於建國大綱更規定得清清楚楚，人民不是『誓行革命之主義』的，沒有選舉權，第八條末段說：『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誓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設立一縣之法律，始成為一完全自治之縣』。因此我們要憬覺，光是中央有了一個國會，地方有了一個議會，還不是孫先生所說的民權主義的，光是實行了歐美的形式民主制度，也不是孫先生所說的民權主義的，我們一定要人民誓行革命主義，懂得為國爭自由，而不單為自己爭自由，否則以為徒有一部形式憲法，便說實行了民權主義，那就去民權主義的真義太遠了。

第三，三民主義是一貫的，不是實行了民族民權兩主義才實行民生主義，在實行民族民

權兩主義的時候，同時便要實行民生主義。我們看建國大綱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條，可以明白。第十條說：『每縣開創自治之時，爲須先規定全縣私有土地之價。其法由地主自報之，地方政府則照價徵稅，并可隨時照價收買。自此次報價之後，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會之進步而增價者，則其利益當爲全縣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第十一條說：『土地之裁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鑛產水力之利，皆爲地方政府所有，而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育幼，養老，濟貧，救災，醫病，與夫種種公共之需』。第十二條說：『各縣之天然富源，與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之資力不能發展與興辦，而須外資乃能經營者，當由中央政府爲之協助。而所獲之純利，中央與地方政府各占其半』。這就可以證明三民主義是一貫的，并且三民主義是同時實行的。在各縣開始自治之時，立刻同時便實行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和製造國家資本，這是中國革命特色，也是三民主義獨到和偉大的地方。

現在我們再回頭談談科學了，我自始至終都深信三民主義是由科學而來，惟有了解科學才可以了解三民主義，也惟有實行科學，才可以實行三民主義。

我首先提出科學與三民主義，是指示給大家，重建中華民國應該從科學始，因爲三民主義是要建一個最前進的近代國家，我們要踏上一條普通近代國家之路，還要應用科學，何況今日我們要建一個最前進的近代國家，怎麼可以不用科學？

中國是一個科學不發達的國家，不獨保守派蔑視科學，就是所謂急進派也何嘗不蔑視科學。一般保守派的人們，只知保守中國原來的東西，不論好的壞的，統統保持，很有抱殘守缺，不理世變的樣子。他們所想是不合科學的，他們所行也是不合科學的。至於所謂急進派，他們以為外國來的東西都是好的，共產主義也是好的，無政府主義也是好的，至於中國的歷史他們從來不注意的，中國的現實他們也是盲目去否認的。因此他們所想的也一樣不合科學的，他們所行的也一樣不合科學的。照中國目前處境的艱危，就是全國人民篤信科學，迎頭趕上，也恐怕來不及，何況有這兩派人在那裏一面無條件拒絕新智識，而一面又無條件接受舶來的理論，難怪中國到了今日還是兀臬徘徊於封建和無政府的路！

我們從事政治工作的人們，必得把這些新舊玄想，排除淨盡。我們應下一番功夫研究，知道中國所需要的是三民主義，而實行三民主義所需要的是科學。我們應該把這些需要告訴軍官們，告訴士兵們，更應該把這些需要告訴民衆們。

自然我們政治工作人員未必個個都學過高深科學的，但科學常識應該不能缺乏，尤其是社會的常識應該不能缺乏。目前中國不但普通人們缺乏科學知識，而且更缺乏社會常識，因之，內政失敗，外交失敗，軍事也失敗，大家既不用科學知識去判斷事理，也不用社會常識去判斷事理，無論遇到大事小事，專憑一己的玄想去臆測，專憑一己的利害去判斷，因此國家大事變了兒戲，國家也失敗了，人民也痛苦了。



軍隊是保衛國家和人民的，若軍隊的同志也缺乏科學智識和常識，上至國家，下至人民，不只不能得到軍隊的益處，反而受到軍隊的害處。而政治工作人員又是軍隊精神的核心，倘若政治工作人員還缺乏科學智識和社會常識，我敢判斷軍隊必不會良好，而國家也隨之危亡。

中國目前處境的艱危，是不容我們後退的，我們必得切實了解科學，切實研究三民主義，切實自己負起責任，然後軍隊才練得好。軍隊練好了，國家才有力量。國家有了力量，國家才可以生存。這是我寫這本三民主義與科學的真意。

## 政工人員須知

——十一月在南京出版——

### 一

政治訓練部所屬各級政訓人員暫行服務規則第三條，也可以說是政工人員服務必須遵守的規則，也可以說凡是政工人員必具的信條。我們嚴守這些信條才能作政工人員，我們惟有嚴守這些信條才能完成我們的身心訓練，我們惟有嚴守這些信條，才能擔負目前大時代的使命，我先把這第二條錄在下面，然後依次講述。

第三條的規定是：爲求貫徹政治工作之目的，各級政治工作人員，須遵守下列之規定：

(一) 對於國家，須決心犧牲擁護及保衛其獨立自由，并確認三民主義爲建國之最高原則，和平反共建國爲復興中國及安定東亞之大政方針。

(二) 對於人民須取合作精神，以軍隊之力量，協助人民爲地方之建設，引導人民對軍隊之尊敬，以收軍民合一，共同動作之效。

(三) 對於上級官長，須絕對服從命令，對於同級官佐，須親愛精誠，以收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合一之效果。

(四)對於士兵須誠懇嚴肅，訓練其行動，指導其思想，務使自覺的及堅強的，信仰和實行三民主義。

(五)對於自己，須提起負責任，守尊嚴，和求知識的精神，智深勇沉，表率官兵，并與士卒同甘苦。

以上的規定，就是我們政治工作人員的基本信條，對於國家，對於人民，對於官佐，對於士兵，對於自己，都有了嚴密的規定。可是我今天開始講解，決定先從對於自己應該怎樣做講起，因為個人對於自己都不知應該怎樣做，那麼對於士兵，對於官佐，對於人民，對於國家，更不知怎樣做了。

政治工作人員實際在今日的中國負了兩種的重大責任，第一種是訓練士兵，第二種是指導人民，這兩種責任是非常重大的，怎麼說呢？第一，軍隊是國家的武力，復興國家，要靠軍隊，保衛國家，也要靠軍隊，軍隊練得好，國家便可以統一，救平反動，安定國基，軍隊練得不好，國家便可以分裂，變亂不息，動搖國本，古語有句話『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詳細言之，所謂自焚，不止自焚了武力，還要自焚了國家。但軍隊怎樣才能練得好，最緊要軍隊先有一個思想和行動的原動力，那原動力是什麼？就是政治工作。中國復興的武力，以我們政治工作人員為原動力，可見國家付託我們的責任多麼重要了。第二，照政治工作服務規則，凡軍隊駐在的地方，要政治工作人員指導民衆，中國在歷史上是缺乏社會教

育，民衆也多數沒有機會受到學校教育，因此主義的傳播，政策的推行，一方面得不到社會組織的協助，另一方面也得不到完善教育的協助，於是不能不靠簡單的標語和口頭的宣傳，以冀促進一般社會的進步。這個工作自然各地黨部都應分擔責任，然而鄉村黨部，人材和經費都是缺乏，我們政治工作人員更應該拿組訓士兵的餘時，甚至於撥出大部分的時間來擔任這個責任。我們要知道社會的組織，風俗，習慣，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傳統的，改革固然不易，但一經一度的改革，必定成了若干時間的固定性。我們軍隊是深衛地方和人民的，軍隊對於改進善良風俗習慣和組織的提倡，實在給予地方一種深刻和重大的影響，因此國家除了訓練士兵責任之外，又給我們以社會教育的責任了。

士兵是國家的力量，人民是社會的基礎，國家把訓練和指導他們的責任都交給我們，我們想想，我們的責任是怎樣的重大。我們政工人員負了很大的責任，若果自己不知道怎樣做，不但完成不了我們的任務，并且也燬滅了自己，并且燬滅了國家。

我們沒有講解自己應該怎樣做以前，先須仔細的檢討過去的政治工作。軍隊的政治工作是創行於民國十三年，而正式開始於民國十四年，可是沒有北伐，我已感覺失敗，就我今日檢討的結果，我提出幾個失敗原因，告訴各位。

第一 思想缺乏正確 我記得政治工作是在十四年七月開始的，當時廣東國民革命軍有六軍，第一軍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來，第二軍的政治部主任是李富春，第三軍的政治部主

任是朱克靖，第四軍等到十五年北伐時方成立政治部，牠的主任是麥朝樞，第五軍的政治部主任是李朗如，第六軍的政治部主任是林祖涵，當時因為國共合作，一二三六軍的政治部主任都是共產黨。而四軍下的各師也參加了許多共產黨。黨的主張不同，政治工作一開始，內部便發生了思想的衝突。共產黨人在軍隊的宣傳，不是曲解三民主義就是批評三民主義，或者有些只談三民主義，而不演譯三民主義，於是不止士兵對於三民主義的觀念很模糊，連政治工作人員的思想也模糊起來，我有一天到軍隊訓話，順便和士兵談話。

『你爲什麼要當兵？』我問。

『報告主任，我因爲要革命。』那個士兵答。

『你爲什麼要革命？』我再問。

『因爲我相信三民主義。』那個士兵不猶疑的答。

『三民主義有什麼好處？』我試驗他的思想是否正確。

『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那個士兵衝口而出。

『爲什麼三民主義可以救國？』我要求他簡單解答。

『報告主任，我不知道，』那個士兵非常惶悚。

『國民革命成功之後，你個人有什麼要求？』我轉入士兵本身問題希望知道他的思想。

『報告主任，我不知道。』那個士兵立刻木然了。

這兩個『不知道』使我非常詫異，末後我更發覺，這兩個『不知道』不止一個士兵如此，普遍的士兵，都是如此。因此我立刻感覺政治工作失敗了。我檢查工作的結果，發見政治工作人員對於三民主義的思想欠正確，很模糊，除了共產黨故意曲解三民主義之外，其餘工作人員只知道教導士兵以三民主義的口號，沒有給他們講解三民主義的理論。當日政工的成敗，僅成功在一個『國民革命』口號之下，因為國民革命是國共共同的要求，但對於國民革命的解釋已經各有不同，在國民黨以為北伐成功不能算為完成國民革命，必須實行三民主義才能算完成國民革命。而在共產黨則以北伐成功，就算完成國民革命，過此還要實行共產革命。當日共產黨的計劃，以為他們若讓三民主義成功，中國斷不會更有共產革命，所以只談國民革命，而不談三民主義。他們為自己打算是對的，而最可惜的，則國民黨的政工人員，只知共產黨的陰謀，而沒有幾個人肯切實研究，拿理論攻破他們的理論，拿計劃破碎他們的計劃。因此北伐才到長江，政工人員先發生搖動，乃至影響軍隊，至到今日還有殘留共產黨的存在。

民國十六年我們是清共了，但對於軍隊的政治工作只作消極防制，而不採積極的進取，到了二十一年以後，軍隊的政治工作若有若無，中間只看見小組的發展，而沒有大統一的發展，因此不止士兵沒有受到政工的好處，反而發生軍官和政工人員對立敵視的壞處。軍官慢慢腐化了，政工人員也腐化了，軍隊也腐化了。

軍隊的政治工作，自開始以來，到現在足足十五年了，現在檢討起來，有什麼很大的效果？除了貼標語這一些遺蹟以外，軍隊未嘗收穫政工的成效，我們想想，這還不是思想欠缺正確的大害嗎？現在我們這個政訓班是復興中國軍隊的原動力，所以我們應該先從正確思想做起，否則不止害了軍隊，害了人民，正貽中國前途以無窮的大害。

第二 行爲缺乏整肅 我們檢查過去工作，行爲缺乏整肅也是政治工作的致命傷，這一個行爲缺乏整肅，是根源於軍隊擴張太速而來的。在國民革命軍成立以後，各軍需要政工人員很多，那時各省革命的青年，聽見國民黨改組，聽見國民革命軍成立，多聞風響應而來，我們爲着政工人員的需要，更要滿足他們對於國民革命的希望，因此各軍便把他們擔負了政治訓練的工作。這班青年革命的情緒是很熱烈的，可是浪漫的行爲也是很厲害的，不過在民國十四五年廣州革命的空氣非常濃厚，他們的素養雖是不夠，然而大家籠罩在革命的氣氛內，還忍耐得住，及至國民革命軍進展，素來習慣的不羈行爲便暴露了。

民國十五六年還有兩個不好的現象，一個是附義的軍隊，驟然增加了許多，政工人員不夠，各軍便推薦了他們所認爲靠得住的人物，或者軍隊長官原日的僚幕，或者是軍隊長官的戚友，這一班人都沒有經過嚴格訓練，雖然擔負政治工作，他們沒有政工的經驗，他們也沒有確定的思想，除了學會張貼標語以外，絕不會訓練士兵。還有一個現象是，北伐的各軍擴充太速，沒有政工人員，便隨便拉人充數，所謂好的，還會做點文章，其不好的便壞到不可

思議，壞的我們不說了，所謂好的也只能會做文章而止。我們要知凡參加革命的，最要的條件是知行合一，光是會寫文章是不夠的，還得要行，我們每每見許多人會寫一手好文章，但不能行，其結果還等於零。軍隊是知行合一的，每天所教練的都要實行，現在許多政工人員光是會說會寫，但行爲不能整肅，遂使官長和士兵似發生了不良的印象，從不良的印象當中，便發生了藐視的思想。我們想想，政工人員是要他們來訓練士兵的，換一句話，最要緊是能表率官兵，現在既然給官兵們藐視，那能發生政治工作的效能，因此我們細細檢討之後，以爲凡是從事於政治工作的，必須首先受過訓練，這就是根本改革往前錯誤的意思。

## 第二 身體缺乏鍛鍊

自古以來在軍隊有一句名言，就是能與士卒同甘苦，爲什麼呢

？大凡軍隊作戰，除了主義之外，還要官長和士兵有情感。因爲作戰，是無分官兵一同站在生死線的，既然這樣，倘若官兵沒有情感，那麼士兵的動作，必不能自覺和自動的完成任务，而且平常官兵不能同甘苦，就是官長不能作士兵的表率，官兵平日不能同甘苦，在義務上怎樣能希望同生死？所以和士兵同甘苦是古來至現在一個掌兵的要訣。可是同甘苦一句話是不容易的，做官長一有了私心，就不能同甘，有了私心就不能同苦。就是大公無私的話，同甘易而同苦難，什麼說呢？那就是身體問題，從前許多政治工作人員在軍隊均不能吃苦。他們不能吃苦，有許多也不是不願意，而是不可能。因爲他們多數都是文科學校出身，沒有身體鍛鍊的緣故。體育一件事，在中國成了很大的問題，第一是中國傳統看不起體育，政府雖



然定了教育方針智育德育體育並重，可是家庭的家長看見小孩埋頭埋腦念書便高興，看見小孩子遊戲便呵責，這種重智育而不重體育的心理，至今還不能絲毫的改正。第二是學校的體育設備也不完備，近年所謂體育都是表面做樣子好看的，或者預備運動會作選手的，這種體育並不是真體育。我們要知道體育平均發展才能叫做體育，若徒然選出幾個選手參加運動會，絕對不能叫做體育。學校體育的設備，既然那樣簡單，而他們對於體育的觀念又那樣的不正確，因此文科學校出身人們的身體沒有幾個能健全。以不健康的身體而想和士卒同甘苦，那是絕不可能的事。以此政工人員雖然日在軍隊生活，而許多不能和官兵一齊動作。於是官長藐視了政工人員，而士兵也不敬重政工人員了。

以上所述都是政工失敗的重要原因，我們在此次訓練當中，必須要盡力糾正的。我們所謂訓練，不止訓練心，還要訓練身，身心健全，才稱得上一個完備的政工人才，我希望政工的同志們不斷的自己檢討錯誤，不斷的訓練自己。

## 一一

現在要說到政工人員對於自己應該怎樣做了。服務規則第三條第五項規定：『對於自己須提起負責任，守尊嚴，和求知識的精神，智深勇沉，表率官兵，并與士卒同甘苦。』

我先說負責任罷，我一生不談道德，只是談責任。爲什麼？因我總覺得道德兩個字是空虛的，祇有責任兩個字才是實在的。一個人對於國家有他的固定責任，對於社會有他的固定責任，對於家庭也有他的固定責任。至於道德兩個字，便各有各的解釋不同，譬如中國道德裏面的仁孝，在中國的書本裏面各有不同的解釋，甚至一個人在同一著述裏面前後也有不同的解釋。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謂德，所以與其談道德，不如還是談實在的責任。

我爲什麼常說除了責任沒有道德呢？道德是跟着社會的構成進化的，而且道德不是絕對而是相對的。我們想想倘若一個人像魯濱孫那樣漂流在一個孤島內，沒有第二個人的關係，絕不會發生道德問題，道德的涵義太廣，我且不談，就把最大道理『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忠恕說罷。所謂忠恕，就是對人忠，對人恕，倘使沒有第二人存在，所謂忠恕，便無從發生了。而且退一步論，忠恕有時也可解釋爲自忠自恕，但自忠和自恕從那裏來，也是從對人來的，道德不外是那件事應該做而那件事應該不做，倘若應做而不做便違反了道德，不應做而做更違了道德。倘若我們守定了這個範圍，便叫自忠，倘若并非出自本心，而不經意的做了或不做，自己問心無愧，那叫做自恕。但應做和不應做，還是對人問題，倘使在孤島內沒有第二個人，連自忠自恕也不會發生問題了。

因此道德的構成，實起於人類的組織進化，換言之有了人的關係，才有道德。原人時代

饑食渴飲，各適其適，道德極其單純的，及至慢慢進化，而慾望也隨之漸增，天然的產品減少，不得不耕田，獸皮樹葉減少，不得不織衣，因為要耕田織衣，不得不移殖平原，遂有建築房屋的要求。然而一個人兼做食衣住的工作，不止為能力所限，而且也不經濟，於是乎分工，這是家庭和社會的來源，人與人的關係成立。然而有了家庭和社會，倘使沒有規律，人與人的關係要崩潰的，例如耕田的不耕田，織衣的不織衣，起屋的不起屋，立刻便發生了生存問題，由是不盡職於分工的便不道德了。人既成了社會，除了分工還有人與人間的共存生活，於是便有那樣應做，那樣不應做了。慢慢社會進化，這些規律，有些形成了強制的法律，有些沒有形成強制便變了自由的道德。那形成了法律的不必說，而留下來的道德，也慢慢變了種種抽象的名詞。因為道德是自由的，是抽象的。人們慢慢忘記了他們的實質，此所以有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謂德。我們溯本尋源，一切的道德還不都是責任麼？

道德為什麼不是絕對而是相對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敬，那都是明明白白有本身的責任，做父親的應當慈，做人子的應當孝，做哥哥的應當友，做弟弟的應當敬。倘若一個人沒有了父親，沒有兒子，沒有哥哥，沒有弟弟，便無所謂慈孝友敬了，就有，而它的意義也根本不同了。孔子曾嘆氣說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一面是表示君臣父子有他相對的責任，一面是表示他們各不負應負的責任，社會便要

崩潰，有飯也食不成了。

我最痛恨的，人們高談道德，而忘記責任，因為道德是容易談的，道德仁義，誰不會寫些文章，掛在口舌，因為這些都是抽象的，任人去解釋的。自清末以來，人們都嘆惜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許多軍官天天罵軍閥，他們掌握了兵立刻變成軍閥，許多學生天天罵官僚，他們入了仕途立刻變成官僚，這都是高談道德，而逃避責任之故。

自事變以來，我們的弱點更暴露了，許多軍官還尅扣兵餉，對於國防工事還偷工減料，許多官吏利用他們的職務，假借統制去發國難財。他們誰都高談道德，而誰都不負責任。這種風氣，自清末以來就是如此，到了今日，更變本加厲。

中國的積弱，就坐於無人明白責任，也無人肯負責任，對於國家不知道自己國民的責任，對於社會不知道自己公民的責任，根本的責任都不懂，所以全國上下，皆惟私是競，至於今日中國可謂敗壞極了。政工人員是負建軍和更生的使命的，我希望大家認清各人的責任，担負起來，才可以使中國在死中打開一條生路。

其次是說到守尊嚴了。尊嚴是什麼，就是保持人格的一切態度和行動。諸位不要以為要有高深的修養才可守尊嚴，人守尊嚴最簡單的信念祇有不忘記自己是人，不要忘記自己是一個國家的國民便夠了。為什麼不要忘記自己是人便可以守尊嚴？因為人類是平等的，所以人與人之間的交接，不要驕妄，不要卑屈。驕妄是不以平等待人，當人家不是人，那就傷害人

的尊嚴，卑屈是不以平等待自己，當自己不是人，那就是傷害自己的尊嚴。不當人家是人，不當自己是人，同樣的忘了人類平等，所以我常說，卑屈固然損害自己的尊嚴，驕妄也是損害了自己的尊嚴。

我們不要忘記自己是人，更同樣的，不要忘記自己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人類固然是平等的，而國家也是平等的，我們的國家一樣的和別的國家獨立自由，我們國民的地位也一樣和別國的國民地位平等。如果我們損失了國民的尊嚴，那就不以國民自居，不止損及個人的人格，還且損及全國國民的人格，損及國家的地位和體面了。怎樣才能守國民的尊嚴呢，那是和守個人尊嚴一樣，不要驕妄，不要卑屈，我們要自尊，別國國民才能尊重我們，我們也要尊重別國國民，然後才能表示出中華民國國民的尊嚴。凡為國民，應當急公好義，奉公守法，更且要廉潔，要勇敢，要誠實，要有禮。一切國民美德，都應嚴守，個人尊嚴不能守，不過自己給人蔑視，若國民尊嚴不能守，那就全國給人蔑視了。

我剛才所說不要忘記自己是人，自己是國民，只是守尊嚴的一個起點，自然守尊嚴是需要修養的，別人怎樣修養我不知道，我的修養祇保持兩點，第一點是常自省，第二點是不惜死。所謂常自省就是看見人有好處，希望能夠做到他的好處，見人有壞處，希望能夠避免他的壞處。我們要知道自省固然是人類的理智，同時也是動物的本能。譬如一隻禽獸由陷阱脫逃出來，以後對於類似的陷阱，必定觀察沒有危險才敢嘗試，既然普通動物都有反省的本能

，人是有理智的，而且理智是人類特有的天賦，若果不能反省，連普通的動物都不如了。所謂不惜死，那就關係到了個人的人生觀，人類爲什麼生存？哲學的答案是爲生存而生存。但這句話不是簡單的，它的涵義不祇一個人的生存。而是大羣人的生存。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大羣人的生命是無窮的，世界有羣性的動物生存，最要緊是有時犧牲少數的生命，保障大羣人的生命，這是動物的本能，人類更是有理智的，因此少數人惜死，結果少數人也死，而大羣人也死。

中國有一句話『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這句話我最反對，因爲泰山和鴻毛的界限絕難區別，爲什麼我們不另外提倡輕生，重然諾，人生命等於鴻毛，國家和社會的生命便安於泰山了。我所謂不惜死，不是故意尋死，等到不能不死的時候，則絕不可惜，一個人做到不惜死，那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更是身外的事了，

中國已往弄到受人欺侮，第一誤於不自省，不是驕妄，便是卑屈，使得人家瞧不起。第二壞於太惜死，趕到臨難時候，卑污苟賤，無所不爲，我們每個人能夠保持個人的尊嚴，國家那裏更會受人欺侮。四書上所說『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這是千古不磨之論，我希望大家都該認識。

人的尊嚴保住，國家的尊嚴也從此保住。我從前對於印度的甘地是不佩服的，但後來我知道甘地教育印度民衆守尊嚴，我不禁深深的感動。從前印度人民也和中國人民一樣，沒有

見外國人，驕妄已極，及見外國人，又卑屈不勝，英國人對於印度人，不止當他們是奴隸，簡直當他們是牛馬，自從甘地教育他們守尊嚴以後，印度人都知道自重，英國人便不敢欺侮和蔑視，我看印度快獨立了。以印度亡了國，人人會守尊嚴，便又獨立，中國不過積弱而已，若人人守得住尊嚴，中國一定會復興的。

軍人更有軍人的尊嚴，軍隊所以有訓練，有紀律，就是要軍人懂得自己的尊嚴，軍人比常人所負的使命大，責任重，因此更要維持自己的尊嚴，因此我們除了記得我們是人，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以外，更不要忘記我們是中華民國的軍人，我要告訴你們是這一點，我要你們訓練官兵也在這一點。

又其次是談到求知識了，我所謂知識，自然是科學的知識，我常說世界為什麼有前進國與落後國之分，就在於接受科學的先後，為什麼有近代國家與殖民地之分，就在於接受科學與拒絕科學。這裏所謂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在內，我們要求知，首先要求得思想的方法，那我在我所著的三民主義與科學的頭一章已講得很清楚，請大家仔細去看，我不在此地細講。

不過我要鄭重告訴各位的，我們為什麼求知，我們不但要積極的尋求新的知識，而在消極的還要清理舊的見解。尋求新知識，與清理舊見解，有兩方面：

一面是建立常識 政工人員不但應有政治的常識，還須有科學的常識，中國陷到今日

衰弱的地步，完全坐於當局沒有政治常識。別的不用說，拿這次事變說罷，在戰爭之前，總以為中國有事，蘇俄是要出兵的，英美還來援助的。綏遠失了，蘇俄還不出兵嗎？上海失了，英美還干涉嗎？在這兩個『嗎』字，中國便陷到今日的慘苦地位，土地失陷了十餘省，人民死亡兩千萬。我們想想這是多麼心痛的事！至於科學常識，則我們日常應用的科學，都該知道一點。我們想想常常自詡，我們比鄉下人聰明嗎？其實我們并不見得比他們聰明，只是我們比他們多見些東西而已。然而多見些東西有什麼用，必得懂得多些東西才有用。我們檢討自己，我們和鄉下人一樣愚笨，比如我們天天坐汽車，夜夜用電燈，試問我們有多少人懂得汽車的構造和電力原理，汽車壞了一樣要找人修，電燈壞了一樣要找人修，這樣我們比鄉下人聰明在那裏？我固然希望政工人員能夠尋求特殊的知識，我尤其希望大家先建立政治和科學的常識。

一面是掃除玄想 平教會曾在定縣試驗，舉出人民貧愚弱私的四大弊病，但我想來，四大弊病，實在可以歸結為一，就是愚。因為愚，不懂利用科學所以貧；因為愚，不知衛生所以弱；因為愚，不明合作所以私。所以愚之一字，就是中國大病，然而掃除玄想，并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因為千數百年，傳襲下來的習慣和教條，習之既久，渾然若忘，我先問各位，大家真能除了玄想嗎？如果是的，各人先檢討我們一生試過看相算命沒有，如果有的，那還沒有掃除，我們還要大大的把玄想掃除一下。



此外我們便要進一步談到我們軍人本身智深勇沉了。汪先生在軍官訓練團曾說：「『智深勇沉』這四字我們一定要從對象看一看，『智深勇沉』這四個字的對象，在那裏呢？深字的對象，就是淺薄，沉字的對象，就是浮囂，淺薄浮囂，可以說是現在中國國民一個很普通的毛病，尤其是中國軍隊，以及同軍隊有關係的人，一個最重大的毛病，我們承認現在的國民，比從前二十年或者幾十年前，是比較已有愛國心的，這句話我們要承認的，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個愛國心還是很淺薄的，并且還是很浮囂的，一個淺薄而浮囂的愛國心，是不能支持得很長久的，勉強支持下去恐怕也不能把國家救回來的，我們因為感覺到淺薄兩個字不夠救國的，所以我們要智深。浮囂兩個字，不夠救國的，所以要勇沉。我們知道我們救國的工作，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們因為經濟落後，各種的落後，在最近一百年來，已經讓歐美各國往前，而且也讓日本往前了，我們是落後了，這一點大家都知道，這個落後，是很大很大的危險，今天是一千九百四十年，我們想一想，一千八百四十年，是剛好一百年，那時候，中國是什麼樣呢？各位！正是鴉片戰爭，大失敗的時候，這個鴉片戰爭是中國第一次和歐洲各國戰爭一個大失敗，到現在剛好一百年了，在這百年之中，我們軍事經濟政治文化，樣樣趕不上歐洲。弄到變成歐洲半殖民地，總理說是次殖民地。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的國家，要救回來，很不容易，爲什麼呢？拿一個落後的國家和一個先進的國家來競爭，自然是很不容易的，偏在這個時候，又來東方的日本，他也先進了，他和我們離得很近的，在這樣的時

候呢，中國當然除了做歐洲次殖民地外，還有另外一種危險，這種危險，是避不了的。我們如果是說同日本戰爭，這也試過的了。甲午那年，還不是一個大失敗，這是爭不過來的事實。政治，軍事，文化，經濟，樣樣落後，爲什麼不大失敗呢？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又添了另外一種危險，在這時候，要把國家救回來，是很不容易的，大家應該曉得，在這種環境裏頭，是不是憑一點淺薄的愛國心，憑一點浮囂的愛國心，就可以挽回來呢？因爲不能，所以有今天，我們承認中國已經有了愛國心，但是我們同時承認這種愛國心，還是很淺薄，還是很浮囂，不能夠把國家救回來的，爲什麼說是浮囂呢？淺薄呢？我們舉一個例，各位！試把甲午年的中國人那時候大概的說話，同現在的大概的說話，來比一比，看有多大的分別有多大的進步，甲午年那時候，我十一歲，算到現在四十多年了，這四十多年之中，我們不承認愛國心有進步，不能夠。但是浮囂淺薄的程度，究竟差多少呢？我們看看，那時的出版品，什麼黑旗兵，掃平台灣，掃平東京，種種的話，我們再看看九一八以後，那時候的出版品，究竟差多少，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古直先生，他的文章，刊在廣州中山大學的叢書裏頭，一篇文章是說十九路軍的事，他說十九路軍在上海，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如果那時候，中央政府添上三師二師的兵去接應，十九路軍就可以打到東京了。各位試想想，這樣說話，同甲午年有什麼分別？同所謂黑旗兵究竟差多少？各位試想想，十九路軍是陸軍，他怎麼會打到東京，他坐飛機去嗎！我們算算那時候我們有多少飛機？他坐兵船去嗎？我們算算那時候我們有

多少兵船？試問憑什麼打到東京去呢？但是這種文章，是廣州中山大學叢書裏頭的，我是不批評古直先生一個人，也是不批評一個廣州中山大學，我是說在這樣淺薄浮囂的愛國心之下，你有什麼方法把國家救回來，然而這種的論調是最受歡迎的，是社會上最歡喜聽，而且聽完之後，必大拍掌的，所以從一二八以後，國家的危險，一天比一天的深，而這種論調却一天比一天的高，到七七事變以後，這種論調更把人壓到至於窒息了，游擊隊可以得到最後勝利，焦土戰可以得到最後勝利，這又同一二八那時候有什麼分別呢？同甲午那時候又有什麼分別呢？還是一樣淺薄，一樣的浮囂，為什麼這樣子淺薄呢？因為浮囂。為什麼這樣浮囂呢？因為淺薄。因為這樣，有個愛國心，反而把國家害到不可救回，我們感覺到，除非我們不重新救國則已，若要重新救國，一定要把淺薄浮囂這四個字打破了去，我們才能夠把國家救回來，所以我們用智深勇沉四個字來自己勉勵，並互相勉勵，智同勇，凡是軍人都曉得的，不過有智不夠的，智要深，有勇不夠的，勇要沉。先把深字來說，孟子有句話，說得最好，「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操心危、慮患深，才配作孤臣孽子，要不然，連孤臣孽子都不配做，操心安，慮患淺，就想做孤臣孽子了嗎？現在我們那一個不是孤臣，那一個不是孽子啊，如果慮患慮得這樣淺，你就能在歐洲各國這樣子強盛的時候，日本在東方這樣子強盛的時候，把國家救回來，有這樣容易的事。各位，孤臣孽子呀，操心危慮患深呀，各位，這是智深勇沉四個字裏頭，深字的意思，沉字呢是沉着，各位，你們將來的困

難，是很多的，你們如果不沉着，你們就會很輕易的便受了激動，你們就會很輕易的便灰了心，餒了氣，各位，不怕死是勇，不怕難尤其是勇，中國歷史上，宋明亡的時候，不怕死的男子是有了，不怕難的男子却少了，說一個簡單的譬喻罷，一個人受了非刑拷打的時候，捱不住，便想一死了事對自己是合算的，可是自己身上，如果有責任在，那就知道自己不是一死可以塞責了，便只有咬定牙根，忍耐着一分是一分了。各位，我是過來人，坦白的對各位說罷，我從前在北京獄裏，受不住苦，想自殺多少次，但我只念一句咒，這句咒是「中國之將來」我就立刻鎮定起來，依然受苦，各位，我更坦白的對各位說，我現在的受苦，比在獄更厲害，抬頭一看滿中國還是浮囂淺薄的空氣，最純潔的，不過以死殉國便了，全不打算救國，我受着這樣浮囂淺薄的空氣，真個比在獄中求死不得，更為利害，但是我還念着一句咒，「中國之將來」我依然鎮定，依然受苦，我勉強着，要做一個沉子，能沉着，纔能堅定，纔能忍受一切困難，打破一切困難，各位，這是智深勇沉四個字裏頭，沉字的意思，自從九一八以來，中國的輿論，自從甲午戰爭以來，中國的輿論，自從百年前的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輿論，浮囂淺薄這四個字，足以盡之，我們要克除他，我們要救國，先要救自己，先要把自己從浮囂淺薄這四個字解放出來」。

我們能夠做到負責任，守尊嚴，求知識，更能夠做到智深勇沉，自然可以作官兵的表率，至於和官兵同甘苦，等下節再說，要之，我們要訓練人須先從自己訓練起，我們要救國，

也必須從自己救自己起。四書告訴我們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修身爲做事的一切根源，我們萬不可以爲陳腐的說話而忽略。

### 三

前章所述已說明我們對於自己應該怎樣做，本章應該說明我們對於士兵應該怎樣做了。服務規則第三條第四項規定：『對於士兵須誠懇嚴肅，訓練其行動，指導其思想，務使自覺的及堅強的信仰和實行三民主義』。但我得有解釋這個信條之前，應該明白我們的重要使命。我們政工的工作是甚麼？主要的工作就是訓練士兵，因爲這樣重要，我們應該在訓練之前，仔細檢討士兵的來源，背景，然後才能明白他們的思想行動，這樣才能定出訓練的方法。中國從前也是採用徵兵制的，自唐代採取傭兵制以來，久已變徵爲募，傭兵的得失，不在今天討論的範圍，我不去談，我們今天要檢討的是傭兵的來源和背景。中國的兵源大部分是農村的無業者，農村的無業和失業是由於農村的貧困。我在三民主義與科學小冊子內，曾指出農村貧困的原因，一種原因是農民的耕地過少，據專家的調查，中國農民能力每人可以耕作十五畝，可是農民平均所得的耕地只是三畝多。單以食料而論，每個農民每日食料爲一斤，這樣在北方需要一畝零六分的生產，在南方需要一畝之九分的生產，除此農民還要納賦稅，穿衣服，一年之內還有疾病，所以農民自己不能生活，他的家庭絕難維持。一種原因是

農民的技術不夠，單以蟲害而論，據專家估計每年要損失十二萬萬元，中國人口四萬萬，百分之七十五是農民，每年損失十二萬萬，是每年每個農民損失四元，即是每人損失其生產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由於農村貧困，農民遂無儲蓄，一有天災人禍，只好放棄土地逃荒，民國三年全國荒地有三萬萬畝，及至十九年已增至十一萬七千萬畝。這都證明中國農民無力耕作，只有放棄耕地之一法。

本來農民貧困，已不能維持家庭，更加以逃荒，正合着四書一句話，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了。壯者散到甚麼地方呢？如果中國商業繁盛，工業發展，他們自然走向工商業一途，可是中國商業還是小規模而工業更是幼稚，因此農民惟一出路便是當兵。

所以中國的兵源，一種是農村的自始無業者，農民的孩子初至成年，還談不上以農爲業，便迫着當兵，一種是農村的失業者，遇着天災人禍，無法復業，也祇好當兵，那就是中國的最大兵源，這是我們必須深切了解的。自然士兵還有都市的無業者與失業者，更有志切從軍而希望在行伍中建功立業者，然而畢竟是少數，自事變以後農民的失業者更多，我們可以說士兵百分之九十來自農村，我們既明白了他們的背景，那麼我們可以進一步檢討士兵的思想和行動了。

中國士兵來自貧困的農村，天然的有他們的優點，那就是耐勞，吃苦，樸實，忠誠，而弱點呢，那就很多了。

第一，地方思想 中國交通素不便利，雖然農村不見得如老子所謂老死不相往來，可是因為交通梗阻的原故，養成只知道有地方，而不知有國家，就有也是觀念很模糊，沒有明確的認識。

第二，宗法觀念 農村的組織，當然基本是家族。因此士兵們無不富有宗法社會的觀念，他們沒有社會組織的素養，也沒有大羣動作的訓練。雖然中國成了國家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但士兵們還帶有極深的宗法社會習慣。

第三，個人主義 本來按理論來說，人民聚族而居，應當富有羣性，而不應有個人主義的。但中國既沒有健全的社會組織，僅有家族，家族擴大，自然不能顧及每人的利益。於是使人民感覺同一血統的家族也不可靠，還祇有靠個人，因家族制度不健全的反應，遂養成極端的個人主義。

第四，傳襲迷信 農村的教育本來極不發展，農民受教育的數量也極少，他們自少就受傳襲下來似是而非的教條陶融，及為非神即怪的傳統薰染，因此無論他們的思想怎樣進步，實際內心的迷信非常濃厚。

以上四個弱點，第一個至第三個是與國家的觀念是矛盾的，第四個是與科學的思想衝突的，我們政工人員必須認清士兵的弱點，對症下藥。對於第一個弱點，我們必須灌輸他們以民族觀念，減少他們地方思想。對於第二個弱點，我們必須說明社會組織的效用和與個人利

害的關係，削弱他們宗法的觀念。對於第三個弱點，我們必須訓練大羣行動，消滅他們的個人主義。對於第四個弱點，我們必須指導他們科學常識，及指出社會進化的事實，除去他們迷信的思想。

此外還有識字的指導也是必要，士兵不識字，必不會閱讀書報，必不會增進知識，尤其在戰時和平時不能完成他們所應負擔的任務。現在還有許多軍官，具有極大的錯誤的觀念，以爲士兵知識愈高，愈難服從，沒有知識才易指揮。這個思想完全是一種軍閥的思想。因爲士兵沒有知識，自然沒有主張，任從軍官割據自雄，尅剝肥己，這些士兵用來供給他們利用，固然爲計甚得，但要來保衛國家，完全一點用處都沒有。因爲兵器日日進步，如果士兵沒有知識，怎樣能使用。我們且不要說機械化部隊需要知識，就是輕兵器罷，也是日日進步，士兵沒有知識，也是絕對不能懂得使用。

過去的政治工作絕對沒有針對士兵的弱點，所以政工做了十多年，得不到效果。我們現在必得糾正過來，把政訓和識字兩種工作同時並重，士兵識字，政訓比較容易得多，否則除了會喊口號之外，士兵絲毫得不到極大的益處。

我們規則裏所說『誠懇嚴肅』不是誠懇一件事，而嚴肅又是一件事，必得寓誠懇於嚴肅之中，同時寓嚴肅於誠懇之內。士兵之對官長，等於小學生之對教師，他們入伍之後，開始是絕對信仰官長的，如果不信仰，一定官長不夠誠懇，或不夠嚴肅，至於如何始能一貫的誠



懇嚴肅，那就要回顧到對於自己要怎樣做的那一條信條了。

訓練行動和指導思想，固然不是容易的事，可也不是一件難事，不明白士兵的背景便難，明白他們的思想便易。一個無業者和失業者的思想最動搖，就因為無業者沒有確實的背景，一個失業者祇有模糊的背景，過去十數年當中，我們看見極左的容易變成極右，極右的也容易變成極左，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健全的社會和職業組織，所以他們沒有堅強的背景，思想便動搖。他們的轉變，每每不根於他們的思想，而根於他們個人生活的急迫。

士兵既為失業或無業的農民，他們的背景是動盪的，慾望是模糊的，所以我們政工人員應該先訓練行動，使合乎大眾的和組織的行動，使他們知道國家民族的重要，一面更應消滅他們的地方思想宗法思想個人思想，末後更應注意他們退伍後的職業，時時灌輸以生活技術的必要知識，這樣他們的思想才健全，行動才堅定。

士兵是國家的武力，是用以保衛國家和人民的，若士兵每個的地方思想重於國家思想，宗法思想重於社會思想，個人思想重於大眾思想，那是多麼危險的事！自民國以來，政治的分裂，軍閥的盤割，都基於士兵沒有國家思想，今後我們真要建軍，並建設國家的真正軍隊，非從切實去訓練其行動和指導其思想不可。

但是怎樣才使他們自覺的和堅強的信仰和實行三民主義呢？三民主義我今天不講，請大家去研究我的三民主義與科學，我今天講的祇是如何訓練他們自覺的和堅強的信仰和實行。

從前我最反對軍隊黨部硬要士兵入黨。爲什麼？因爲我覺得組織黨是用以救國的，爲的救國而恐怕個人的力量不夠，沒有組織不行，所以才有黨。入黨並非取得權利，而是加重個人的責任，所以入黨非有犧牲精神和決心不可，若以權利引誘人入黨，已違反組黨的本意。同時我更覺得黨是實行主義的組織，因此每個黨員都應了解主義，否則信仰不堅，在黨並沒有增加力量，而反變了黨的贅疣。我常說祇要人人信仰和實行三民主義，革命的目的已達，並無須人人入黨，至於不懂主義的人入黨那更不必要。

但怎樣才使人人自覺的信仰三民主義，祇說三民主義的好處不夠的，必須使他們明白實際的大勢，中國的現狀。第一使他們知道國家積弱由於中國沒有民族主義，第二使他們知道人民不自由，由於中國沒有民權主義，第三使他們知道經濟困難，由於中國沒有民生主義。這種現狀使他們明白了，然後讓他們自己找答案，無論他們提出什麼答案，必不能逃出三民主義的範圍，倘若他們有三民主義以外的思想，我們必須不憚煩的予以解釋，批評，討論，使他們除了三民主義以外，更找不出正確的答案，這樣政工人員才算達到他的任務。

已往政工人員囑咐的要他們相信三民主義，祇知每日喊口號，而不予以內容的解釋，這樣自己還沒有正確答案，豈能希望他們有答案？已往我們也知道，官兵每每批評政工人員不兌現，我們決不要忘記告訴他們，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今日還在革命期間，離三民主義的完成，還是很遠很遠。假使三民主義已經完成，我們何必再宣傳，再訓練？我們現

在還要努力就因爲三民主義沒有完成。沒有完成的原因，在內有內患，在外有外憂，必得衝過這些難關，我們才踏上三民主義之路。以此我們還在運用政綱時期，須得我們全體信仰，才能一步一步的實現。

現在總結一句話，我們對於士兵應該怎樣做，首先明白士兵的來源和背景，其次要改正他們的行動和思想，再次要告訴他們國際和中國的狀況，我想他們自然會自覺的信仰三民主義，有了自覺信仰，自然信仰不怕不堅強。不過誠懇和嚴肅是必要的態度，倘然缺乏這種態度，自己首先失去士兵的信仰，自己不能被人信仰，而要他們信仰你們的教訓是絕對不可能的。

#### 四

第三，我們說到對於官佐應該怎樣做了，服務規則第三條第三項規定：『對於上級官長須絕對服從命令，對於同級官佐須親愛精誠，以收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合一之效果。』我爲着解釋便利起見，先說明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合一的重要，然後說明我們對於上級長官和同級官佐應採的態度。

在中國不止沒有做到原則上的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合一，就以軍事訓練而論，以軍事的眼光來批評，也沒做到合一，現在軍事教育只是陸軍大學是屬於參謀本部管轄的，步騎砲工

輜等軍事學校是屬於軍事訓練部（以前稱訓練總監部）管轄的。這種分別管轄自然多根於歷史而來，我們且不必去批評，但參謀本部是管作戰的，平時國防計劃，戰時用兵計劃，都歸屬參謀本部，這樣對於兵種的需要，軍官的準備，應該參謀本部有一個精密和統籌的計算。可是軍事的教育既轄屬於軍事訓練部，那麼參謀本部一旦用兵，而所用的不全是一部需要和準備的人員，我們看看有多大的障礙。近年我們發現中國有一個最大的軍事缺點，就是沒有參謀人材，好的參謀固然很少，就是能夠懂參謀的人也很少。中國不止缺乏參謀人材，連作戰所需要的人員也不能符合原來的計算，而且根本也沒有計算和準備。將來這種制度是否應該改善，只有俟諸大局平定之後，再從容討論。我們且說說軍事訓練應和政治訓練合一的重要。

平常我們往往談軍事政治，好像軍事和政治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這是大錯特錯的，其實軍事祇是政治的一部門，軍事不過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軍事不過用來達到政治目的的一種力量，或是一種方法，除了政治便談不上軍事，我們更可以進一步說，除了政治便無軍事。

在原則上，軍事訓練應該包含政治訓練，換一句話，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應該合一，軍隊之有政治訓練是怎樣來的呢？那是民國十三年開始於黃埔軍官學校，至民國十四年國民政府成立於廣州，設立軍事委員會，才正式設立政治訓練部，統率各軍的政訓工作，當時設立政訓部，實是出於時代的要求，因為廣東各部隊有些早已受革命的洗禮的，有些是參加革命

未久，對於革命的觀念還是很模糊的，有些更爲反動的將領統率，天天不止阻撓革命，而且日日在幹反動工作的。這樣以不同思想的軍隊，混雜在一個地方，簡直無法使用，不只不能完成革命，而且害及人民，不止不能希望統一中國，簡直無法統一廣東，於是國民政府才決心設立政訓部，企圖使無主義之軍隊成爲有主義之軍隊，企圖使思想龐雜的軍隊成爲思想純粹的軍隊。

在那時我們也知道軍事訓練應該和政治訓練合一，軍隊的政治工作，祇想作爲一種過渡或是初步的工作，於是在軍事學校特別着重於政治學科，其意就想這批軍官學生畢業之後，成了一個完整的人材，以後在軍隊中再不必分開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了。然而後來，在民國十八年中國雖然表面宣告統一，各地方的軍隊仍然非常複雜，至今軍隊還需要設有政訓處，這實在非當時計劃所逆料的。

至到今日軍隊的政訓工作更感覺重要了，第一，自和平運動以來，凡參加和平運動的，其目的雖一，而理論多有不同。第二，自事變以來，共產黨借着抗戰的口號，非常活躍，常常借着似是而非的宣傳，煽惑軍隊和民衆。第三，還有未曾參加和平的軍隊，他們對於世界大勢和中國現狀還沒有明瞭，思想還在動搖而苦無正確理論爲之指導。可是我的理想，依舊想維持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合一的原則，因爲合一訓練有許多優點，第一，對於訓練士兵，更容易收效。第二，對於軍事行動上，更加强敏捷。第三，官長士兵更容易團結。第四，人

力物力更加經濟。因此我希望在最近將來，各政工人員都成了良好的軍官，而各軍官都成了良好的政工人員。

我既說明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合一的重要之後，可以說明對於上級官長須絕對服從命令的意義了，本來服從命令是軍人必具的條件，大可以不必再解釋的，但我細看中國人的普通心理都不以服從命令爲榮，而以服從命令爲恥，好的還以爲我既是軍人不得不服從命令，更有一種壞的，以爲能夠不服從命令，那才是超人一等。實在服從命令，也是羣性動物的本能，高等的動物不必說，我們說螞蟻罷，他們生活共同，進退有序，凡帶羣性的動物，需要同生活，因共同生活自然有組織，有組織自然需要秩序，要有秩序就天然有命令和服從了，若不服從命令，即是破壞組織，破壞組織，即是毀滅了共同生活，這不獨害了大羣的生命，而且也害了自己的生命。因此軍人固須服從命令，就不是軍人，也要服從國家的命令和社會的規律。人們常批評中國人像一盤散沙，爲什麼像散沙，因爲組織不健全，所謂不健全，因爲沒有人肯服從國家的命令和社會的規律，自事變以後，我們的弱點完全暴露了，我們也食夠弱點的惡果了。我們政工人員應該告訴士兵應該絕對服從上級官長的命令，使軍隊成爲一個完整的武力。我們更應該絕對服從命令，以爲士兵的表率。

而且服從命令是軍人的責任，也是軍人的尊嚴。我們要知道服從命令，不是一件勉強的事，更不是一件可恥的事，軍人能夠服從命令，正是本身的責任和尊嚴。舉凡軍隊的命令，無

不從平時訓練中發出的，長官未教練我們開步走之前，決不會命令我們開步走，長官未教練我們衝鋒之前，決不會命令我們衝鋒，如果長官叫我們開步走和衝鋒，我們不能服從命令，那就是我們自己平日沒有完成應受的訓練，應盡的責任，我們想想這是何等羞恥之事。這不過是一個小例，其他大的我不舉了。因此服從命令，不但不是勉強，不是羞恥，而是身為軍人的責任和尊嚴。那些不服從命令的，才是可恥和放棄軍人的責任和破壞自己的尊嚴。

以下可以說到對於同級官佐須親愛精誠了。我以為對於同級官佐須親愛精誠，各人應該早已知道，用不着我說的。不過，據我經驗，已往的政工人員對於同級官佐有兩種矯枉過正的弱點。

第一種弱點是矯妄自傲 他們以為政工人員是了不起的人物，同時以為一切人類都應該都是善行者。固然我們希望官佐都能厲行嚴肅的生活，但我們也不能強迫人們都泯沒他們的性靈。中國已往因為人們最喜歡浮泛於二重人格標準，往往行的和說的不同，說的更和所想的的不同，養成偽善真惡的習氣，人們對於社會交接用偽善，即對於自己也用偽善，由是彼此相期許的也是偽善，那真是『相率而為偽者也，烏能治國家』！我對於軍官們所最希望的是公私生活的嚴肅，其次是私生活的活潑，不妨害公生活的嚴肅，我們政工人員對於同級官佐應該以身作則，萬不要弄成公私生活的放逸，更且弄成私生活的放逸，來妨害公生活的嚴肅，我們更不應該期望人人為苦行者，而應該期望人人為負責者，從前我最嚴厲批評政工人們

對於軍官們取一種苛酷的態度，而自己倒偷逸苟安。對於下級，其身不正，還是雖令弗從，何況對於同級官佐，萬不要想其身不正，而想糾正別人的行止。

第二種弱點是依阿取容。這一種弱點剛剛和頭一種弱點相反。在軍隊上一切採取隨和態度，以爲和官佐同處在一個軍隊，應該和睦，因此無論任何事情都得過且過。和睦是應該的，然而依阿取容，便失了政工的真精神了。因爲依阿取容，結果軍隊有缺點，不能去糾正，反而扶助官佐們去隱諱。官佐有缺點，不能婉轉助導，反而通通放逸。在政工人們以爲這是策略，但久而久之，專拿『策略』兩個字來作護身符，把他們最大的目的也忘記了。由此政工人們不爲軍隊所重視，祇認爲附屬於軍隊之不急之物。在軍隊的眼中，以爲沒有政治工作，等於沒有裝飾，可是其效用也至裝飾爲止，再不能進一步發生政工的效果。

這兩個弱點，在民國十八年以前以第一個弱點爲最顯著，在民國十八年以後以第二個弱點爲最顯著。到了末後，軍隊的政工人們又另外加上了一個弱點，對於軍官們不是專門作偵察工作，就是專門引誘成立小組織，對於士兵的訓練，一概視爲無足重要了。

我以爲今後政工人們應該矯正以前的錯誤，態度要嚴肅，同時也要親誠。我們對於同級官佐，不應該期望人人皆爲苦行者，能夠無忝責任和完成任務，我們就應該視爲最好的軍官，不斷的和他們切磋以求新知，同時自己更不應該依阿取容，共同放逸。尤其不要忘記的，他自己的任務是訓練士兵。士兵如果訓練好，官佐就同時不能不自己急求進步。如果單取一



種監視的態度，或者專取一種苟合的態度都是不對的。

## 五

第四，我們說到對於人民該怎樣做了。服務規則第三條第二項規定：『對於人民須取合作精神，以軍隊之力量協助人民爲地方之建設，引導人民對軍隊之尊敬，以收軍民合一共同動作之效。』本來這條信條，也是不必解釋的，因爲軍隊的効用是用來保衛國家和人民的，軍民合一是一理論上必然的，可是中國目前的情形，人民是人民，軍隊是軍隊，很似兩種人物，界別很嚴，不易團結，不易合作，爲什麼呢？因爲有幾種原因。

第一、中國目前依然是傭兵制，而這些兵源都是農村的失業者或無業者，人民對於士兵都存有一種卑視的心理，以爲失業或無業者才當兵，比他們自己都不如，所以社會流行『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一句話。在人民以爲好男應該有職業，而士兵不是正當的職業，這種心理，便是士兵和人民當中一條大大的隔閡。

第二、中國雖然自鴉片戰爭以來，不斷有外患，但都是沿海一帶，稍受兵燹，而所受兵燹，又多是限於局部，而且每次戰爭，因爲政府之無預備，軍事之不充實，只有失敗，而無成功，自入民國以來，內戰數起，人民所感受的痛苦已不是局部的而是普遍的，他們平日看不起的軍隊並且給他們痛苦的，於是他們總以爲軍隊不是保衛人民的，而是害人民的，亂內

有餘，禦外不足，這也是歷史做成一個人民和軍隊不合作的一個大因素。

第三、在平時軍人受人民的鄙夷，已有一種不平的心理，而且在駐屯的地域，移動的時候，一切給養糧秣，未必充分，於是不良軍隊遂任意取之人民，而人民怨軍隊也更甚，人民怨憤益烈，軍隊的反感更強。在士兵以爲人民既是對自己不好乃不如索性不管，但求自己的便利，不顧人民的痛苦了。

軍民不能合作的原因，有些是來自歷史的，也有些根於事實的，我們若不能根本消除這些原因，軍民必不能合作，不止在平時戰時發生極大的障礙，而且根本便違反了建軍的目的。

我們要消除這些原因，首須軍隊能夠幫助人民，而人民也必須尊敬軍隊，我們能作到這兩點，那麼政工的目的已完成了一半了。我們怎樣能幫助人民呢？我不是叫軍隊拿金錢來幫助人民，我們可以拿知識和力量去幫助人民。中國社會的大病貧愚弱私，我雖然歸納爲一愚字，但我們政工人員應該針對他們的弊病，對症醫治。

我先說貧罷。要救濟農村的貧窮，積極的要增加生產，消極的要減少損害。農村人民對於耕植還是保守的，對於改良種籽，不敢放膽的，我們應該和試驗場合作，誘導他們改良耕植，譬如深耕而改良種籽。都不必要很深的農學知識。甚至於農村的副產品若指導得法，也能增加，例如南京郊外池塘很多，因爲以前沒合作辦法，農民都不敢養魚，後來經過合作委

員會的指導，他們立刻增加副產品了。至於減少損害，更是輕而易舉之事，中國的農物蟲害每年要損失到十二萬萬元，中國農民對於蟲害是不明白的，以爲這是天災，例如麥的黑穗病在長江非常流行，農民只知麥壞了，而不知是蟲，民國廿四年江寧發生麥的黑穗病，經過專家指示以後，全縣去動員，只是用手去清除，而救回四五十萬元農產物的損失。我們政工人們只須拿這種知識去指導人民，便是幫助人民了。

其次說愚罷。中國農民的愚笨，根於兩大原因，一個原因是教育不發達，一個原因是交通不方便。教育不發達，知識自然不夠，交通不方便，自然不能接受新知識。我們所謂知識，一種是靠書本來的，一種是靠眼看來的。教育不發達，自然不會想，但是教育發達，假使交通不方便，依舊是故步自封。中國人民不識字，根本不能看書報，但是知識是日新月異的，倘交通不發達，報紙和雜誌不能普及於農村，依然知識不會進步。中國這樣情況，不要說農民，就是一個留學生，回至中國三年五年，得不到新的書報，知識也不會進步，而且沒有實驗所，科學也難得發明。現在談到交通，自然非短時期所能實現，因此我們政工人員必須打從識字運動着手，預備一種成人補習教育的材料，對於駐在地的人民，必得予以知識的補充，例如千字課本，例如幻燈照片等，都是給予農民知識的食糧。我們能夠給予知識與人民，這也是協助人民辦法之一。

又其次說弱罷。農民最不考究是衛生，尤其傳染病的預防，農村絕不懂的。中國人民的

體格，是絕大一個問題，大概壯丁中百人之中能夠及格當兵的至多佔百分之十二。過去戰事給予我們教訓，不止打敗仗不了，就是打勝仗也不了。因為打敗，不容易退却，打勝也不能窮追，所以戰爭一次損失器材就不少。我們不談戰時而說平常勞作罷，爲工作的效率計，也須對於身體衛生有充分的注意。譬如農村的兒童死亡率很高，據專家的統計，出生兒童能夠生存的僅作百分之五。這個統計當然不正確，然照農村一般情形推想，恐怕有了正確統計，死亡率還會超過這個估計的。對於傳染病的預防，兒童保健的維護，也並不須高深的衛生知識，我們能夠把這些常識給予人民，對於國力的培養也非常之大。

最後談到私了。要救濟自私，無過於指導人民以大羣的生活，因此我們政工人員，對於屯駐地內，務須扶助人民自治和組織。我們要幫助人民自治，先須替他們樹立些基礎，譬如一村之內，教他們怎樣組織起來，老年人應該做些甚麼事，成年人應該做些甚麼事，婦女應該做些甚麼事，兒童應該做些甚麼。凡不費錢而可以勞力來做的，都鼓勵他們合作。我們更須以身作則，在農忙時候，找出一個時間叫士兵幫他們播種，幫他們割麥割禾，幫他們修道路，築橋樑，這樣給予他們以這麼大的幫助，他們自然受了有紀律大羣的生活影響了。

要之，凡能幫助人民的，我們都應該做，其他對於公益或福利之事，我們軍隊便去提倡。過去國民革命軍實在積極上沒有幫助過人民，只是在消極上提倡『不拉夫』『不住民房』，已經收了軍民合一極大的效果，我們以此力行去影響人民，人民沒有不對軍隊尊敬的。人民

對於軍隊尊敬，更能給予軍隊以絕大的幫忙。因為軍隊有時欺壓人民，祇在於缺乏自尊心。倘若人民對於軍隊尊敬，士兵自然而然發生自尊心理，所謂自尊，並不是驕傲，而是恪守軍紀和風紀。過去人民與軍隊不能合作，就因為人民怕軍隊，所謂怕決不是尊敬，怕字內裏還藏着痛恨。軍隊既然為人民痛恨，他們便索性欺壓人民。我們一定根本剷除人民怕軍隊的心理，而易為尊敬的心理，同時更教導官兵提起自尊心，事事居於保衛人民的地位，對於人民要誠懇，要謙讓。人民縱使有時對我們卑視，也要寬恕他們，這樣人民沒有不尊敬我們的軍隊的。如能做到彼此尊敬，那麼在平時，人民一定能夠和軍隊協作，尤其在戰時，人民更能和軍隊協作了。

## 六

最後我們要說到服務規則第三條的第一項：『對於國家須決心犧牲，擁護及保衛其獨立自由，并確認三民主義為建國之最高原則，和平反共建國為復興中國及安定東亞之大政方針』。

這條信條包含三件大事，第一件是我們須決心犧牲擁護及保衛國家的獨立自由。第二件是我們須確認三民主義為建國之最高原則。第三件是我們須確認和平反共建國為復興中國及安定東亞之大政方針。第一件事是我們當軍人的天職，我們用不着詳細講解，第二件事我在

三民主義與科學說的很詳細，我們也不必重複贅述。至於第三件事是我們今後的國策，我們應當詳細說一說。

和平反共建國包含兩種大目的，一種目的是復興中國，一種目的是安定東亞。而且和平反共建國是一貫的，不是分開的，我們提倡和平爲的是建國，反共也爲的是建國，而且不但爲的是建國，還爲的是安定東亞。於此我很願意依次作簡單的說明。

第一，這次中日兩方有志之士提倡和平，決不是因爲戰爭而但求得一個結束，我們也不是因爲打败了仗而急求安定，實在是我們抱有極大的理想的。我們的理想就是一面建設中國，一面安定東亞。

中日這次戰爭，實在是不必要的，以不必要的戰爭，終於來臨，而且戰爭至三年之多，兩國當局固然要負責，兩國國民更應要負責、我分析戰爭的原因，有兩點：

一，彼此不相認識 中日兩國的地理，文化，經濟這樣密接而彼此互不相識，我溯本尋源，歸於內心的嫉妬。我在廿九年元旦曾作過一篇文章，五月曾在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演講，我都有同樣的說話：

『我以爲兩個國家的事變，決不是起於一天的，必定兩國積累了十數年乃至數十年的誤解，才出於一戰。兩個國家的和平，也不是成於一時的，必定兩國積累了十數年乃至數十年的了解，才能永遠和平。』

自從九一八事變，我便日夕想着中日兩國必終有一日淪入血海，日日希望解決，而終尋不出解決之道。因為我總覺得中日之間，橫着不可解的怨恨，而兩方都抱有不可解的敵意，這種怨恨和敵意，一天不能消除，暫時的和局是不能挽救未來的危險，因此我曾費了很長的時日，來探討怨恨的來源和敵意的癥結。

我很覺得奇怪，日本和歐美對於中國同是一個外國人，但一個中國人碰到一個日本人，他比碰到一個歐美人容易了解，容易做朋友，尤其在歐美地方，一個中國人碰到一個日本人，他格外容易了解，格外容易做朋友，可是我更覺得奇怪，這個中國人和日本人一分手以後，便在背後，互相敵對，互相蔑視。

我以為這種敵對和蔑視，實在基於內心的嫉妬，在中國這方面，以為中日好像兄弟一樣，在日本沒有維新之前，中日的命運也正相同。可是日本強了，中東之役，中國是失敗了，日俄之役，日本又戰勝了，不但如此，日本模倣歐洲帝國主義的方式和辦法，向中國侵略和壓迫了。好像兩兄弟，以前都是捱受慘苦的命運，現在一個是強了，一個是弱了，這個強的，不但不援助弱的兄弟，而且加緊和外人向這個弱的兄弟壓迫，這個弱的兄弟怨恨強的兄弟，自然比怨恨一般外人更深刻。不過日本之強，中國知道沒有方法可以遏抑的，於是他怨恨都寄託於蔑視，以為日本雖然強，從前牠的文化是由中國去的，中國一度既是日本文化的泉源，無論日本怎樣強盛，我還是一個老大哥，你儘管強，我儘管瞧你不起。

至於日本方面，在維新之後，國力未充，其勢不能和歐美的帝國主義爭雄，也只有向中國下手，以爲中國老大了，腐化了，很有點「天與不取，實受其殃」的神氣。不過內心一想，日本從前的文化，雖然不是全部來自中國，至少有若干文化孕育於中國，於是他極力模仿歐美，極力想忘記他的兄弟國家，好像強的兄弟，以不認他的弱的兄弟爲榮，以爲一個強者有了弱的兄弟，是喪失了他的身分和體面。不但要忘記他的兄弟，反而更壓迫他的兄弟，以爲這樣才表示出他有資格和歐美齊觀，并非和中國等量。

他們彼此都具有內心的嫉妬，不特不設法互相了解，而且故意的不去求了解，就是中國方面的所謂日本通，而日本方面的所謂中國通，也都本着互相蔑視的心理，互相的偵察，而不試求互相的了解。日本通所得日本的結論，就是日本人不可靠，而中國通所得中國的結論，就是中國人容易欺負。憑着這點內心的嫉妬，已足打仗而有餘。所以我常說，縱使沒有蘆溝橋事變，縱使沒有九一八事變，中日兩國始終要打一次大仗，非大家淪入血海不可，這種慘運似非憑少數有識之士，在短促時間所能挽回，我無以名之，只有名之爲歷史上無可避免的悲運。

現在中日事變已延長差不多三年了，雙方同蒙重大的犧牲，日本方面已經有根本的覺悟，知道以前的觀察完全錯誤，從前以爲中國可以不戰而屈是錯了，一戰而可使中國瓦解也錯了。中國方面也有了根本覺悟，知道以前的觀察完全錯誤，從前以爲相鬥下去，日本經濟必



定崩潰是錯了，中日戰爭可以惹起日本的革命也錯了，兩方都已覺悟到，中國之所謂勝利只是一種宣傳，而日本之不能滅亡中國也是事實。兩方便同時感覺到筋疲力盡，內心的嫉妬也在戰爭中彼此認識而消除，而兩方面更同時感覺到東亞前途滿佈着危險與困難，決非中日某一方所能担負，而非共同担負不能解決東亞的危局，這時是中日兩國棄嫌修好的時機，也是中日兩國翻然締結永久和平的運會。」

中日兩國不止不彼此認識，中國連自己也不認識，大概自鴉片戰爭以來，屢次失敗，自己失了自信，而偏信他人，以為歐美是了不起的國家，無論政治經濟，都仰仗他們的氣息，歐美是者以為是，歐美非者以為非，因此外交路線也是跟着歐美為轉移，從沒有居於主動地位而立定一個穩固政策。因為歐美非排斥日本不能保衛他們在中國的權益，中國也從而跟着排斥日本了，中國從來不想自動起來爭回已失的權益，也始終沒有企圖和日本合作爭回已失的權益，這是為什麼這次釀成中日事變之一個原因。

二，彼此不明責任 中國固然忘記自己的責任，日本也忘記他自己的責任，中日兩方更忘記他們共同的責任。中國以為排斥日本，便可以自由獨立，可是中國還是積弱的國家，其勢不能不靠蘇俄和歐美，牠不知道日本縱然被排斥，然而始終甚且更不能脫離歐美的羈絆。日本也同樣的以為征服中國，可以獨霸遠東，牠不知道，就使能獨霸遠東，在外一定遭遇歐美的攻擊，在內已經樹了四萬萬人的大敵，萬一遠東有事，不獨不能為日本之助，更為日本

之大害。

歐美何以能雄長，原因不純在本身的力量，尤在於殖民地的支持，日本在世界雖稱列強之一，而依舊不能和歐美爭雄，中國更成了積弱之國，本身更次於殖民地之地位，那都是歐美拿了南洋殖民地作侵略我們的根據，它們一面拿殖民地作外圍，一面拿殖民地作攻擊中日的前哨，譬如侵略中國的先鋒，而惹起鴉片戰爭的還是英國在印度的東印度公司，因此日本要更強，中國要完成真正的自由獨立，首先須扶殖東亞的殖民地脫離歐美帝國主義的束縛。

我在三民主義與科學之中，也曾指出蘇彝士運河以東都是歐美的殖民地，然而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之爭奪，容有衝突，可是對於東方保衛殖民地倒是共同的，例如此次歐戰之前，英國對於法國的安南，對於荷屬的東印度，都負有協助或是完全保衛的約定，今日歐戰進行中，英美也有共同保衛太平洋的醞釀，在中國的租界，各國的權益儘有不同，然而對於中國的防止交還和障礙行政是一致的。

非洲的問題，非今日所能討論，至於東亞的殖民地問題，非求一個相當解決，中國不會真正獨立自由的，東亞也不能真正安定的，可是解決這個問題，中國固然沒有力量，日本也不夠力量，非兩國共同擔負不可。過去中日兩國因為矛盾和戰爭而力量相消，中國更削弱了，日本也消耗了，今日兩國應當回過頭來，共同擔負這個責任。

日本因為不明共同責任，以為先解決中國，然後再想法解決南洋，中國也以為先須排除

了日本的力量，然後再談聯合各弱小民族，在這種不認識現實狀態之下，兩個國家就在這次戰爭先蒙重大的損失，現在中日兩方已經覺悟到應從血海裏攜起手抬起頭來，因為要使東亞脫離帝國主義的掌握，非兩國合起來共同努力不可，要共同努力，非先使中國健全不可，那就是非使中國成爲強有力的獨立自由國家不可。

中國強盛，於日本有利，還是有害，這個問題，值得共同考慮的，強盛的中國，如能和日本合作，是於日本有利的，反之，是有害的，我們更進一步就我們本身考量罷，我們強盛，和日本合作是有利的，反之是有害的，我們在此次歐戰中證明，人力物力是戰爭最要條件，有時人力且較物力爲重要，日本人口七千餘萬，極度出兵也祇能達到七百萬，而七百萬中能在戰場任戰鬥員的祇能達到三百五十萬人，東亞無事則已，一旦有事，三百餘萬的戰鬥員擺在廣大的戰場是不夠的，非中國協同動員是不行的，這是中日合作彼此都有利的，倘若中國強盛而不和日本合作，則中日將不斷的戰爭，勢力不只相消，而中國的國力將耗於黃種之戰，中國固然談不上幫忙弱小民族，也永遠不能脫離歐美帝國主義者的掌握。我們縱使除了東方的道德不談，單以利害而論，與日本合作，雙方之利如此，而不合作，雙方之害又如彼，我們可以根據這些現實來決定我們的國策了。

所以我們的和平運動是抱有遠大理想的，不是因爲打了敗仗才來講暫時和平的，或者我們理想未必彼此人民全都了解，但是鏗而不舍，我們終可達到我們的目的，中華民國成立，

在辛亥以前大家何嘗不當是一種理想，中國人民又何嘗全都了解，但經過一個時期同志的努力，終於實現了，我希望政工人員不要自餒，大家應當鼓起勇氣，朝前邁進。

第二，我們爲什麼提倡反共？因爲不反共無從建國，不反共更無由安定東亞，以下我簡單分別說明。

一，共產黨是反民族主義的，我們是要建設中華民國，而共產黨是要建立蘇維埃，蘇維埃是什麼？是蘇俄的附庸。共產黨除蘇聯以外，都想把別的國家分裂，破碎，以次併於蘇聯，現在波蘭已給俄國瓜分了，波蘭的國家已不存在了。波羅的海沿岸的三個小國竟被蘇聯囫圇吞去，更沒有立陶宛等三國存在了，就以中國而論，既揭抗日的招牌，力量應該統一而不應分裂的，可是共產黨借抗戰爲名，而擴充他們的力量，邊區政府的區域天天擴大，由陝西而擴至山西，且已到了河北了。共產黨軍隊日日在重慶軍隊之後繳他們的軍械，吞併他們的隊伍了，共產黨惟恐中國不亡，而更恐國民黨不滅，因爲中國亡了，他們才可遍地組織蘇維埃，國民黨滅了，共產黨才能擴展他們的力量。因此共產黨不除，中國永不能統一，中國也永不能建國。

二，共產黨是反科學精神的，共產黨得意的宣傳，就是馬克斯的共產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人們給『科學』兩個字迷糊了，以爲既是科學的，那就遲早要實行，共產主義是一種真理。現在有反對共產主義的人，他們也是頭腦不清，不是說共產主義現在不能實行，就是

說共產主義與中國國情不合，殊不知這種反對語調，已經中了共產黨的宣傳毒。因為說共產主義現在不能實行，那無異乎承認共產主義終有實行之一日，說共產主義於中國國情不合，那無異乎說別國可以實行，中國有一天等到條件具備之後，還可實行。

我們以為他們這種反對論調、實是替共產黨宣傳，他們中了共產黨『科學』兩個字的麻醉。共產主義實在不但不是科學，而且反科學的，更是一種宗教，他們為什麼自稱科學的社會主義，是因為馬克斯的社會主義是從唯物史觀和辯證法來的。好罷，我們且看唯物史觀是不是科學？或者合乎科學？據我研究，歷史僅是學校一種學科，而不是科學，因為科學第一能夠試驗，第二能夠實驗，歷史是過去的事實，我們不能拿來反覆試驗的，我們更不能拿來實驗得到預期結果的，大凡科學之能夠成立，必定能試驗和能實驗，譬如用化學分解水的成分它是輕二養的合成，無論屢次都可試驗的，水一定能輕二養合成，我們可以實驗而得預期結果的。歷史絕不能試驗，也并不能實驗，我們怎樣可以叫牠是科學，我們再看辯證法罷，我在三民主義與科學已經討論過了，我現在再說一說，辯證法有一點是馬克斯不能說明的，有一點是故意不願說明的。辯證法最要緊有正面，有負面，以正負兩面的矛盾，而生出調和的真理。據辯證法說這種方法可以應用於一切科學和事物，好罷，我舉出一個例，和平是正面，戰爭是負面，這兩個矛盾，始終得不出一個調和真理，這是馬克斯不能說明，而且就是他的先生黑格爾也不能說明的。還有辯證法是正負兩面生出真理，而這個第三真理不久又變

成正面同時又生出負面，這種甲乙丙丁一直矛盾下去是無窮的，然而馬克斯推到無產階級專政便停止了，永遠沒有負面了，這是違反辯證法的本質，這是馬克斯故意不說明的。所以歷史和辯證法既非科學，那麼所由產生出來的社會主義更非科學了。因此馬克斯主義實在并非科學，而是一種導人迷信的宗教。我們是需要科學，而不需要宗教，更不需要外來的宗教。

此外共產黨先天的帶有高加索和小佐治亞的殘酷性，我們看看俄國革命時代的殘酷，屢次清黨的殘酷，以及共產黨在中國蹂躪各地的殘酷，都是反乎人類的精神，尤其反乎我們東方的道德性。我們要建國，要安定東亞，都非先從反共作起點不可。

要之和平反共建國是一貫的，和安定東亞也是一貫的。和平是我們偉大的理想，反共是我們堅定的方針，我們政工人員一定要抱定我們的理想，決心達到我們的方針，這樣中華民國才可以重建，而東亞才可以安定。

## 七

要之我們政工人員須認識目前國家處境的困難，我們使命的重大。所以我們必須：

第一，認識要堅定 若果一個人認識不堅定，思想必常會動搖。中國各職業階層本來很脆弱，因之影響於人們的思想也跟着不強固。我們今日要從艱難中闢出一條坦途，要從萬死

裏打出一條生路。我希望各人應當不斷研究國內外的情勢，把穩了自己的認識，然後才能從事於政治工作。

第二，精力要集中 那就是說，我們應該拿畢生精力去從事於政訓工作。中國自辛亥革命以後，內戰不息，直至民國十八年始表面宣告統一，然而在統一之下，還有許多次內部的戰爭。這三十年中固然政治不定，人民痛苦，而其中我們尤感痛苦的，是國力消耗，使國家更趨衰弱。假使中國早有了軍隊的政治工作，而軍隊的政治工作又能照我們的理想進行，那麼中國的軍隊必成爲國家的軍隊，不會成爲私人的軍隊。內爭消滅，國力必充，我們一定可以使軍隊成爲國家的軍隊，而每個軍人都富有民族的知識，那麼我們把畢生精力全貫在這個工作也值得的。

第三，知識要廣博 政工人們不止要訓練士兵，還要指導民衆，因此他們的知識一定要多面的，最低限度政治常識一定要充足，科學的常識也要相當的具備。然而政治常識最要在不斷注視國際情形的變化，和國內情形的動向，關於這一點，除大家應該用縝密的頭腦去閱讀和分析書報外，更由政訓部不斷供給大家政治上的報告和材料。至於科學常識，則大家尤須注重農業的常識，和衛生的常識，因爲軍隊的駐屯多在農村，我們要協助人民，更應該指導他們增加生產，注意保健。政工人員的知識是要多面的，無論任何方面的知識，憑着個人的經歷和興趣，應當就其所知，不斷研究，因爲士兵和人民的知識都比你們低下，能夠憑着

自己知識去訓練指導他們，可以增加他們的福利，也可以增加他們對於軍隊的尊敬和信任。末了我還要告訴一般政工人們，范仲淹以天下爲己任，這句話深入每個青年的心中。但要知范仲淹一面以天下爲己任，一面苦志勵學，淬厲不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不反對青年們以天下爲己任的遠大思想，我卻反對青年們一面要妄以天下爲己任，而一面暴棄自己，不求知識，一面糟糕人格，不求長進，凡是學問沒有根底而想擔負大任是浮，修養絕不講究而自命不凡，是薄，在歷史上我們沒有見到浮薄的人可以成功的，我希望大家應該澈底自省，不斷修養，這樣各人自己的前途才有希望，而國家的前途才有希望。



講  
演  
與  
談  
話

# 我們當前的責任

——三月九日在粵講演——

各位同志：此次到廣州看見各位同志，非常安慰，因為各位同志，都能各盡應盡的責任，和各盡各人的努力，我今天和諸位講的話，都是大家都知道，大家已在那裏做的，所以我所講的話，都是很平凡的，我今天提出兩點，告訴各位，第一是我們應該認識對國家的責任，第二是我們應該認識做人的責任。

第一，我們應該認識對國家的責任，我們時常在報紙上看到，或者和朋友談論，都見到和聽到『近代國家』四字，以及中國還沒有成爲近代國家的一句話，一個國家是不是近代國家，其分別在那裏呢？他的分別，不是單純在有無新式武器，大炮，戰艦，飛機，坦克車的分別，而在有無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什麼？說起來很簡單。我舉出從前最流行的一件故事，西方一個國王臨終時候，喚他的幾個兒子到床前，喚他們將一支箭折斷，他們把這一支箭折斷了，後來把三枝四枝一起折，便不容易折斷，及至把一大把給他們來折，無論如何，也折不斷。這個國王說，你們應該知道，這就是你們的一個榜樣，大家能聯合起來，你們就不會受人欺負了。民族主義，說句簡單話，不過如此。然而說到複雜，也夠複雜。民族主義，

不是很舊的東西，最初起源是十六世紀時的宗教改革，一切宗教，都想先把一個民族統一起來。至十八世紀，民族主義才正式發生。至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才慢慢發展。至二十世紀，民族主義才告完成。爲什麼？因爲工業革命後，科學慢慢發達了，有了輪船火車等交通器具，把大的地方縮爲小的地方，人民的意志和感情，容易統一了。及至有了電報電話，人民的意志和感情，更容易統一了。現在更有飛機無線電播音，人民的意志和感情，更容易統一了。可見民族主義的發展，完全靠科學，一個民族願意接受科學的，民族主義必快完成。一個民族不願意接受科學的，民族主義便難進步。所以民族主義，倘若徒然喊幾句口號，是不會成功的，必須大家肯接受科學，才有希望。中國民族主義的運動，也有許久了。但近十年來，才能突飛猛進，進步的原故，就因爲大家願意接受科學。輪船有了，鐵路也建築了，公路也建築了，空中交通也開始了。從前由廣州到北平，動輒三四個月，有了輪船，十日便可到達了，現在有飛機，幾乎一日便到達了。而且發一個電報，不過幾點鐘，倘若無線電播音消息，可以立刻傳遞，因此大的地方縮爲小的地方，人民的意志和感情，自然容易貫通。所以民族主義，也跟着突飛猛進了。我們必須知道，中國雖然在秦朝已把封建制度打破，然而封建制度的力量和組織，還是絲毫未動。我時常舉出四個例子來：一是金融，金融是人民生活的尺度，這種尺度不能統一，即是國家不能統一，中國金融，最近幾年才表面統一，從前上海有上海的銀兩，天津有天津的銀兩，漢口有漢口的銀兩，廣東更用毫洋。自法幣施行以

後，表面似已統一，然而一元法幣換粵幣一元四角，換桂幣兩元，換滇幣十元。說到輔幣，到今日還不能統一。今天一元，可以換銅元二百四，明天或者可換二百五，後天或者會跌到二百三，每個地方金融制度不同，更足表示中國的封建組織。二是度量衡，度量衡也是生活的尺度，一面也是文化的尺度，因為人民每日的衣食住，全靠一種尺度。至說到文化，平常人們以為文化就是道德，殊不知文化包含兩樣東西：一是行爲，一是技術。行爲即是平常的道德，而技術則指一切圖畫，雕刻和建築，我們現在去看博物館，欣賞一個花瓶，一幅圖畫，我們的欣賞目的，全在它表現某時代的思想，然而圖畫和花瓶，豈是胡亂造出的，它必定要靠尺度，所以中國的長城，中國的運河，都是中國絕大的文化，但這些大建築，無不靠度量衡，倘若度量衡不統一，我們還能說國家已經統一嗎？三是租稅，中國的租稅，素來不統一。但有些是歷史的，例如江蘇的蘇松區，田賦特別重，有些是政策的，例如邊省的田賦特別輕，然而有些是人爲的，各省政府，往往對於人民，任意加派，在政府以為是當然的，在人民雖不願意，也很少反抗的。其原故，就是上下都習慣了，這全是封建時代的遺跡，近代國家是沒有的。四是法律，中國歷朝都有法典，前清更有一部大清律例，至民國則更完備了，然而這些法令，實在沒有普及於人民，別的地方不說，即就廣東而論，鄉村裏人犯罪，還很多拿家法處置的。我們常聽見在祠堂裏，由族長判罪拿豬籠淹死犯人，在家屬以為是當然的，而在政府還是很多不聞不問，這不但是封建社會，簡直是家法社會了。所以我們非把

中國抬上民族之路，中國是不能生存的。我們不要說人多，國家便不會亡，印度何嘗沒有三萬萬多人口？畢竟做了人家的殖民地。我們研究印度的，知道印度不但有佛教回教之爭。而且除英領印度之外，還有三百多位王侯，各有土地，各有人民，因此三萬萬多人，變了很少很少的人口了。中國若不完成民族主義，中國雖有四萬萬人，其結果也就等於沒有人，所以我盼望各位認識國家，認識民族主義，並且自己一定要接受科學，並指導一般民衆，中國才可以達到和平建國的目的。

第二，我們應該認識做人的責任，人都有責任的，他對國家固有對國家的責任，對社會也有對社會的責任，就是對自己也有對自己的責任，對國家對社會我不去說了，就說對自己，我以為應該最少具備三種條件：一是尊嚴。人是有尊嚴的，即是威武不能屈。我們為什麼被人欺負，即是自己先自喪失了人的尊嚴。我記得有一次在南京會見一位英國太太，他是甘地的好朋友，他極贊揚甘地，我批評甘地說，甘地單獨提倡不合作運動，完全是消極的，他說他佩服甘地，還在於教育印度人，從前印度人，對於英國不是自輕就是屈服，例如英國人駕着馬車，碰見印度人阻路都用鞭打的，最近不敢了，因為印度人自從受了甘地的薰陶，都知道自己的尊嚴，遇了英國人欺負他，便會挺胸昂首的說：『先生！請你尊重些自己！』於是英人都慚愧了，可見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我們能維持人的尊嚴，人家那敢欺負，倘若在政府的都不公忠體國，在社會都卑污苟賤，人家必定看不起，自然要欺負我們的。二是忠

實。我們一向政治軍事失敗，都由於太不忠實。在政治方面，想勵精圖治，而反自己腐化，在軍事方面，毫無準備而驕妄矜誇，所以令中國淪到今日慘苦境地，都因自欺欺人所致。我時常提倡輕生死論，我的意思就是要大家忠實，大家肯說老實話，肯做老實事，自己才有救，中國也才有救，否則就如四書所謂：『相率而爲僞者也』，焉能治國家。三是常識，常識有兩種，一是科學常識，一是社會常識，我們生在今日的世界，科學常識必須有的，我時常聽見城市裏的人說鄉下人蠢笨，其實鄉下人何嘗蠢笨？只是見識不廣罷了。例如鄉下人沒有看過電燈，不知道怎樣用，然而城市裏的人，何嘗比鄉下人聰明？他們雖知道用，而依舊不知它的原理。電燈損壞了，他們本來可以自己修理的，但不能修理。汽車損壞了，他們本來也可以修理的，但也不能修理。他們對於字畫可以分別真假，論他墨跡不對，或圖章不對，但電車汽車擺在面前，他們爲什麼不去研究呢？我所以說的是舉一個例子，其餘我們沒有科學常識，可不必談。社會常識呢，那却容易了，我們廣東是每年都有洋米進口的，但米從那裏來，許多人不明白，廣東著名田少山多，但有沒有法子開墾和改良呢？許多人對吃飯問題都不留心，怎麼還能留心其他呢？現代的人，明白自己的社會還不夠，必得明白人家的社會，尤其是鄰近的社會。卽如今年的元旦，我曾做過一篇文章，論在蘆溝橋事變之初，我雖沒有主張過戰，我也沒有主張過和，因爲我知道中日戰爭是終歸要發生的，而且是不能避免的，因爲兩國的社會彼此都不明白，中國的日本通所得到的關於日本的結論是日本人不可靠，

日本的中國通所得關於中國的結論是中國人容易欺負，一個是不可靠，一個是容易欺負，除了打還有什麼辦法？但現在打得頭破血流，大家才能明白，一個並非完全不可靠而一個也並非那樣容易欺負。但這個明白，代價太大也太慘了，倘若兩個社會都有一些常識，又何至於有今日的慘禍。以上兩點是我提出做人的最低條件，尤其是做人的尊嚴，一定非守不可。我們和人做朋友，也應該先做像一個人，驕妄固足傷害尊嚴，卑污尤其傷害尊嚴，我們要維護一己的尊嚴，必須生死以之。我反對中國的大話『死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這種泰山鴻毛，實在很難分別的，我最提倡輕生死論，那一個人的生死有什麼了不起？大家的生命都輕於鴻毛，國家自然重於泰山，大家的生命都重於泰山，那麼國家却輕於鴻毛了，國家的軟弱，原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起因就在被人家看不起，我盼望各同志拿人格去奮鬥，那才是和平建國的真義！

# 對日廣播

——三月二十三日在南京電台——

親愛的日本朋友們，今天是中央政治會議閉會的第二天，我很高興的，能在南京的中山陵下遙遙與日本的國民講話，中央政治會議的決議案，我想各位連日都在報紙上看到了，舉凡愛好中日和平的人們，一定很高興的，知道中日永遠和平的基礎，已在這次會議當中奠定了，這幾天國民政府成立，還有國民政府還都宣言發表，不獨把過去中日兩國的糾紛和誤解掃除，而且更要把將來足以阻撓中日和平的障礙掃除，我深信中日兩國的永久和平，一定可以實現的。中日兩國，本是義同兄弟的國家，祇因為雙方的誤解，兩國淪入血海中者兩年多，我們痛定思痛，深願以至誠對日本的親愛的朋友們說幾句話。

大凡兩國戰爭，決不是起於一時的，必是起於長期的誤解的，兩國和平，也決不是成於一時的，必是起於長期的了解的，中日兩國，都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史以來，都有文化的溝通，這兩年多，惹成空前的慘禍，我以為不獨兩方當局，應該自省和自責，就是兩方的人民，也應該自省和自責，我們讀了日本許多朝野的言論，對於這次事變，不把戰爭的責任放於某一方，這是我們最感動的，尤其和平空氣，先由日本放送，這尤其是使我們感動的，但此



次和平，我們相信無論中日人士，都不願意作為暫時的和平，而願意從此以後，永遠和平，因此，我們兩方，以後更加要自省和自責，我們本來是兄弟之邦，以後更須兩方認清兄弟之國的責任，在我們一定率領人民作日本的永久的親摯的朋友，而在日本方面，更須本着兄弟之誼，尊重中國的獨立自由，尊重中國人民的生存，不真以真摯的友誼來調整兩國的關係，還要繼續不斷的自動修正兩國的關係。我深信中日兩國人民，都酷愛和平的，但同時我也相信東亞在不久的將來，或有嚴重問題發生的，這種問題解決的責任，中國固然不能單獨擔負，恐怕日本也不能單獨擔負，非兩國共同努力擔負不可，因此中日共存共榮，在往昔不過是一個名詞，而在今日在將來，算是一件事實，我們決不要忽略，我們更不要輕視，中日兩國，如果繼續仇敵和蔑視，我深信必會兩敗俱傷，唯有親愛和平，我們才能達到共存共榮的目的，我們關係既這樣密切，祇有兩方以兄弟相待，才可以達到這個目的，若果以仇敵相待，只有同歸於盡而已。日本在東亞是一個先進國家，他必定能了解世界大勢，和明瞭東亞的將來，更須於尊重中國獨立自由之外，幫助中國，使成爲一個強國，始能同負東亞和平的責任，我們於中日和平之始，鄭重告訴日本的親愛朋友們，我們今後，不祇尊重日本國家的尊嚴，國民的尊嚴，更尊重自己中國國家的尊嚴和自己中國國民的尊嚴，更盼望日本尊重中國國家的尊嚴和中國國民的尊嚴，並使兩大國家，同時向世界最光明之路邁進。

# 怎樣做近代國家的國民

——三月三十日廣播演詞——

諸位親愛的同胞們，今天國民政府已還都南京了，國民政府還都的宣言，諸位一定已看過了，剛纔汪主席的廣播諸位也一定聽見了。我們可以說，今天是和平之始，今天也是建國之始。諸位同胞，看見國民政府還都，看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揚，全國實現了和平，期望着建國，一定很高興的很愉快的。可是，我們負責任的當局，心裏實在蘊着無限的悲感，無盡的自省和自責。

三民主義爲中華民國的最高原則，全國一致公認的，可是，我們要建國，還得要靠全國的人們，共同奮鬥，同濟艱難。我們在建國，必先要懂得怎樣立國，要立國必先要懂得怎樣立人。這個立人，是包含立人和立己，簡單言之，就是怎樣做人，怎樣做近代的國民。中國有史以來，曾經亡國兩次，大的變亂數十次，小的變亂無慮數百次。我們夷考亡國和變亂的時期，都肇於政治腐化，社會墮落，這個原因，也很簡單，若果政治清明，社會整飭，不只國內的人心不會思亂，國外也不會起欺侮的思想。亡國和變亂之源都沒有，那裏有戰爭，那裏有變亂。四書裏說：『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

後人伐之』，這真是千古不磨的道理。

現在中日是宣告和平了，這次和平，不是單方的，是雙方的，大家都瞭然於中日兩國的前途，東亞的大局，世界的趨勢，知道東亞和平的責任，決不是一方所能單獨擔負的，必得雙方共同努力的，因此兩國之士，提倡於前，兩國人民，景從於後，才有今日和平的實現。所以，我們同胞們，要認識中日今後是患難的朋友，是患難的兄弟。我們要認識中日既是朋友和兄弟，我們應該站起來，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是平等的，中國國家是和日本國家一樣獨立自由的。我們怎樣站起來呢，就是剛纔兄弟所說，要立人，個人自己不能立，國家自己也不能立。最少有三件事要注意的：

第一，是負責任。我不要各位談空虛的道德，更不要諸位談封建的道德，我所要求各位的，是大家負責任。人是有責任的，對國家有責任，對社會有責任，在政府若不公忠爲國，就是不負責任，在人民若不盡國家義務，就是不負責任。中國爲甚麼變成積弱之國，因爲自清末以來，政治和社會都腐敗墮落了，這種薄俗末流，至今還不能矯正，因此被人蔑視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不斷的惹起戰爭和事變了。假使政府和人民，都能自始至終的，對國家對社會負責任，先替國家和社會打算，然後再替自己打算，我相信，今日中國，不會這樣弱。諸位同胞們，負責任，就是道德，嚴格說起來，除責任之外，更無所謂道德，以後我們真正要認識國家，認識自己的責任，否則平等獨立自由都是空的。平等自由，不是人家給我

們的，應該自己拿人格去取得的。

第二是守尊嚴。國家的尊嚴要維護，用不着我說了，我要說的，是個人的尊嚴，人是尊嚴的，四書所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是人的尊嚴。人的尊嚴守不住，那便配不上稱爲人了。可是，我們要知道，驕妄絕不是尊嚴，因爲同是人類，我們固然要自尊，同時也要尊人，驕妄不只是尊嚴，而且是損失了自己的尊嚴。我們更要知道，卑屈絕對不是尊嚴，并且喪失了自己的尊嚴。我最痛心和傷心的，我見許多人，既不尊人，也不自尊，不論和國內的人和國外的人交朋友，不是妄自尊大，就是甘自卑屈。甘自卑屈固然損失自己的尊嚴，妄自尊大，也何嘗不是損失自己的尊嚴。如果我們同胞不以守尊嚴起，可以說，自己既不求平等，更從那裏去求平等。我今後希望於同胞們，我們應該切戒驕妄，痛戒卑屈，否則自己不能立人，怎樣去立國和建國呢？

第三是求知識。所謂知識，絕對是指科學的知識。現代的人們，如果不接受科學，是不能生存的，同樣的，國家若不能應用科學，也是不能生存的。我們以前太蔑視科學了，太拒絕科學了，無論任何事物，都比人落後，諸位不是時常聽見人說，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嗎？爲甚麼是落後？簡單言之，就是人家接受科學，而我們拒絕科學，因此人家一天一天的前進，而我們一天一天的落在後面。諸位同胞，今日世界是建築在科學上面的，國家和個人的生存，也是建築在科學上面的，世界的國家有前進和落後之分，就在於接受科學的先後，世

界有近代國家和殖民地之分，就在於接受和拒絕科學。我們要中國真正的獨立自由，應該照孫先生迎頭趕上的說話，才有希望。我所舉出之點，或者是老生常談了，或者是卑之無甚高論了，但不管常談與低論，我們同胞能夠實心實力做去，我敢信我們必能立己立國，從此更能建設一個新的現代的中華民國。我敢鄭重的告訴諸位同胞，這次汪主席率領同志和許多有識的人們倡導和平，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國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熱的人民的，我們絕對的維護國家尊嚴，更絕對的保持個人人格，我們是倡導和平，我們決不會叫我們人民屈辱的，我們是堅守睦誼，我們決不會使我國失其獨立自由的。諸位同胞，請你們跟着我們來擁護這個合理和正義的主張，不但可以建設新的近代的中華民國，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而且東亞也可以永久安定。

# 政工人員的基本信條

——八月十九日政治訓練班開學典禮訓詞——

諸位官長，諸位同學們，今天是我们政治訓練班開學典禮，荷蒙主席親自主持，又承各院部會長官光臨，我們官長和同學們應該想想怎樣對主席和各長官感謝。

今日的開學典禮，意義非常重大的，政訓班祇是政治訓練部底下的一個政訓班，而舉行典禮在國民政府的大禮堂，不止諸位院部會長官都辱駕降臨，指導我們，而且主席撥去一切政務，親自主持盛典，我們應該時時刻刻記着主席和政府各長官對於我們的期許。

我們尤應不要忘記的，汪先生是國家的領袖，在政府是國民政府的主席，在軍事是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在政治工作是中國起始軍隊有政治工作時代的各軍總黨代表，在民國十四年國民革命軍創始時候，總攬政治工作，而在今日復興中國建軍時候，親自主持國府還都第一次政訓班開學。怎樣重大的歷史意義，我希望諸位不要一刻忘記。

本來最理想而又正常的，對於軍事，應該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合一，而不應該分離。不過在一個重大的時期，要担任重大的使命，不得不使政治訓練獨立，使建軍能夠收更大更速的效果。民國十四年國民革命軍創立那是一個例，今日重大時代又已來臨，而我們要擔負重

大使命，因此有政治訓練部的設置，對於軍隊更有加強政治工作的組織。

過去的政治工作，已使我們完成了一個時代的使命，今日的政治工作，更責成我們完成目前時代的新使命，我們今日的任務，是要我們作了建軍的思想和行動的原動力完成和平反共建國的任務，完成三民主義擔負復興中國和復興東亞的大任。

主席的訓話，大家都聽明白了，今日開班伊始，我要宣告於各位的，是我們的服務規則，也是我們的政治工作的基本信條。服務規則規定有五點：

第一、對於國家，須決心擁護及保衛其獨立自由，并確認三民主義為建國之最高原則，和平反共建國為復興中國及安定東亞的大政方針。

第二、對於人民，須取合作精神，以軍隊的力量來協助人民為地方之建設，引導人民對軍隊的尊敬，以收軍民合一，共同動作之效。

第三、對於上級官長，須絕對服從命令，對於同級官佐，須親愛精誠以收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合一之效果。

第四、對於士兵，須誠懇嚴肅，訓練其行動，指導其思想，務使自覺的及堅強的信仰和實行三民主義。

第五、對於自己，須提起負責任，守尊嚴，和求知知識的精神，智深勇沉，務求表率官兵，並與士卒同甘苦。

這五種信條，是我們政治工作人員必守的信條，諸位已聽明白了罷。我以爲諸位來此受訓，不單祇是受人的訓練，將來還要訓練人。可是受訓，不祇是接受訓練，還要學會時時刻刻自己訓練自己。諸位將來訓練人，也要記着時時刻刻自己訓練自己。這幾種基本信條，我每星期還要詳細向諸位講解。今日先提出來，喚起大家的注意。

同學們，國家處境的艱危，你們知道的，時代使命的重大，也是你們知道的。你們應該一句一句的記着主席的教訓，提起精神記着信條，負起責任來完成你們的任務，這樣才不辜負今天主席親自主持典禮的意思，才不辜負國家託付你們重大任務的意思。



## 紀 律

——八月十二日政治訓練班紀念週訓詞——

我今天開宗明義提出紀律問題。中國爲什麼變成積弱之國，雖然有種種原因，而最大原因就是缺乏健全的組織，怎樣才能由不健全的組織而變成健全的組織，最要緊的基本條件，就是紀律。

我也知道不守紀律的惡習慣，本來不是大家的錯，而是歷史傳襲下來的大缺憾。中國數十年以來，古代的教條，只有教我們對於國家應該怎樣，對於家庭應該怎樣，對於自己應該怎樣。對於社會就從來沒有教我們怎樣，就是有，也頂多教我們對於朋友——那就是個人對於個人應該怎樣。就拿目前的教育來說罷，對於教人怎樣做一個好國民比較完備，至於教人怎樣做一個好公民就簡略了，至教人怎樣做一個好市民，那更沒有了。

我們從小就沒有受好好的社會教育，因此便沒有守規則守紀律的習慣。中國原本是一個農業國家，而社會和經濟又都停滯於封建的組織，凡是農業社會都是散漫的，經濟又是不集中的，人們生長在這個環境，自小受了深長的影響，於是行爲便浪漫了，思想是複雜了，對於國家沒有深切的認識，對於個人倒有驕妄的思想，至於對於社會，更是荒茫渺無一些觀

念。

還有些人除了絕無社會觀念外，更受了小說名士惡習的影響，以不守規則紀律爲清高，爲光榮，以爲人家守紀律，我偏不守紀律，亦用不着守紀律，這才算高人一等。我們想一想，如果人人都以不守紀律爲高人一等，那裏還有國家，那裏還有社會，那裏更練得成軍隊。

這種不守規則和紀律雖然是大家的過錯，雖然是歷史上遺傳下來的缺憾，但到了現在，不容我們再錯過，也不容我們長此不予補救這個缺憾。現在軍隊有了政治工作，那就是訓練和統一思想以外，更要訓練官兵嚴守紀律。

政治工作人員的責任，還不止訓練士兵，還要訓練民衆，我們服務規則內規定，凡軍隊駐在地的民衆，政治工作人員都要對他們訓練。這個規定的目的，還不止在於希望達到軍民合作，而在於使民衆有思想，守紀律。官兵的行動，更應作他們的模範。固然我們覺得中國的社會教育，實在不足，而學校教育也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可以得到的，所以把這個重大責任放在政治工作人員身上。

諸位想一想，國家把訓練士兵行動和思想的責任放在我們身上，我們的責任怎樣重大，我們務須時時刻刻負起這種責任，和時時刻刻自省和自覺的怎樣才可以完成這種責任。可是現在呢，我們自己先不守紀律，我真是非常痛心了。

諸位還要想，這班政治訓練班是國民政府還都後首創的政治訓練班，國民政府的大政方針是和平反共建國，但是這三大方針要實行還得要力量，力量在那裏，首在建軍。說到建軍，我們不患沒有兵士，不患沒有武器，而最要緊的是在建軍的核心。這核心是思想和行動的原動力，有了原動力，建軍才有意義，而所建的軍隊才有力量，那種原動力在那裏，就在各位的身上。國家對於各位的希望是那麼大，而期望又是那麼深，而我們對於組織的基本條件——紀律——還是不能守，不但我們自己感到失望，而且對中華民國前途也感覺失望。

中華民國現在處在一個什麼境地，諸位不是不知道的，我們能夠今日在此地談建軍，能夠在此地開政訓班，我們已經覺得僥天之幸了。我們若不提起精神。負起責任，這種僥倖恐怕不會時時都有的。

我切盼諸位都要明瞭中國的處境和自己責任，打從嚴守紀律做起，使得復興中國，更進而復興東亞，這是我最期望的。

諸位千辛萬苦來這裏做什麼？並且在這個大熱天氣來受訓練做什麼？我相信諸位並不是爲吃飯來的，不是爲饑寒交迫而來的。而是爲着救國來的。以世界現狀觀察，以東亞地位觀察，和平是救國的大路。和平是容易的事麼？對國家須在萬難中維護他的獨立自由，這樣個人非有嚴正的人格，非有整肅的修養，非有深造的學問，不能領導人民去和平，不能在國家九死中打出一生的生路。

這種困苦艱難的工作，如果沒有犧牲的決心是不能幹的，有犧牲的決心應從守紀律起。三民主義頭一個民族主義，不是別的高深東西，而首在團結，首在合羣，求知與合羣，就是恢復民族精神和完成民族主義的法寶，求知完全在刻苦，而合羣尤先應守紀律；大家不能守紀律，羣從那裏合起？

諸位從各地方來，目觀人民的疾苦，國家的危亡，在此刻還不自省自覺刻苦守紀律，那麼來此地受訓做什麼？若沒有犧牲的決心，更要做政治工作做什麼？

我也知道諸位對於住居不大覺得滿意，這個房子不獨你們不滿意，我也不滿意，空氣和光線不見得適宜於住居，但我們要知道這所房子在南京已不容易找，我們更要知道還有數十萬的民衆連房子都沒有。我們在這種艱難困苦之下，更要拿出我們的恆心毅力，以期研究學問，努力工作。四書有句話：『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泛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房子不滿意，諸位以爲苦麼？我是準備和諸位一起受苦的，各位官長也是樂意和諸位一起受苦的。

我明白告訴諸位，我已下決心負起訓練政工人員的責任，先把建軍的原動力健全起來，依次重建中國軍隊。因此我已下決心和諸位同甘苦，但是如有不守紀律，不聽教訓的同學，我也下決心嚴厲處置，決不寬恕。因爲我覺得對於國家，應該懲罰一個不良的國民，對於軍隊，應該懲罰一個不良的份子，這種責任我是不肯輕舍，而且這種責任我也不願逃避的，我

希望諸位聽我和各官長的教訓，先從守紀律做起，健全軍隊的組織，健全社會的組織，健全國家的組織。

# 政工人員應有的態度

——十一月十一日政治訓練班畢業典禮訓詞——

諸位長官同學們，

今天本班舉行畢業典禮，蒙主席親臨頒發我們證書軍刀，並且給我們以親摯沉痛的寶貴教訓，我想同學們一定永遠記着的。主席對於同學們屬望之殷，期望之切，開學時親臨教訓我們，上課時親臨教訓我們，畢業時又親臨教訓我們，我們應當提起大無畏的精神，來擁護主席的大無畏精神，我們應當鼓起國爾忘身的精神，來擁護主席國爾忘身的精神。我們應當時時檢討，時時勉勵，一定以主席的人格，作自身的模範，以主席的教訓，作終身的信條，這是我今天對同學們第一句的說話。

今日貴臨參加典禮的各位院部長官，對於同學們都有極大的希望，對於同學們更有極大的期許，在上課時期，各長官撥出他們的寶貴的時間，對諸位作精神講話，今天又撥出他們的寶貴時間，貴臨觀禮，我們想想各長官對於我們同學屬望是如何之殷，期許是如何之大，我們應當記着各長官都是我們的指導者，都是我們的保育人，我們應該時時想想他們的教訓，是不是已經做到他們給予我們的教訓。諸位同學是畢業了，這次三個月的短期訓練，不能

不說有了相當的成績。這都是各長官教官的努力，和同學們的勤奮，才有這次的成功，我對於各長官，教官，是非常感謝，而對於各同學，更增加了本人的信念。不過我們自己還是不能滿意的，別的不必說，訓練的地方，實在不能說適宜，教材也是非常之不完備，使得在受訓期間，同學們身心都未必十分的舒適。但是我想訓練兩個字，實在包含被訓和自訓的意義，這三個月光陰雖然短促，同學們已經有了堅定的認識，有了相當修養，我們根據認識和修養，可以繼續不斷的自己訓練自己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們更想地方不適宜，器材不完備，我們未能感覺十分滿意，然而目前無家可歸，終日饑餓的，還有幾千萬人，我們更應忍受一身之不適，而求千千萬萬人的舒適。

在這三個月中，我已和同學們說話不少，今天已沒有甚麼話可說了，我只喚起同學們的注意的，從今日起各人回到原來的隊伍，應當本其所知，本其所學，努力工作，我們今後已不是討論理論的時候，而是實行的時候，我們對於國家，對於人民，對於長官，和同級的官佐，對於士兵，對於自己等應該如何做，一一本着所受教訓去實行，這樣才不負國家的付託，才不負自己所受的教益。

不過我今日還有幾句話告訴同學的：

第一，不要驕妄。我們今日固然是困難，但是我肯定前途是光明的，或者很快便可達到我們初步的理想。然而同學們萬不要驕妄，古語云，創業固艱難，守成亦不易，何況在困難

危險中建國，豈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中國已往的失敗，就是由驕妄來的，我們應當朝夕警惕，不要再蹈覆轍。

第二，不要畏縮。現在許多人看事太容易，而又不認識自己的處境，以爲一朝和平，中國便可以躋於強盛，又不止以爲躋於強盛，而且恰像戰勝一切。及至偶有挫折，偶遇困難，便立即灰心，這種淺薄的心理，恰恰和浮囂的惡習相對照，我們同學應該認識事實，更要認識責任，抱定堅定不移的理想，抱定百折不撓的精神，愈遇挫折，愈要提起精神，愈遇困難，愈不要絲毫退縮。

第三，不要卑屈。我常告訴同學，不要忘記自己是人，不要忘記自己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更不要忘記自己是中華民國的軍人，大家懂得這點，自然國家和自己都有救。甚麼是卑屈？對人禮讓，決不是卑屈，只有己而忘國家的，才是自甘卑屈，對人忍耐也不是卑屈，假借力量，以攫取權利的，才是自甘卑屈。

第四，不要菲薄。不立志的，不能算是好國民，不立志的更不能算是好軍人，同學們不要以爲環境不好，便自甘頹廢，任何一人讓他最愚笨的，立志而不頹廢的，終會成功，讓他最聰明的，不立志而頹廢的，無不失敗，諸位同學祇要不自頹廢，天下事是不足爲的。

我和同學們要說的，就是這幾句話了，我們要知道，現在的科學世界是人做成的，近代國家也是人做的，世界任何事物，如果努力去做，決不會不成功，不成功的就是我們沒有盡



到我們應盡的力量。我們同學，應該認識事實，認識責任，重建中國，奠定東亞的大任，都在我們的肩頭，大家記着主席的訓詞，努力去幹，沒有不成功的，今天荷蒙主席和各長官蒞臨訓話，我們應當永遠記着，誓死擁護主席的主張，實行三民主義，實行和平反共建國。

# 我對於國民的要求

——十二月二日廣播演詞——

全國親愛的同胞們：

中日調整國交基本條約，已於十一月三十日簽字。關於條約的本質。簽訂的經過。汪主席已經向全國廣播了。對於中日兩國前途的期望，和我們對於東亞責任的負荷，汪主席也向我們同胞懇懇鄭重說過了。今夜我對於同胞們的廣播，是我對於國民們的要求。

中日調整國交的基本條約，到今日才簽定，我一方面是愉快，一方面是悲痛。怎麼說愉快呢，中國的自由獨立，在戰敗之後，到底是維持住了。這次和平，我不侈言榮譽的和平，但是我敢大膽的對同胞說句話，這次和平是無忝於良心的和平。我也知道在全面和平沒有實現以前，前途還有困難的，可是基本條約已定，最大的難關已經衝過，其餘困難，僅是時間和枝節的問題了。怎麼說悲痛呢，以中日兩國文化的交流，地理的接壤，經濟的密切，實在不必有這次事變的。以不必有的事變，而終於來臨，而且相互淪入血海至三年之多，這是誰的責任呢？我們用自省自責的精神來檢討，我相信每一個國民都有責任罷。現在死者不可復生，流離者還未減其痛苦，今日中日兩國，已簽定基本條約了，已往的我也不忍再說了，今

夜我以至誠最敬，表示對國民們的要求。

我第一個要求是我們應該以沉着的態度來接受。中日兩國事變，已經拖延三年多，早就應該結束。這次條約的訂定，日本是不以戰勝國自居的態度而訂定的，是用伸手和我們做朋友的态度來訂定的。然而我要求國民，日本於自己雖然不以戰勝國自居，對於我們雖然以朋友相待，我們應該不要忘記是個戰敗者。我個人是最坦白的，也最承認事實的，決不以敗爲勝，也不以弱爲強，我今日既是負責的一個人，更不能以浮囂騙國民，尤其不願以虛囂騙自己，我們應該承認事實，檢討自己。這次條約，雖然正式的討論了兩個月，實在已研討了一年，簡直可以說自有和平運動就開始研討罷。我們的態度，首先爲中國打算，更爲日本打算，最終還爲東亞全盤打算。我們的態度如此，日本的態度也是如此，中日兩方當局，真可謂心力交瘁了。如果我們國民，以浮囂虛驕的態度臨之，那不祇對不起國家，也對不起自己。所以我要求於國民，也應該爲中國想想，爲日本想想，爲整個東亞想想，而且更以設身處地的沉着態度，爲當局想想。

我第二個要求是我們應該以誠摯的態度來實行。大凡一種條約的簽訂，雙方都負有對條約的義務和責任。這次中日基本條約，不止中國有他的義務和責任，日本也有他的義務和責任，綜合全部條約，以雙方而不是單方的，是對等的而不是片面的。我們要表示責任，我們應該以誠摯的態度來實行，我們要日本表示責任，我們更應該以誠摯的態度來實行，我們要

將來中日關係不斷的自動的更加改善和增進，我們更應該先以誠摯的態度來實行。不但如此，中日合作的問題，真是千頭萬緒，有政府的合作，還有個人的合作，我希望我們更以誠摯愛國之忱，擴而為奠定東亞全局之舉。大家應先為國家，後為自己，大家若忘記了國家利益，先從自己利益着眼，那是缺乏最高的誠摯。大家若忘記了國民尊嚴，先從自己利益着眼，也是缺乏最高誠摯。大家應當以誠摯和兢業態度，來實行條約，那才無愧為中華民國國民。

我第三個要求是我們應該以嚴肅的態度來自勉。中日兩國的基本條約，雖然訂定，前途不能說沒有困難，我們的工作和責任，真是莫大的艱巨。自今以後，我們的工作和責任有兩面：一面是復興中國，一面是復興東亞。我們就以復興中國而論，已經覺得道大投艱了，我們自己檢討，我們的力量，是不是已經夠復興中國，我們自己檢討，我們知識是不是已經夠復興中國。我們更要檢討自己，我們的行動和才德，是不是已經夠擔起復興中國的巨大責任。國民諸君，我們對於每一件事，都要自省的，都要努力的，國家一興一敗，完全繫乎國民，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一起一降，也完全繫乎國民。我要求於國民諸君，應該以最嚴肅的態度來自勉。

我第四個要求是我們應該以勇敢的態度來邁進。中國自有外交以來，都是倚賴外援，忘記自強。過去百年的外交史中，我們缺乏自強不息的勇敢性。我們過去依賴外國，所以弄到永蹶不振。我們過去倚賴外國，所以構成這次空前的事變。這次簽定中日基本條約，我們的

自由獨立，很感謝日本的尊重和支持。但我們應該以至誠感謝日本，不應該存心倚賴日本，一個人不能獨立而專想倚賴朋友，是人類之恥。一個國家不能獨立而專想倚賴別國，也是國家之恥，我希望四萬萬人共同努力，建樹國家，這樣，才可以分擔東亞的大任，而不至為東亞全局的重累。國民諸君，我們提起中華民族的勇敢精神，朝前邁進罷。這次中日基本條約的簽定，對於已往是劃一時代，對於將來是開一新紀元。今天是事變一大結束，而為開始兩國永久如平的第一階段。我在東京曾說過：我希望在事變結束之後，日本能夠不斷的自動的修正已定的關係，而中國也不斷的自動的增好未來的關係，這才是真正永久的和平。

我更說：我還有一個理想，以為中日兩國將來有兩種機運，所以消滅爾我的痕跡。其一是東亞有一天危局的來臨，中日兩國共同站在一條生死線。其一是和平之後，我們計劃出一個東亞國際的機構，防衛以東亞為中心，經濟也以東亞為中心，按着國家間防衛之長短，人口之多寡，以分配防衛的責任。按着國家間生存的需要，發展的程序，以確定工商業和資源的進展。這樣各保有主權，共擔安定的責任，忘記這次事變的痕跡，并且放棄不必要的條件，那時中日兩國真真永久和平了。

親愛的國民們，我說那兩種機運，現在都同時來臨了，東亞危機已迫在眉睫，而東亞的國際機構，也將因中日兩國有識之士所提倡的東亞聯盟而萌芽了。我們應該鼓起勇氣，速下決心，藉着這次中日調整的條約基礎，朝前邁進。

## 兼長上海市就任前之談話

——十一月十四日在京招待新聞記者席上發表談話——

余奉命長滬，屢辭不獲，其所以遲遲一月而始受命者，深懼一己之才力不勝，而負汪主席之期望也，上海富庶甲於全國之口岸，中外雜居，人口已至五百萬，不止縮穀京畿，而且爲長江數省二萬萬人經濟之動脈，以故主持滬市者，不祇需要廉潔之素養，幹練之手腕，尤須富有經驗，具有威望者始足當之，余則自審資歷，尙不足以語此，茲既倉促受命，愈增其警惕之念，而深懼不能副政府與人民之期望。

余對上海市政，絕無大政方針可言，蓋市政非政治問題，而爲一單純之行政問題，因市政有其本身之目的，有其本身之範圍，所謂目的與範圍，簡單言之，卽爲如何始可使市民安居樂業，語其方法，則直捷言之，興利除弊而已。

上海情形，本已複雜，目前則瘡痍未復，凡百待舉，何者應興，何者應革，現未視事，不敢預言，然有數事可以奉告者：

(一) 余素提倡積極的廉潔政治，上海不止爲中國之最大都市，且爲世界有數之大都市，而世界都市固被人爲目弊病之藪者也。無論利弊之應興應革，須先有一發動與鞭策之中

心，故市政府上下如廉潔者，則利易興，反之則弊必難革。余不止希望市政人員潔己奉公，即兼營正當商業者，亦應立即脫離。先示市民以大公，然後始能收以身作則之效。

(二) 凡一政事之興革，首先應有計劃，而計劃之起點，尤在預算之草成。聞目前上海市政府至今尚無確定預算，或者因於財政困難，以致久未成立，亦未可知。但預算不立，則凡百措施，皆無軌道可循。本身已亂，遑言計劃，余故今日不欲漫談大而無當，空而無補之計畫，祇願先竭全力，先促全市預算之完成。深望能於明年一月付諸實施。就本身之收入，謀預算之確立。

(三) 世界市政之發展，必與其工商業發展為比例之推進，市區過小，固礙市政之設施，而市區過大，亦於市政無深切之聯繫。以故一市之區域大小，要視其本身之發展如何，若過大過小，皆無裨行政之實際，因此余對於目前上海市之區域，認為有重行考慮之必要，蓋余不欲誇大與鋪張，而願求得一實事求是之效率也。

此外上海市之治安尤為今日嚴重問題，余更願瘁其全力，以求市民安居樂業。要之，任何都市，若欲公安之確立，與事業之繁榮，非合全市民之力以合作，決不能希望有長足之發展。凡屬居民，無同中外，均應與市府合作，然後始能繁榮與安全，此則余對於上海中外人民之唯一深切要求也。

# 希望中日人士合作建設大上海

——十二月十日在滬招待日本官民席上講演——

本人自前月二十日就任上海市長，因着接收的繁忙，人事和機構的調整，直到今日，才得機會歡宴諸位，這是本人深感非常抱歉的。今夜諸位不以延遲招宴爲不恭，更不以粗餐薄酒爲不敬，惠然光臨，不吝指教，這更令本人深感榮幸的，本人就任前後，更欣逢中日基本條約的簽定，從此兩國國交，更臻鞏固，中國的建國大業，有道可循，而東亞奠定之基，更因此而確立，本人深深感覺中日兩國前途有無限的光明，而個人於此偉大事業，得參與其間，稍盡棉薄之力，更感覺無盡光榮的。

上海爲中國最大之都市，亦爲世界有數之都市，更爲中日兩國具體合作之表現地，本人殊感能力薄弱，不足負荷此等艱巨，諸位期望於本人者愈深，本人增加惶懼亦愈甚，此後不但希望諸位對於市府盡量援助，同時更希望對於本人不吝指正。

世界無論任何都市，第一問題，即在全市之治安寧謐，及人民之生活增進，這個問題，在平時已爲市政之首要問題，而在今日之上海，尤爲迫切，上海負責的當局和上海的市民，幾於無人不談復興上海，無日不談復興上海，但治安不確立，復興絕不可期，生活不解決，



復興終成空語，本人很想對於這個問題，先盡其全力謀一解決方法。然而一市的治安與生活，每個市民都有切身的關係，每個市民亦有應負的責任，所以本人深望市民諸君，給予本人以努力的合作，尤望日本有關的負責諸君更予本人以努力的合作。因上海除中國市民之外，最大多數即為日本人民，而且上海更為中日具體合作的表現地，若上海的中日合作無良好成績，其他各地的中日合作便更難發生良好的成績了。

本人更願為諸君告的，本人既負上海市長之責，即以全上海之市政為己任，租界祇為一時的現象，在租界內仍為中國主權之所在，於主權有關之事，本人決不願稍避責任，租界的人民，本人亦當一視同仁，同為上海市民，同為中華民國的人民，本人亦不願因其偶然住居於租界，而加以歧視。要之本人請求於諸位協助者正多，今夜不過簡括言之，本人敬謝日本尊重中國的獨立自由，敬謝日本臣民給予國民政府的援助，因更此不嫌冒昧，請求諸位個人以協助，解決上海急迫的治安和生活問題，今夜酒肴雖薄，意志極誠，願舉杯祝諸位健康，祝中日兩國密切合作前途的光明。

赴日言論

# 米內內閣總理大臣招宴席上答詞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時在內閣總理大臣官邸發表——

總理大臣閣下，諸位大臣閣下，諸位閣下：

今天鄙人等奉命來貴國答禮，承首相予以款待招宴，不勝感謝與榮幸。

這次貴國阿部大使至中國慶祝國民政府還都，繼續調整兩國關係，我們並不以為這是尋常的外交，而實為東亞劃一新時代，開一新紀元。因為阿部大使把貴國全國的熱情與誠意，都帶到中國來了，我們接受之後，深深的感動，把中國對於貴國的期望，溶化於阿部大使帶來貴國全國的熱情與誠意。

鄙人等這次來日答禮，一些物質的東西都沒有帶來，甚至於最少的禮物都沒有帶來。因為我們感覺物質是身外的，人類最大的禮物，還是熱情與誠意，因此我們也祇有將敝國全國所有的熱情與誠意，帶來答禮。我本人確信這兩國熱情與誠意交流，一定可以奠定中日兩國的和平基礎，和確定東亞全局的大計。

貴國曾疊次聲明，尊重中國的獨立自由，國民政府還都，貴國更不惜竭其全力支持。我們深信貴國不是專支持汪主席個人的，除了支持國民政府以外，最大和深遠的目的，還是支

持中國的獨立自由。我們今日敢竭誠代表國民政府向貴國致謝，更代表全國人民向貴國致謝。

我們未到貴國以前，已經感應了貴國的熱情與誠意，到了貴國以後，更融洽於貴國熱情與誠意。今天我們初到東京，已領首相的教益不淺，我們留東京的時間雖然很短，深信這幾天內，更會多領首相和諸位大臣的教益。

我本人確信中日兩國將來還要共同擔負東亞的大任，祇是本人能力有限，不知能否副敝國人民和貴國人士的所期。今天能夠和諸位大臣相聚一堂，感覺得個人的責任更重。承諸大臣的教益，更增加了個人的學識和勇氣，本人雖不才，也願盡其棉薄，追隨諸位大臣之後，共負東亞邁進之責。

人的感情太熱，衷心過誠，每每阻礙了辭令的修飾，今天答辭的簡陋，希望諸大臣加以原諒。本人謹率同全體使節，借主人的酒杯，敬祝諸位的健康。

# 答禮使節團謝宴席上致詞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七時——

總理大臣閣下，諸位大臣閣下，諸位先生：

今天粗備薄酒，敬請諸位大臣，荷蒙光臨，彌增榮幸。我們對於諸位，感有兩重的謝意，其一，我們這次東來答禮，承蒙貴國殷勤招待，厚誼隆情，殊非言詞所能表示我們的謝忱。其二，我們在東京雖然停留只有數日的期間。但與各方交換意見，深承教益，這種熱情與誠意的交流，實開東亞歷史的新紀元，將來得以永久和平，中國尤其受益不淺，這更非言詞所能稍示其萬一。

我們明天便離東京了，我們雖然離去，對於這幾天的重大歷史的意義，一定永不能忘，現在臨別，本着依依之情，還想一貢未完之意。

我曾說過事變非起於一日，而和平非倖成於一時，因此我明白承認，今天只能謂之和平開始，而不能謂為和平完全成功，以後不獨有待於我們努力，尤待於貴國努力，更有待於雙方共同協力。

中日兩國的和平，今日已奠定了基礎，但由此基礎以建築起一座永遠崇高的和平寶塔，

是需要相當時日的。中國書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又曰『凡事難於圖始，而易於樂成』，可見非常的偉舉，不容易立刻成功，不過開始雖難，而成就則容易罷了。

和平前途，還要雙方努力的，但一國的領袖時時有他崇高的理想，深遠的目標，只有排除萬難，邁進不息，自然有實現理想和達到目標的一日。我們對於東亞全局，對於中日前途，遠矚高瞻，為百年大計打算，為數萬萬的人類打算，既抱有這種崇高的理想和深遠的目標，縱使本身犧牲，也不惋惜，又何況祇有困難，我們斷不必稍存疑懼。

諸位大臣的責任，繫中日兩國之安危，我們的期望極其殷摯的。諸位大臣的學養，實為我們的先導，我們的觀摩，尤其得益的、我們德薄能鮮，一身不敢謂足以繫東亞和中日的安危，但有諸大臣為之先驅，我們必當努力偕進，不敢妄自菲薄，更不甘自諛惡。

今日感謝之意，實非言辭所能盡述，酒肴粗簡，祇借以表示真誠，敬祝諸位健康，前途萬福。

## 貴衆兩院招宴席上答辭

——五月二十五日正午——

小山議長閣下，松平議長閣下，諸位先生：

今天承貴衆兩院殷勤招宴，鄙人等實感衷心感謝。

鄙人在南京時，對於松平伯爵，小山議長，領益已多，想不到很短的時間，重復相見，而且更能和諸位先生晤面，這不但感覺榮幸，而且還抱有無窮的希望。

上一次松平議長，小山議長，兩閣下至南京參加慶祝國府遠都典禮；我們已深深感到日本全國國民的真誠。此次來東，親聆松平閣下和兩院同人的教益，更見日本全國國民深切瞭解中國的處境，和對於中國表示的真誠，我們除了以衷心的真誠對日本國民答謝和共鳴之外，實在非言語所能表示於萬一。

鄙人是中華民國立法院長，深願對於憲政向諸位領教。

以憲政而論，日本有悠久的歷史，是中國的先進國家，以個人而論，諸位先生都對於憲政有深長的經驗，是爲鄙人的前輩。鄙人以立法院長的地位，能夠親來貴國，親自觀摩憲法，親自敬聆諸位的教益，對國家，對個人，都有極大的進益的。

實施憲政，爲國民政府的政綱，我們務於短期之內實行，是毫無疑問的。但一國的地方自治不立。一部憲法也等於空文。中國地方自治不能躍進，其原因雖多，而大要分析在農村教育不能推進，及農村經濟不能發展。

教育推進的問題，不止在教育經費，而尤在於師資，我還記得在廣東時，汪先生一次要實施義務教育，經費是有着落了，而師資不足。我們估計廣東第一期義務教育，最少要八萬的教師，而師範學生，連前清末年所辦的優級師範，初級師範，乃至民國初期的高等師範，甚至在學的師範生全數，還不及六千。所以中國師範師資的養成，還是需要時日的。

至於農村嚴重的問題，因爲農民過多，耕地太少，現在中國農民每人平均得地不過三畝多，因此地方的教育，警衛，交通，農民無法得有餘資開辦。古語有云：『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哉』，今日則變爲農民救死不贍，奚暇談自治了。

教育不推進，地方自治的組織必不會健全，經濟不發展，地方的建設即無從着手，但我們實施憲政是早具決心的。我們對於教育，努力培養師資，選擇教材，妥籌經費，而對於農村的經濟的發展，除了增加耕地之外，則擬設法減少農民人口，慢慢移殖於輕工業中。

教育。我們是可以自己推進的，但對於工業的發展，則不能不求貴國予以技術的協助，衷心的諒解。今天除了感謝主人，敬祝主人健康之外，更希望主人多多給與我們教益。



## 興亞團體聯合會及言論界聯合招宴席上答詞

——五月二十三日正午在東京——

近衛公爵閣下，諸位閣下，諸位先生：

今天承蒙各團體招宴，至深感謝。諸位先生很關懷中日兩國的前途，研究中國問題也有素，我相信或者諸位對於中國情形比我還清楚。我這句話，不是自謙之詞，因為人類總有些惰性，生長於一個地方習然若忘，往往本身的弱點習慣了不覺，而偶然一個外人來到，一看便看出他的優點和弱點。

我留東的時間很短，或者沒有很長的時間領諸位教益，因此借今天的機會，多說幾句誠意熱情的直率話。

中日兩國地理接壤，經濟密切，不應有事變的。論到文化，在明治維新之前，中國若干的舊文化久已流至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若干的新文化久已流到中國，照這樣兩國文化的交流，更不應有事變，爲什麼我們不以爲有的事變終於來臨，就根於兩國太不互相了解。我常常自省和自責，中國以前對於日本不但不了解，而且故意的不去求了解，雖然日本朝野言論，不把事變的責任，放在某一方，而這種故意不去求了解日本的責任，我們朝野是無

可逃避的，至少我個人是不願意逃避的。

現在中日是和平了，我們還不須斷的自省和自責，我們期望於貴國朝野的有一點，即是確定對於中國的希望。譬如兩個朋友，他們能夠做成朋友，除了了解性情之外，自己必定有意的或無意的想，一旦有事，這個朋友能幫我什麼忙呢，我又能幫他什麼忙呢！他對我的希望是什麼，而我對他的希望又是什麼，這種希望一經確定，兩人便可以作生死交。

過去中國對日本可以說絕不考慮自己的希望，甚至於也不去希望，這絕不是待朋友之道，我們應該深深自省和自責的。而日本對於中國的希望，有是有的，然而從來沒有確定，中國不知道日本對於中國的希望是什麼，他的希望限度又是什麼，因此中國由懷疑而直至放棄一切希望，這於我們引以為慊的。

現在我們的大方針已決定了，共同防共，經濟合作，睦鄰友好，是我們最高的方針，我想本着這個方針做去，中日一定能夠永久和平的。不過依我個人的見解，戰爭決非起於一日，而和平也非倖成於一時，我還希望兩國有識之士以後還要共同不斷的努力。

我的意見以為這次中日調整關係，不過是結束事變，與開始和平的第一個階段。東方的道德與西洋不同，就為『莫逆於心』『相喻於無言』，一談到條件，覺得沒有意思了。因此我希望在結束事變之後，日本能夠不斷的自動的修正已定的關係，而中國也不斷的自動的增好未來的關係，這才是真正的和平。

我還抱有一個理想，以爲中日兩國將來有兩種機運，可以消滅爾我的痕跡。其一是東亞有一天危局的來臨，中日兩國共同站在一條生死線。其二是和平之後，我們計畫出一個東亞國際的機構，防衛以東亞爲中心，經濟也以東亞爲中心，按着國家間防衛線之長短，人口之多寡，以分配防衛之責任，按着國家間生存的需要，發展的程序，以確定工商業和資源的進展。這樣各保固有的主權，共担安定的責任，忘記了這次事變的痕跡，并且放棄不必要的條件，那時中日兩國，眞眞永久和平了。

我爲貴國的熱情與誠意所感，不覺說話太長，不覺說話太不文飾，但我相信諸位先生一定體察我的熱情與誠意而加以原諒的，謹此敬祝主人的健康。

## 經濟團體聯合招宴席上答詞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時——

諸位先生：

今日承蒙諸位先生款待，我們不止感謝，而且覺得榮幸非常，因為各界都是經濟界的領袖，事業是繁忙的，時間是極寶貴的，今日捨其繁忙的事業與寶貴的時間來款待我們，這真使我們不能忘記的。

諸位先生是經濟界的領袖，必定對於中日經濟合作前途很關懷的，我因為感謝諸位先生的熱忱，所以對此問題不辭有由衷之言的直率貢獻。

將來中日經濟合作，必根據於平等互惠的原則，自不待言，但凡是兩國合作，必須互相瞭解合作國家的處境和心理。事變之前，我常聽見貴國言論，說中國願意和歐美合作而排擊日本，這種觀察是誤解的。其實據我所知，中國以前固然沒有切實和日本合作，也沒有切實和歐美合作，為什麼呢？中國是一個積弱的國家，有她說不出的心理。

我從前在實業部四年，所有事業始終沒有和外國人合作過，並非我不願，事實上有不能，我會憤慨做過一篇文章，中間有一段話，我今天介紹給諸位。

我說：「歡迎外資的話，我聽了不知凡幾年，但至今往復討論，不斷接洽，還沒有效果，其故安在？中國的心理，一方面歡迎投資，一方面畏懼投資。外國人的心理也一方面希望投資，一方面懷疑投資。」

中國人爲什麼歡迎投資也畏懼投資？這種心理並不是反常，而是根於歷史。以前中外所訂合同，也有喪失國權的，也有損害利益的，也有違反法律原則的，甚至超於外國本身的商業習慣的。何況外國人民在中國許多還有領事裁判權？所以與其悔於事後，毋寧慎於事先，於是定有種種外人投資的原則，有種種外人投資的限制，甚至於有些不大合理的規定。外國人既不能在董事會佔得多數權，又不能在一公司得到總經理，他們爲什麼一定要在中國投資呢？

外國人爲什麼希望投資也懷疑投資？他們有他們的希望，所謂希望決非其他，祇以爲中國爲一有希望的市場，爲一未發展的大地而已。然投資者的心理第一即在安全，中國政府不是予以有力的保護，他們的待遇是不是和中國人民平等，這是他們猶疑之一。

此外還有一個不合理的懷疑心理，他們所要的不是普通營業，而是希望特權。因爲過去的中國法令不全，而外人每挾其臨於滿清的態度，要求過甚，所以他們的意思，資可以投，特權也要，最好在中國不納賦稅，不守法令，讓他們自由。

有這兩種矛盾的心理，所謂外資，徒成奢望。我常對一般外國朋友說：中國有些限制固

不合理，而外國的心理也要改善，否則投資之說，恐無良果可言，最好我們忘記了一切限制，而專從善意及了解做起。」

我這番說話是民國二十三年說的，今日說起來，恐怕情況猶然如此。中國為什麼要限制投資，和外國合作苦苦要佔投資額百分之五十一，因為中國是一個弱的國家，技術既沒有進步，所以堅持這個百分之五十一，為自衛的武器。

若以實質的經濟學眼光來說，一個事業的管理誰屬，每每在技術而不在股權，但中國除了股權多寡的爭持，他更沒有把握了，因此貴國要和中國經濟合作，必須了解中國的處境和心理，中國是一個弱的國家，因為國家弱，所以心理也弱了。今後中日兩國合作前途是長遠的，我們自己應該廢止了不合理的限制，而貴國人士也應該了解中國的處境和心理，最好更以事實表現，幫助中國，強化了中國的心理，正和我剛才所說忘記了一切限制，而專從善意及了解做起。

我所說的是衷心之言，諸位先生一定諒解我的衷心，而其恕直率。敬祝中日合作前途的光明，敬祝諸位先生的健康。

# 廣播演詞

——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時半在東京廣播台——

親愛的日本國民們：

今夜我能夠在貴國的首都，親自向諸位說話，本人感覺非常榮幸。今夜廣播，雖是短短的時間，而我終生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貴國阿部大使到敝國來，慶祝國府遷都，調整兩國關係，同時把貴國全國的熱情與誠意，都帶到中國了。我們中國朝野，非常感動，也非常熱烈，因此國民政府派遣我來貴國答禮。我到貴國，雖是答禮，但一點禮物都沒有帶來，可是我並不慚愧，因為中國所有而所帶給貴國的，也僅是熱情與誠意，我此行都把他帶來。我相信我帶來這種熱情與誠意，一定和阿部大使帶給我們的貴國熱情與誠意，互相交流的。兩國這種熱情與誠意互相交流，我確信可以奠定中日永遠和平的基礎，和奠定了東亞百年大計。

我這次來到貴國，親眼見着貴國的熱情，愈加強了我個人的信念，那信念是什麼？就是中日一定可以永久和平，中日兩國一定可以誠心合作。我們忘記了這次事變罷。我們不但要在心內忘記，還要在歷史上消滅牠的痕迹，因為我們前途是光明的，而且還要共同擔負安定

東亞的大任的。

中國目前雖然還沒有做到全面的和平，但以兩國的熱情和誠意交流，我確信最近的將來，一定可以實現的。我們應當忘記已往，注意將來，現在世界正在劇變，中日兩國的人民，更應親愛合作，準備共同擔當未來的大任。

我很感謝貴國全國的熱情與誠意，我此次回國，一定把親眼見的告訴中國全國的國民。中日兩國的地理太接近了，兩國的經濟關係，也太密切了，照理論，照事實，實在不應有事變，而且貴國在明治維新之前，中國的舊文化已有若干流至貴國，明治維新之後，貴國的新文化也有若干流至敵國。這樣文化的交流，照理論，照事實，實在更不應有事變。

可是不應有的事變而終於到來，我想凡是兩國的人民，每一個都慨嘆，都煩惱。現在兩國又重新攜手了，好像兩個兄弟，雖然一時有些小意見，而因為兄弟的關係，終於相見以誠，相親以義，終於合作。諸位親愛的朋友們，我們慨嘆是沒有用的，我們應當互相努力，以了解代替那慨嘆；煩惱也是沒有用的，我們應當互相努力，以至誠合作消滅那煩惱。

中日這次釀成空前的巨變，太是不幸了。我們爲着這次事變，無時不自省和自責，前年和去年以至今日，讀了許多日本朝野的言論，很多自省和自責的說話，更加重了我們的自省和自責。

貴國朝野許多言論，對於這次事變，不把戰爭的責任放於某一方，這是我們很感動的。



前年近衛公首相，本着悲天憫人的崇高理想，首先放送和平空氣，更是使我們感動的。因此汪精衛先生有豔電的主張，我們同志和國內有識之士，羣起擁護，這種心坎的共鳴，我想凡是人類都應該同心相應，同氣相求的。

大凡兩個國家的事變，決不是起於一時，而兩個國家的真正和平，也決不是倖成於一日。但大家能夠抱着近衛公爵和汪精衛先生的理想和精神，我們兩國決不會有事變的，而且將來更不會有事變的。

## 京都官民招宴席上答詞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七時——

川西，市村，田中諸位閣下，諸位先生：

此次鄙人等奉命至貴國答禮，現在任務完畢，得有機會來游京都，今晚復承各位招宴，雲誼高情，至深感謝。

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中心，回憶鄙人十八年前來游貴國，那時無日不想至京都觀光，終因事未果。自是十八年間對於京都的文物。無時不縈之懷抱，今日至此，一旦實現十八年中的夢想，真是感覺非常的愉快。

京都，是日本文化的泉源，我們到了此地。感覺全京都充滿了和平氣氛，彷彿身心都沐浴在氤氳的文化裏，又承諸位懇摯招待，不吝指教，其親熱之誠，至足感人。因此更使我們感覺非常的愉快。

中日兩國文化的交流，有二千多年深長歷史，至於隋唐之世，尤為隆盛，到了今日，中國的典章文物，在中國久已消失的，京都還是保存。因此中國研究文化的學者，每每提到貴國的京都，無不心儀嚮往，我們今日和諸位會晤，不但感懷歷史，還似重見古人。

這次中日兩國的事變太是不幸了，以兩國有千數百年的友誼，而不幸有此事變，不但我們千年前祖先萬不會想到，就是四五十年前我們的祖父也萬不會想到。這是誰的錯誤呢？還是我們現在後輩應負其責罷。我們兩國的祖先，勤勞辛苦，互為文化的交流，他們現在希望我們後代彼此以誠相見，永以為好的，今日我們感懷歷史，真是惹起無窮的自責，以後應該如何彌縫此次的缺憾，以期無負於兩國祖先的期望，和無負前此千數百年文化交流的前功。

文化的交流，不止可以消弭事變，并且可以增進兩國民族的友誼，更進一步可以奠定東亞和平的基礎的；我們今後應該本着已往的歷史、更盱衡未來的前途，兩國文化應更加緊密切，取互尊互讓的態度，來恢復東方的精神，這是我們馨香以禱的。

今夜承各位懇勸款待，於感激之餘，遂不禁緬懷過去中日已往文化交流的歷史，欣幸在貴國文化中心的京都，深想諸位以款待的隆情，重肩密切文化交流的大任。至於鄙人等雖才力淺薄，也願追隨諸位之後，共作恢復這種文化緊密交流的前驅的。

## 大阪官民招宴席上答詞

——五月三十日下午七時在新大阪飯店發表——

半井，坂間，安宅，中山，諸位閣下，諸位先生：

此次鄙人等奉命至貴國答禮，現在任務完畢，道經大阪，承各位招宴，厚誼隆情，殊使鄙人等既感且愧。

大阪是日本的工商業中心，在座諸位，都是工商業的領袖，縱使有不直接經營工商業的，也當間接有關，最少也對於工商業有若干的關懷與興味。我會記得，我們在東京承經濟界招宴，我曾披肝瀝膽，向招宴諸君陳辭。今日在這個工商業的中心，承蒙歡迎，爲着衷心的感謝，更不容我不再披肝瀝膽的再說幾句直率的話。

中日兩國以後一定能夠在平等互惠原則之下經濟合作，這是毫無疑義的，共同開發中國資源的一句話，我們也是一定能夠實行，這也是毫無疑義的。但共同開發資源一句口號之下，諸位決不要忘記了日本應當協助中國發展工業的一個重大涵義，怎樣說呢？既名共同開發資源，貴國也應當加入資本，我們也應當加入資本，可是投資的第一問題，即在投資之後，大家的資本安全與不安全，倘若不能安全，貴國必不會投資，而我們的實業家也不會投資，

大家要資本安全，首在中國的安全。

我曾在東京貴衆兩院歡迎席上，明白的指出中國若要實行地方自治，必須發展農村經濟，換一句話來說，中國若要政治安定，也必須發展農村的經濟。說到農村發展，真是千頭萬緒，但最要的問題，即在減少農民的人口，而把他們移殖於工業中。中國農民佔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而農民平均每人得地祇得三畝多，這個嚴重問題，無論如何也必須解決的。

諸位不要恐怖，以爲中國工業發展，便妨害了日本工商業。我以爲中國工業發展，只有助於日本工商業，而無害於日本的工商業。我有以下的簡單理由：

第一，我也知道日本重工業還沒有至自給自足的程度，可是她已經由輕工業而躍進於重工業的階段。譬如我們建築一座十三層的寶塔，日本已達到十一層，不久便蓋頂了，而中國的輕工業還在萌芽，所有自製品，都不能自給。我調查了十七種輕工業，能夠有餘的只是絲織品和火柴，其餘十五種都和本國消費量相差太遠，棉織品差百分之八·九，毛織品差百分之七十八·四，針織品差百分之九·六，麵粉業差百分之五·三，砂糖業差百分之五十五·六，捲烟差百分之二·五，玻璃差百分之五十三，搪瓷差百分之十七·九，製革品差百分之四十四·六，橡膠品差百分之二十九·一，紙類差百分之六十四·一，水泥差百分之十六，磚瓦差百分之十六，三酸差百分之三十四·六，碱差百分之三十三·五，而且其中不純粹是中國資本的，例如棉織，針織，毛織，麵粉，砂糖，捲烟，外國資本很佔重大的位置。諸位

不要以為這個數字相差太大了，其實中國人民太窮了，假使國民經濟稍為活動，他需要的相差額，便立刻顯出比現在的相差額超過數十倍了。因此我以為中國的輕工業發展，是為國民經濟進展的第一步，中國的國民經濟進展，不獨有助於日本的重工業進行，甚而有助於日本的輕工業進行。

第二，事變之前，日本的進口價值，每人平均為五元六角美金，而中國僅得六角美金，相差竟至百分之八十九，中國人口比日本多五倍，而每人平均入口價值只及日本百分之十一，這就可以證明中國人民太窮，沒有購買能力。中國人民為什麼沒有購買力量，就因為沒有輸出，所以沒有錢來和外國交換貨品。中國大宗的輸出是棉花，桐油，雞蛋，腸衣，豬鬃，未製皮革等寥寥幾項，連每日依此為生的米和麥，也得自外國運來，而且還要大宗運來，中國若照此赤貧下去，固然無法生存，就是對於日本的重輕工業，也要連帶的沒有購買力量。所以我說中國若能發展工業，於日本的重工業固然有好處，就是輕工業也有極大的好處。

或者諸位還有少數人要問，中國發展輕工業，誠然對於日本目前有好處，但中國輕工業能自給時，豈不是日本的重工業少了銷場嗎？將來中國輕工業發展至相當程度時，還要爬上重工業階段的，日本的重工業豈不是要受影響嗎？我可以答覆諸位，依照經濟學人類慾望增加的原理，是絕對不必憂慮的事，我們拿重工業來說罷，中國的幅員這麼廣，交通線又那麼短，日本目前乃至稍遠的將來的鐵道器材，決不足供給中國的，汽車和飛機也不能供給中國

的，只就這兩種來想，日本依着中國的交通發展來推進日本的重工業，那就繁榮無限了，又拿輕工業來說，中國農民還沒有能力穿細紗，至於毛織品則未嘗夢見，只就這兩種來想，中國經濟稍能發展，對於日本的需要也就可以想見了，舉一二以例其餘，諸位先生當能推想其他一切的，還有許多理由和數字，今天因為時間關係不容許我詳細提供諸位參考，要而言之，我奉勸諸位對於中國工業發展，要妨害日本的問題，不必憂慮，人類慾望的發展，是隨着經濟進步的，中國經濟愈發展，需求於日本的必愈多，過去祇為中日的感情隔膜，才弄到有無不能相通，長短不能互補，今後我們必須根本改善彼此心理，增進彼此友誼，無論任何事件，對於已往，大家自省和自責，對於將來，大家互諒和互讓，我深信彼此永遠能和平能合作的。

在座諸位，都知道中日還要共同擔負東亞的大任的，若中國經濟不發展，中國必無力分擔重任，要中國經濟發展，日本應接以協助中國發展輕工業為始。我感於中日兩國共存共榮的重要，所以今天先提出這個問題供諸位考慮，我的言詞是率直的，而我衷心是真摯的，諸位都是工商業的領袖，必定對於這個問題研究有年，一定能夠了解我的真誠，而予中國以有力的資本和技術上的協助的，我為中日共存共榮，敬祝諸位健康和兩國前途的幸福。

## 華僑聯合招宴席上答詞

——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七時在大阪中央公會堂——

主席。諸位僑胞先生：

今夜承諸位的歡迎，並承諸位先生對於我們讚獎，實在使我們既感且愧。

我們此次來日答禮，每到一地都有僑胞歡迎，甚至深夜也來歡迎，這種盛意實使我們感動的，今夜與宴諸位先生，多數都是從日本各地來的，不遠千里而來招待我們，實在有說不出的謝意。

說到慚愧方面，我個人更感覺這次有負大任，日本對於中國是具有熱情誠意的，中日和平前途是很有希望和光明的，假使這次負責禮專使責任的人，資望比我深，能力比我強，我相信收效比我一定多至百倍千倍，我個人力薄能淺，而諸位不責備我，反而盛獎我，真使我慚愧無地。

現在中日宣告和平了，我今天向諸位明白承認，前途不能說沒有些小困難，要掃除這些困難，除了兩方政府協力之外，還得要兩方國民共同努力，諸位先生旅日多年，怎樣向日本國民表示真誠，怎樣以自己的真誠換取日本國民的真誠，一定比我還明白，用不着我囑咐



的，但承諸位先生看重我，因此也不客氣指出幾點，希望諸位先生注意。

我會記得在國民政府還都的頭一天，對中國國民廣播，中間有一段話，我現在向諸位重復申述一遍。我說：

「這次中日和平是雙方的，不是單方的，大家都瞭然於中日兩國的前途，東亞的大局，世界的趨勢，知道東亞和平的責任，決不是一方所能單獨擔負的，必得雙方共同努力的，因此兩國有識之士提倡於前，兩國人民景從於後，方有今日和平的實現，所以我們同胞要認識，中日今後是患難朋友，是患難的兄弟，我們更要認識中日既是朋友和兄弟，我們應該站起來，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是平等的，中國國家和日本國家一樣獨立自由的。」

我們怎樣站起來呢？就是自己要立人，換一句話是好好的做人，個人自己不能立，國家也不能立，國家不立，國家無從建起的，兄弟以為要自己站起來，最少要有三件事要注意。

第一是負責任 我不要求各位談空虛的道德，更不要求諸位談封建的道德，我所要求的是大家負責任。人是有責任的，對國家有責任，對社會也有責任，在政府若不公忠體國，就是不負責任，人民若不盡國家義務，就是不負責任。中國為什麼變成積弱之國，因為自清末以來，政治和社會都腐化墮落了，這種薄俗末流，至今日還不能矯正，因此被人蔑視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不斷的惹起戰爭和事變了，假使政府和人民都能自始至終的對國家對社會負責任，先替國家和社會打算，然後才替自己打算，我相信今日中國並不會這樣衰弱，諸位同

胞們，負責任就是道德，嚴格說起來，責任之外，更無所謂道德，以後我們真真要認識國家，認識自己的責任，否則平等獨立自由都是空的，平等獨立自由不是人家給我們的，應該自己拿人格去取得的。

第二守尊嚴 國家的尊嚴要維護，用不着我說了，我要說的是個人的尊嚴，人是有尊嚴的，四書所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是人的尊嚴，人的尊嚴守不住，那便配不上稱人了。可是我們要知道，驕妄絕不是尊嚴，因為同是人類，我們固然要自尊，同時也要尊人，驕妄不止不是尊嚴，而且是損失了自己的尊嚴。我們更要知道，卑屈更反乎尊嚴，絕對損失了自己的尊嚴，我最痛心和傷心的，我見許多人既不尊人，也不自尊，不論和國內的人和國外的人交朋友，不是妄自尊大，就是甘自卑屈，甘自卑屈固然損失自己的尊嚴，妄自尊大，也何嘗不是損失了自己的尊嚴，如果我們同胞不從守尊嚴起，可以說自己既不求平等，更從那裏去求平等，我今後希望於同胞們，我們應該切戒驕妄，痛戒卑屈，否則自己不能立人，怎樣去立國和建國呢？

第三求知識 我所謂知識，絕對是指科學知識，現代的人們，若不接受科學、是不能生存的，同樣的，國家若不能應用科學，也是不能生存的，我們以前太蔑視科學了，太拒絕科學了，無論任何事物，都比人落後，諸位不是時常聽見人說中國是一個落後國家嗎？什麼是落後，簡單言之，就是人家接受科學，而我們拒絕科學，因此人家一天天的前進，而我們一

天天的落在後面，諸位同胞，今日世界是建築在科學上面的，國家和個人的生存也是建築在科學上面的，世界的國家有前進和落後之分，就在於接受科學的先後，世界有近代國家和殖民地之分，就在於接受和拒絕科學，我們要中國真真的獨立自由，應該照 孫先生的說話：「迎頭趕上」，才有希望。」

我這番話，或者在座諸位已經聽過了，或者在報紙上已經見過了，爲什麼我今天還向諸位重述一遍，因爲我這番話是我心坎裏的話，我不但拿着勉人，還拿着律己，諸位看我這回來日本的態度和行動，就知我要希望人做的，必定自己先做。在座的諸位同胞請原諒我說話的率直，我爲着中日兩國的前途，爲着中華民國的前途，爲着僑胞的前途，我不得不說率直的話，不得不說老實話，我們明後天便離開此地，以後在日本的國民外交，要全靠諸位了，我的言語也許粗直，但真是出諸至誠，敬祝諸位健康，敬祝中日兩國永久和平的幸福！

## 神戶官民招宴席上答詞

——六月一日下午七時——

坂閣下，勝田閣下，榎並閣下，諸位先生：

我們初來已受諸位歡迎，今日歸國又承諸位先生今夜歡宴，神戶諸位先生真太隆情，我們同人感覺無盡謝意，並且我們視察阪神兩地華僑都能安居樂業，雖在事變之時，也都能安居樂業，這尤使我們對諸位表示無盡的謝意。

回憶我們初到神戶之日，心內覺有無窮的感動，除了今夜在座主人殷勤招待之外，碼頭上聚集數萬的青年學生來歡迎我們，中國的兒童雜在日本的兒童隊伍中，日本的兒童也雜在中國的兒童隊伍中，真是令人不相信中日有過非常的事變，同時也令人確信中日將來不會再有什麼不幸的事變。

中日的兒童爲什麼這樣耦居相猜，就因爲兩方心內彼此知道兩國有二千多年的親摯友誼，有二千多年的交流文化，因此心靈相通，於是泯滅了爾我之見，我那天實在太感動了，以爲兒童這樣的天真，我們成人應該怎樣感奮呢？

我未到貴國之前，已經了解貴國的熱誠，到了貴國以後，更親見貴國的熱誠，每至一個

車站一個城市，都有貴國的男女人士拿着中華民國的國旗來歡迎我們的，高呼中華民國萬歲的，可見是尊重中國的獨立自由，是貴國朝野的舉國一致，這種真誠，我們回國之後，不止報告政府，還要報告於每一個中華民國國民的。

中日兩國的危險已過去了，然而前途我們不能說沒有困難，不過困難是容易克服的，中國古語有說：『至誠所感，金石爲開，』彼此誠心誠意合作，前途就有些小困難，也會變成康莊大道的，我會說過，今後日本應該諒解中國的處境，不斷的自動修正已定的關係，而中國更要了解日本的處境，不斷的自動增好未定的關係，無論什麼事，日本替中國想想，中國也替日本想想，同時兩方也替東亞大局想想，這樣兩國沒有不永久和平親愛的。

我自到貴國以來，公開說話已上十多次，諸位一定已經了解了中國的真誠，了解了我個人的真誠。所以今夜也不多說了，只是我今夜要特別對貴國感謝的，我到貴國以來，態度都是很率直的，言語都是很坦白的，貴國朝野不以我的率直坦白爲無禮，反而加我以真摯的共鳴，這真是令我感謝不盡的，兩方還有說不盡的話，彼此當長久以心相感，以誠相應，我代表同人深深祝諸位的健康。

## 附神戶上陸官民歡迎會上答詞

——五月二十日下午三時在神戶發表——

當國民政府改組還都南京的時候，蒙貴國派遣使節團到中國來，實感謝得很，我們這次奉命至貴國答禮。現在已一路平安，到達神戶，快要行赴東京了，將來在東京任務完畢之後，希望能視察貴國各地，並與各當道懇談，現在登陸，親見貴國對於和平運動上下一致的援助和協力，謹此再表深厚的謝意。

## 九州經濟俱樂部招宴上席答詞

——六月三日下午七時在福岡發表——

渡邊會頭閣下，諸位閣下，諸位先生：

今夜承蒙諸位招宴，至所感謝，對於中日前途，及對於中日如何始可合作，我今日下午已在帝國大學講得很詳細，今夜似乎用不着再講了，祇是諸位都是經濟界的領袖，對於中日經濟如何始能發展，一定還很關心的。剛才渡邊會頭也說過，要我表示中國的希望，我承蒙諸位招宴的盛意，深想再向諸位表示一些小意見，本人平生對於道德和政治，有一個基本的觀念，即是以爲除了責任沒有道德，除了經濟也沒有政治，今夜不是談道德問題，姑且擺開，現在專討論經濟。

我自始至終以爲若果中日經濟若有一個整個調整的計劃。換言之，即是有一個完善的合作方法，中日決不會有事變，在將來也決不會有事變。

所謂調整，所爲合作，即是有無相通，長短互補。中國所有的是資源，而所缺的是資本和技術，而日本現在進展的是重工業，將來所需要的是輕工業必需品。我們於這個問題，能平心靜氣的想，能開誠布公的做，中日前途一定很光明，而東亞前途也一定很安定的。

但是要東亞安定必首求中日安定，要中日安定，尤在於首求中國安定。中國以農立國，是不能安定政治的，必得以「工農立國」，因為農民人口佔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而每人所得耕地不過三畝多，因此不能大量生產，生產既不能大量，他的農產品固然無法供給日本的需要，也不能供給中國的需要。試看中國每年米麥進口佔全進口四分之一，就可以知道中國貧困的原因，因此農民沒有購買能力，一方面是不能購買日本的貨品，而他方面也不能應日本的需要。

工農兼重是中國今日立國的政策，因為中國能夠將農民人口一半移於輕工業中，國民經濟也活躍了，農民也能比較大量的生產了，日本重工業也可以消化了。我希望於日本人民的，萬萬不要誤解，以為中國發展工業，便妨害了日本，中國發展工業，不但不能妨害日本，而且更是有利於日本，至少第一，政治安定，為日本投資於中國的大利，不至使日本時時當心投資的安全。第二，農民有了購買能力，使日本經濟也能活潑。第三，農民人口減少，則可以比較大量生產，米麥棉等不止可以供給本國，還可以有餘的供給日本的需要。我隨便想想，已有許多理由，諸位先生儘可以根據我的說話研究了。

中國太窮了，每年入口價值，每人僅占美金六角，而日本則占至美金五元六角。相差之額，竟至百分之八十九。其原因就因為沒有出口與人交換，更沒有出口與日本交換。假使中國的國民經濟稍稍發展，其利於日本為如何，諸位先生是經濟界的領袖，於此原理，當已研



究有素的。

所謂經濟的發展，最要是金融的流通，而金融的流通，完全在於生產與消費的合理分配與交換。我在東京經濟界的招宴，在大阪官民的招宴，已有披誠的陳辭。將來回國之後，更想把那兩番意見，印刷出來，寄結諸位參考。對於中日經濟合作，我研究已有許多年。據我愚見，實在沒有衝突，只有可能，我希望諸位對於中國的經濟，讓其循必由之路發展，更加以資本和技術的合作。現在歐戰擴大，其結果如何，雖不能測，但最重要的，則東亞經濟應成立一個單位。若平日經濟不能合理化，則東亞必難安定，將來只有受歐美支配，於中國無益，於日本也有大損，這是我的愚見。

中日前途是光明的，縱有小小困難，也容易剋服的。以我們兩國合起五萬萬餘人的人口，推誠合作，甚麼困難，也會迎刃而解的。無論歐美任何國家，也擋不住我們共同前進的，祝諸位的努力！祝諸位的健康！

## 在九州帝國大學演講詞

中日兩國如何可以永久和平，如何才能經濟合作

——六月三日下午四時——

總長，諸位教授，諸位同學先生：

這次兄弟到貴國答禮，能夠借此機會到貴國的最高學府，與貴國的遠見之士見面，和交換意見，兄弟實感覺不勝榮幸。

現在世界正在劇變，兄弟原想有許多問題請教各位的，但我想，世界雖在劇變，而關係本身的，還是中日問題，和東亞問題，因此我想擺開世界問題不談，而專提出中日兩國的根本問題，本着個人的見解，向諸位作一番誠摯的貢獻。

兄弟這次東來，並不是形式的答禮，而是帶着全國朝野的誠意與熱情，希望我們的誠意與熱情，和日本的誠意與熱情交流，因此今日的說話，都是朋友的說話，兄弟的說話，或者說話之中沒有文飾，或者見解之中容有錯誤，也希望諸位先生本着朋友和兄弟般的情誼，予以諒解。

兄弟在中國時，碰見日本的朋友們，頭一句問話，都問：『中日兩國如何才可以永久和

平，」第二句說話，便是：『中日兩國如何才可以經濟合作。』我到了貴國一個多星期，遇見貴國朝野人士，大致也都是這兩個問題。今日兄弟打算就把這兩個問題本着個人見解，向諸位懇摯的貢獻些意見。

第一，我們就中日兩國如何才可以永久和平來說罷，我以為兩個國家的事變，決不是起於一天的，必定兩國積累了十數年乃至數十年的誤解，才出於一戰。兩個國家的和平，也不是倖成於一時的，必定兩國積累了十數年乃至數十年的了解，才能永久和平。

自從九一八事變，兄弟便日夕想着中日兩個必終有一日淪入血海，日日希望解決，而終尋不出解決之道。因為我總覺得中日之間，橫着不可解的怨恨，而兩方都抱有不可解的敵意，這種怨恨和敵意，一天不能消除，暫時的和局是不能挽救未來的危險，因此我曾費了很長的時日，來探討怨恨的來源和敵意的癥結。

我很覺得奇怪，日本和歐美對於中國同是一個外國人，但一個中國人碰到一個日本人，他比碰到一個歐美人容易了解，容易做朋友；尤其在歐美地方，一個中國人碰到一個日本人，他格外容易了解，格外容易做朋友，可是我更覺得奇怪，這個中國人和日本人一分手後，便在背後，互相對敵，互相蔑視。

我不知道自己的觀察對不對，我以為這種敵對和蔑視，實在基於內心的嫉妬，在中國這方面，以為中日好像兄弟一樣，在日本沒有維新之前，中日的命運也正相同。可是日本強

了，中東之役，中國是失敗了，日俄之役，日本又戰勝了，不但如此，日本且模仿歐洲帝國主義的方式和辦法，向中國侵略和壓迫了，好像兩兄弟，以前都是捱受慘苦的命運，現在一個是強了，一個是弱了，這個強的不但援助弱的兄弟，而且加緊和外人向這個弱的兄弟壓迫，這個弱的兄弟怨恨強的兄弟，自然比怨恨一般外人更深刻。不過日本之強，中國知道沒方法可以遏抑的，於是把怨恨都寄託於蔑視，以為日本雖然強，從前他的文化是由中國去的，中國一度既是日本文化的泉源，無論日本怎樣強盛，我還是一個老大哥，你儘管強，我儘管瞧你不起。

至於日本方面，在維新之後，國力未充，其勢不能和歐洲的帝國主義爭雄，也只有向中國下手，以為中國老大了，腐化了，很有點『天與不取，實受其殃』的神氣。不過內心一想，日本從前的文化雖然不是全部來自中國，至少有若干文化孕育於中國，於是他極力模仿歐美，極力想忘記他的兄弟國家，好像強的兄弟，以不認他的弱的兄弟為榮，以為一個強者有了弱的兄弟，是喪失了他的身分和體面，不但要忘記他的兄弟，反而更壓迫他的兄弟，以為這樣才表示出他有資格和歐美齊觀，並非和中國等量。

他們彼此都具有內心的嫉妬，不特不設法互相了解，而且故意的不去求了解，就是中國人方面的所謂『日本通』，而日本方面的所謂『中國通』，也都本着互相蔑視心理，相互的偵察，而不試求互相的了解，日本通所得到日本的結論，就是『日本人不可靠』，而中國通

所得到中國的結論，就是『中國人容易欺負』，憑着這種內心嫉妬，已足打仗而有餘，所以我常說，縱使沒有蘆溝橋事變，縱使沒有九一八事變，中日兩國始終要打一次大仗，非大家淪入血海不可，這種慘運似非憑少數有識之士，在短促時間所能挽回，我無以名之，只有名之爲歷史上無可避免的悲運。

現在中日事變已延長差不多二年了，雙方同蒙重大的犧牲，日本方面已經有了根本的覺悟，知道以前的觀察完全錯誤，從前以爲中國可以不戰而屈是錯了，一戰而可使中國瓦解也錯了。中國方面也有了根本覺悟，知道以前的觀察完全錯誤，從前以爲相鬥下去，日本經濟必定崩潰是錯了，中日戰爭可以惹起日本之革命也錯了。兩方已經覺悟到，中國之所謂最後勝利只是一種宣傳，而日本之不能滅亡中國也是事實，兩方面同時感覺到筋疲力盡，內心的嫉妬也在戰爭中彼此認識而消除，而兩方更同時感覺到東亞前途滿佈着危險與困難，決非中日某一方所能擔負，而非共同擔負不能解決東亞的危局，這時是中日兩國棄嫌修好的時機，也是中日兩國翻然締結永久和平的運會。

現在中日兩國的關係已在調整中了，但我們要永久和平，還得注意幾點：

第一點：這次調整關係，中日兩國當局都有他的困難，因爲條件不好，中國人民必定以爲日本還沒有誠意，如果條件太好，日本必定有一部分人民以爲戰了三年，所爲何來，所以我本人認定這次調整關係，僅爲和平運動之第一階段，除了中國方面所要求的獨立自由，所

要求的統一，所要求的立刻實現的事實，所要求的日本先信賴中國之外，日本應該在調整關係之後，不斷的自動的修正一切的關係，這樣事實具在，互信必生，東亞百年大計，也可於此奠定。

第二點：剛才兄弟所說，中日雙方的內心嫉妬，非根本消滅不可，這事實關係到國家的政策，國民的教育，我在三月二十三日曾向貴國廣播說：中日共存共榮，在往昔不過是一個名詞，而在今日，在將來，算是一件事實，我們絕不要忽略，我們更不要輕視，中日兩國如果繼續仇敵和蔑視，我深信必會兩敗俱傷，非有親愛和平，我們不能達到共存共榮的目的，我們關係既這樣密切，祇有兩方以兄弟相待，方可以達到這個目的，若果以仇敵相待，只有同歸於盡而已，我們今後，不祇尊重日本國家的尊嚴，國民的尊嚴，還尊重自己國家的尊嚴，和自己中國國民的尊嚴，更盼望日本尊重中國國家的尊嚴，和中國國民的尊嚴。就是想雙方根本消滅內心的嫉妬，而易以相互的親愛。

第三點：在中國方面有識之士應該告訴人民，以後不可對日本存有報復心理，而在日本方面有識之士應該告訴人民，以後不可對中國存有『防止報復』的心理，因為在中國方面若存有報復的心理，結果只有釀第二次大事變，就使日本戰敗，而終於冤冤相報，中日兩國都歸於衰弱和滅亡，在日本方面若存有防止報復心理，其結果也只有刺激中國人民，增強他們的報復心，這次歐洲大戰，就是凡爾賽會議對於戰敗國過於防止報復來的。中日兩國若能一

方面不存報復之心，而他方面更能不存防止報復之念，我敢保證中日永久和平一定能實現的。

第二便說到中日兩國如何才可以經濟合作了，對於這個問題，我以為有兩點應該注意的，第一是中國人民心理的了解，第二是中國需要的了解，我很簡單的說說：

第一，在事變以前，我常聽到日本方面說，中國專願意和歐美合作，而不願意和日本合作，以此證明，中國是專排日的，然而據我所知，自從國民政府成立以後，中國固然沒有和日本經濟合作，和歐美也沒有真正試過這經濟合作，甚麼原故呢？外國人和中國人都各有心理上的矛盾。

在外國人方面，一方面是希望對中國投資的，而一方面也畏懼投資的，爲甚麼希望投資呢？他們知道中國的市場是有希望的，中國的資源還有許多未開發的。爲甚麼畏懼投資呢？他們在前清末年，凡在中國投資都有特權，所謂特權，卽是可以不守中國的法令，可以不向中國納稅，現在國民政府有了許多法令限制，因此沒有從前的特權，他們便不肯投資了。

而在中國人方面，一面是歡迎外國投資，而一面也拒絕外國投資，爲甚麼歡迎外國投資呢？因爲中國的資源的確急待開發，中國不止需要技術，而且更加需要資本，因此只有歡迎外資，爲甚麼拒絕外國投資呢？因爲在歷史上的經驗，中國人凡是和外國合作的，多半吃虧，結果不祇利益盡爲外國拿去，連管理權也給外國拿去，因此外國人的資本不來，天天喊歡

迎，及至外國的資本來了，免不了立刻疑懼，中國政府有了種種的外資合作限制原則，都根據這種疑懼心理而來。

中國和外國的人都有心理上的矛盾，所以不獨中日不能合作，中國對歐美也不能合作，我在實業部四年，期間不為不長，但始終沒見過有外人真願和中國合作，我拿一個例來比方罷，中國對外人投資有一條限制原則，即是中國資本要佔百分之五十一，而外國資本只能佔百分之四十九，我凡碰見外國人，他們都對這個原則表示不滿，其實我自己也覺得可笑，因為就一般事實來說，大凡合作事業，其權力之能否保有，有時不完全在股本之多少，而在技術之高低，譬如美國的通用電氣公司與歐洲各國合資，在法國兩廠，一佔百分之十八，一佔百分之十，在德國兩廠，一佔百分之三十，一佔百分之十一，在荷蘭一廠，佔百分之二十，都取得了管理權，可見不是資本過半，便沒有問題的。

不過中國是一個弱國，對於工業還在萌芽，若和外人合作，自然免不了疑懼。中國人的資本還佔過半數，或者不完全合理，可除了這種限制，中國更沒有把握了，所以日本要真和中國合作，也應該明白和了解中國的心理，那就是首先除去本身的矛盾的心理，其次設法消去中國的矛盾心理，中國要佔資本百分之五十一，就讓佔五十一，如果能做出幾件大的事業，表現出合作的親愛精神，以後要百分之五十，六十，自然容易做到了。

第二，說到中國的需要了。中國的需要是要由農業國，而走上農工並重的國。這個目的



不能達到，中國必不會安定，中國不安定，不獨不能和日本合作，而且不能協助日本。不獨不能分擔安定東亞的責任，而且還爲東亞安定之累。我可舉出幾個理由。

第一，中國以農立國，絕不會彌補入超。中國自海通以後，入超差不多是常則，出超只是偶然的變態。談到經濟問題的，無不慨嘆於中國入超之鉅，彌補之難。但細細觀察，我絕不憂慮入口之多，而是憂慮出口之少，大概事變未發生而歐洲還在安定時期，中國每人僅佔入口貨物美金六角，比之英國每人佔四十四金元，法國二十六金元，美國九金元，日本五金元六角，固瞠乎其後，即較之素主限制入口的俄國，還差五角，新興未久的土耳其，還差一元四角，產業仍未發達的印度差兩角。我平時都這樣想，假定我們依舊以農業立國，最好的也只好到每年入口四分之一的農產品如米，麥，棉，過此則似已有天塹的鴻溝，更不能超過一步。將來我們農業品的剩餘，絕難找到外國的市場，米有安南暹羅做南進的壁壘，麥有加拿大，美國，和澳洲作西進的障礙，棉也只能賣到日本而且爲數只有數千萬元。此外如果要大量生產輸出和人交換，非從農業以外打通一條路線不可，最低限度非第一步先從輕工業想出一個辦法不可。

第二，中國以農立國決不會安定經濟。中國雖然沒有極確的統計，但農民佔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大概近是，這樣多量的農民，實在可以制中國的死命，何以故呢？

A，農民過多，土地的分配必少，據國聯專家報告，中國農民能力可以耕作十五畝，南

京金陵大學對於農業有很悠久的研究，他的估算每農戶分配的適度應爲八十畝（每農戶以六人計），那麼和專家的估計差不多，但實際中國農民平均僅得三畝多，如果我們不設法減少農民的數目，中國必無大量農產品生產的希望，穀貴固是慳慌，而穀賤也是慳慌，經過許多年的經驗，我們已有深切的體察。

B，農民過多必不能利用機器生產，這個理由很是簡單，因爲農民過多，勞力必廉，農民勞力太賤，結果必不能利用機器，同時個人所得土地太少，實無利用機器之必要，而且小農制也不容許使用機器，勞力的功能是有限的，機器的功能は無限制的，因所得的土地太狹，不能使用機器，因不能使用機器，而致生產短少，這樣互爲因果，於是全國的經濟遂無法安定，不但如此，農田的耕作，肥料很佔重要的地位，農民既無儲蓄，除天然肥料之外，實無方法以購用人造肥料，廣漠的土地決非天然肥料所能供給，中國土地之不能開闢，這也爲重要原因。

第三，中國以農立國決不會穩定政治，除了辛亥革命以外，中國歷史上的革命，無不起於農民暴動，固然中國從前社會和經濟的基礎是農民，基礎動搖之時，暴動分子當然除了農民沒有別的民衆，同時因着農民人口之過多，分配之不平，我在歷史上很少找到農民有富饒之時，我曾從各方面的估計，替民衆打個算盤，我曾說過：

『我們理想上的分配適度，最高是人盡其力，地盡其用，其次是能力和個人的生活相

稱，不得已始談到只維持僅可養命的生活，中國情況，農民平均得地如此其少，自然比較美國農民平均每人七十多畝的大相懸殊，而且中國目前只用人力和畜力耕作，就是每人有七十多畝的田，也沒有方法可以耕種。

據專家劉大鈞先生的估計，中國農民食料每日約爲一斤，照這樣算法，單以食料而論，在北方需要一·六畝的生產，在南方需要〇·九畝的生產，除食料外，還有燃料，芻秣，衣服的必要品，還有賦稅，還有疾病婚喪，還有最低度必要的滋養料，但中國每個農民，平均僅得三畝多，所以農村只有日日向破產的路走了。』

根據以上的事實，中國很顯然有兩件嚴重的事情。

其一，一國之建設不能不靠人民拿出一部分的儲蓄，人民救死不贖，焉能有餘力投資建設？國家之穩定，最要緊是人民經濟的發展，若經濟停滯——衰落還不說，整個社會要後退的，譬如人穿的衣服要壞的，住的房屋要破的，不能說經濟停滯，而衣服房屋也停滯而不壞不破，所以停滯卽爲衰落，這是一種自然，國家經濟日日往衰落路走，政治決不會安定。

其二，人民缺乏儲蓄，絕不能感受天災人禍。據李逸安專家的考查，中國荒地每年增加。民國三年荒地三萬五千八百萬畝。民國五年三萬九千萬畝。民國四年四萬零四百萬畝。民國六年九萬二千四百萬畝。民國十一年八萬九千六百萬畝。民國十九年十一萬七千七百萬畝。自從民國十九年以後，沒有確定統計，即使增也不見得多少。一面耕地已少，一面荒地增

加，很顯然的經過天災人禍以後，因平常沒有儲蓄，無力再耕，只好拋棄。我們試看每年逃荒之多，可以決斷人民平常實在沒有儲蓄。以百分之七十五人口，統統沒有儲蓄，中國政治之始終不能穩定。其中緣故已極顯明。

所以要中國能分擔東亞和平的責任，必定先使中國復興。要中國復興，必須中國安定。而要中國安定，必須減少農村的農民。若要減少農民人口，最要之點，即促成中國工業的發展。

日本不可以為中國工業發展，是於日本有妨害的，大凡工業國家的發展，必由輕工業進而為重工業的階級，日本已踏入重工業的階級了，中國輕工業正在萌芽，除了絲織品和火柴兩項，所有棉織品，毛織品，針織品，製革品，橡膠品，紙類，水泥，三酸，碱，玻璃，搪瓷，麵粉，砂糖，捲烟，還多仰給於外國，因此中國工業的發展，不獨日本不應害怕，還須要加以技術的協助，這樣才能成為互相依倚，關係密切。

中國的農村問題太嚴重了。這個問題必須解決的。中國共產黨看清了這一點，所以前幾年間勢力很蔓延，祇是共產黨看清農村的弊病，而得不到解決的方法。分田是沒有用處的，因為農民過多，土地過少，再分也是沒有結果，因為共產黨的辦法，已不為人民所信任，漸漸失敗了。現在共產黨在中國還有些影響，但他們不以共產主義為號召，而以中國國民黨的民族主義來號召，所以我們若果維護中國的自由獨立，共產黨已失了根據，必將由衰微而至

沒落。然而共產黨就使沒落，中國的農民還須要設法減少的，減少的方法無過於發展工業。以中國的情形而論，她的環境已制定她的將來，要成爲工業國是絕不可能，我們希望和計劃，是要她成爲工農並重之國。

我今天很誠意的將中國的心理和實情報告於諸位有識之士。或者我觀察有錯誤，而我的言語是誠摯的，諸位若要問我中日如何才能以永久和平，中日如何才能以經濟合作，以上的報告就是我的答案。

今天諸位犧牲了寶貴的研究的時間，來聽我講演，私衷至深感激。回憶我二十九歲初次當教授，中間兩度曾爲大學的校長，我對於學校的研究是很有興味的，若果他日中日兩國有交換教授之時，我還希望能夠到貴國當一個教授，日夕領諸位的教。

陳公博先生二十九年文存

一七六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6067B

陳公博先生二十九年文存

實價國幣壹元伍角

編輯者 宣 傳 部

出版者 宣 傳 部

發行者 中央書報發行所

印刷者 中國圖書印刷公司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再版

Vertical handwritten text in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identifier.

1634523

3-2348